

目录

引子	4
知行合一读阳明	4
第一次	12
直视黑暗，看破愚忠	12
第二次	67
龙场悟道，良知自救	67
第三次	167
知行合一，无解中求解	167
第四次	224
力行，打出一个心学	224
第五次	322
破心中贼，和皇权搏斗	322
第六次	438
天泉证道，圣人必可学而至	438
后记	502

引子

知行合一读阳明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也可视为心学宗师王阳明恪守一生的座右铭。这四个字表面看来十分简明，内中却颇多奥妙。想要理解王阳明，看懂他的心学，只了解理论远远不够，还需要把阳明先生的一生经历和他的学术理论合为一体，视阳明心学理论为“知”，以阳明先生一生经历为“行”，知行合一，互为借鉴，相互渗透，才能读懂心学，读懂阳明先生。

2
阳明心学大讲良知，力图“简易”，但自古而今，

阳明心学却也并不易懂。究其原因，是阳明心学有三奇。

第一奇，阳明先生是心学宗师，首创知行合一之说，大举致良知之教，他自己早年却是个心学门外汉，浑浑噩噩无知无觉，直到三十五岁那年上奏蒙冤，下狱受苦，困居龙场，一夜悟道，即成宗师，这一“悟”令后人斥其学说为“禅”，说三道四，乱了心学的章法。

第二奇，阳明心学自创立之后，赞誉者众而毁谤者亦众，赞者视其为救国救民之明灯；毁者谓其是破国倾家之祸水。誉至极，毁亦至极，令人咋舌。

第三奇，阳明心学创于中国，在本国逐渐湮灭，寂寂无声，反而在邻邦日本大放异彩，使这个小小岛国两度称雄于世。³其后中国在大败之余，不得不以东邻为师，从日本将心学重新引入，现

在心学回到中国前后已有数十年了，却依然寂寂无闻……

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偏就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枝散叶，真是奇怪至极。

说起心学的起源，不能不提到南宋名儒陆九渊。

陆九渊，字子静，世称象山先生，今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早年举进士，做过些不大的官职，病死在任上。陆九渊一生讲学多，著述却少，以“心即理”和“自存本心”为学术主旨，提出“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认为成圣贤只在于讲明本心，不假外求。

陆九渊的学说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他

认为：“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戕贼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闲其戕贼放失之端，日夕保养灌溉，使之畅茂条达，如手足之捍头面，则岂有艰难支离之事？”因其所教多称“心即理”，强调“存心养心”，故其学说被世人称为“心学”。

陆九渊在世时，他所创立的心学与朱熹所宣讲的理学并驾齐驱，然而朱、陆去世后，被朱熹整合起来的理学逐渐被统治者接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把理学定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到明朝仍沿用这一制度，专以朱熹所著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的命题，由此确立了理学的学术正统地位，而心学逐渐被边缘化了。

到明朝中叶，随着封建独裁越来越强化，哲学思想的空间越来越狭隘，随之引发的社会人心日趋败坏，正如王阳明所说，“士皆巧文博词以

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已是病人膏肓，不治不行了。而当此时，朱子理学已经固化为困人思想的樊笼，陆子心学则被边缘化，从者日稀。用什么办法救社会拯人心？王阳明于众说纷纭之中，聪明地选择了孟子之学作为突破口，以陆九渊“心即理”的心学思想为基础，建立一套有效的济世救人之学。在《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中，王阳明说道：“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把孔子、孟子以及周敦颐、程灏、程颐诸大儒的学说巧妙地连接为一体，借此为自己的阳明心学正了名。

正名，这是孔夫子早年周游列国，流落卫国时“发明”出来的一项政治技巧。在中国社会中，不论做什么事，也无论其是正是邪，总要尽力为

自己“正名”。阳明借孟子之言为自己的学说正名，是个聪明的举措，于是当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质疑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为他辩白，说：“‘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虽然最终辩护失败，阳明心学还是遭禁，但起码这个“辩护”还算有力。

其实阳明心学虽得于孟子之学，却并不因袭于此，而是借孟子“良知”二字大做文章，极力发挥，其内涵与成就皆高于孟子。

孟子虽谈良知，却不言“知行”，只是把良知与存心养性放在一处，而阳明先生谈良知，却尽是在“知行”二字下工夫，以至于后期理论达到了“致良知”的极点，最终肯定自我，明体达用，在明朝那个封闭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尽其所能展现了哲理与人性的光辉，⁷其光芒既照亮了孔孟思想，同时又超越了孔孟，达至更高境界。

阳明心学得孟子学说之“神”而另做发挥的同时，也得陆子心学之“形”以丰富自己。陆九渊说：“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而王阳明由此推出“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由此推出自觉、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系列理念，一步步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一个完善而丰富的学术体系，在明朝中叶形成了曾一改社会风气的“阳明心学”。阳明先生自己也被后人赞为“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一种学问像阳明心学这样重视实践，重视经世致用；在中国哲人里，没有一个像王阳明这样遭遇坎坷，绝境求生。从无知无觉到良知觉醒，从悟出“知行合一”到力行“知行合一”，从致良知之高远而达于圣人境界，⁸

六次突围，沥血呕心，惊心动魄。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有幸与孔、孟两位夫子齐名，被后世并称为“圣人”，而他的悟道成圣之路，却是从一场几乎夺去他性命的灾难开始的。

第一次 直视黑暗，看破愚忠

一 官二代的升迁路线图

王阳明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出生在大明王朝第一流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状元，到正德元年（1506）已经担任礼部左侍郎，成为内阁辅臣最重要的候选人之一。

老父亲官做得如此顺利，王阳明庇荫其下，自然也是顺风顺水。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被安排到工部“观政”，也就是实习。他刚到岗就接了一个大“工程”，¹⁰

为刚刚去世的名将王越修建陵墓，这次他认认真真地实习了一次。后来他并没有在工部任职，而是去了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

在云南清吏司主事位上仅仅待了一年——还不满一年呢，王阳明这位小小的六品主事就被外派到淮扬、直隶去审决死囚。这是刑部主事所能接受的最重要的外派职务，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锻炼。其后王阳明因为身体不好，回老家休养了足足两年，弘治十七年（1504）才回到京师继续担任刑部主事。过了半年，他又接到了一个六品主事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任命——山东省乡试主考官。更有意思的是，他这个职位不是经由礼部衙门委派的，倒是山东巡按御史陆傅主动向礼部“推荐”的。

巡按御史，是和布政、按察、都指挥齐肩的高官，是朝廷派到地方上的耳目风纪之臣，这样

一位重要的臣子，却向朝廷推荐一个刚在刑部任职四年（其中还有两年在休病假）的主事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可真算是意味深长。

大明帝国共有两京十三省，其中山东是个重要的大省，在北方仅次于直隶。王阳明这么一个毫无资历的新人竟被山东巡按御史推荐为乡试主考，而这个“推荐”居然立刻就被礼部批准了。这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可以再往深里想一想。

京城哪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科举考试？
礼部。

此时，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礼部右侍郎。

如果礼部衙门公然委派一个如此年轻而无资历的刑部主事去担任一省的乡试主考，别人是要议论的。而一位监察御史出来“推荐”，礼部再

下任命，表面看来丝毫不牵涉王华这位礼部的副部长，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主持山东乡试回京后，王阳明又被调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平级调动，其实内中大有讲究：当时大明朝的文官两万余名，武官却有十万人！这些人升迁任命多要经过武选清吏司，所以兵部的武选司虽然职位不高，却是肥缺中的肥缺，在京城各部门的各级“主事”中，武选清吏司主事能捞到的“油水”是最足的……

王阳明是大宗师，是一位“圣人”，可他的老父亲却是个“凡人”。这位老先生大权在握，自然不肯浪费了，于是一步一步全按着官场上的潜规则给自己儿子安排前程，真是板眼分明，有条不紊。王阳明自从考中进士以后，整条晋升之路都被安排得非常有趣，画一条路线图，我们就

全看清楚了。

首先，王阳明到工部实习，显然是让他熟悉一下怎么做工程。在六部之中，工部的职司相对来说不太重要，所以王阳明并没留在工部任职，而是转去刑部，负责审决重犯，这是让他熟悉一下《大明律》，搞清楚一个官员应该怎么审案件、理刑名。

古代的官员很有意思，他们可能被分派到任何一个部门，掌管任何一项工作，但这些官员对自己即将被分派的工作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专业技能，往往是上任之后才开始摸索着干，很多官员因为不熟悉本职工作，只好把实权交给手下有经验的官员或胥吏，自己则悬空挂着，很是被动。而对一个古代官员来说，工程和刑名是最重要的实习功课，将来王阳明如果外放担任地方官员，这两方面的能力就显得更要紧了。当下王

阳明年纪虽轻，资历虽浅，却在父亲的安排下历任工、刑两部，对工程和刑名都进行了有效的实习，这对他以后的仕途将有非常大的帮助。

有了专业能力，下一步需要培养的就是人脉关系。在有了工程和刑名的经验后，王阳明就被外派做了主考官，这是在积累人脉。因为乡试主考官对上可以接触山东一省重要地方官员，对下可以成为这一科考中所有举人们的“座师”。这套“座师”、“门生”的说辞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利“蛛网”，将来这些举人一旦做了官，他们一辈子都会奉阳明先生为“座师”，聚在王阳明的“门下”。所以王华安排儿子去做乡试主考，一语挑明，就是在地方上交结人脉，为儿子织就一张做官必需的关系网。

实习，受训，结人脉，这三步棋走得稳稳当当，

不动声色，几年工夫就把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打造成了一位技能全面、经验老到、人脉关系也比较丰富的朝廷官员。

显然，这位老谋深算的成化辛丑科状元是在利用手中权力刻意栽培自己的儿子。但奇怪的是，从王阳明的“升迁路线图”可以看出，王华为儿子安排的是一条担任地方官的仕途，他为什么不让王阳明进入翰林院？因为出身翰林，可找机会进入权力上层，做一个京官、重臣。

翰林院是明朝最高学术的官署机构，翰林出身则是极为重要的身份标志。一个官员要想升到侍郎、尚书这样的高位，以至入阁担任辅臣，翰林出身是非常重要的。

王华出身翰林院，却偏偏让儿子直接到工部观政，到刑部做主事，¹⁶绕过了“翰林院”这个做高官必需的门径，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番巧妙的人

事调度和安排。要想弄明白这一点，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分析王阳明那位城府如山、精明透顶的礼部侍郎老父亲的经历、仕途和心态。

在明代，一位学子在寒窗苦读之后终于考中进士，做了官，这只是他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因为进士及第是官员人生的一处岔路口，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从翰林院出身，做皇帝身边的近臣；二是从六部出身，做一个担任实际工作的能臣。

状元公王华自己走的就是第一条路，进入朝廷后，他从翰林院六品编撰做起，以皇帝身边文学侍臣的身份一步步走上来，主持过经筵日讲，参与编纂过《宪庙实录》和《大明会典》，做过詹事府少詹事（少詹事是专门辅佐太子的职位），¹⁷又给当朝太子做过讲师，加之王华精明干练，能

力极强，将来势必成为朝廷最上层的重臣，而他的资历又给他提供了多重机会，既可能在弘治朝得到重用，担任阁臣，又可能在将来太子继位后升任阁臣，运气好的话，甚至可能担任两朝的阁老。

但阁臣并不容易做，这是一个极度荣耀却也备受攻讦的位置。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罢宰相之职，并且把这一条写进了《皇明祖训》里：“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有了这么凶狠的戒条，此后明朝就再也没有宰相了，内阁的阁臣并不等同于宰相，他们必须唯皇帝之命是从。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又确实需要在皇帝之下有一位或几位名副其实的人来协调官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明朝的内阁辅臣变成了一个很窘迫的角色：

皇帝不认为他是宰相，朝臣们却又把他们当成宰相。如果阁臣巴结皇帝，就会被臣子们指责；维护朝臣与皇帝争执，又会遭到皇帝的打击和罢黜。

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们只好更多地巴结皇帝，唯皇命是从。这么一来他们就难免遭到下层言官的弹劾，而言官们弹劾时又不敢稍涉皇权，就往往会选择以阁臣的私人操守为攻击点。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例如，嘉靖皇帝曾经重用奸臣严嵩，借着严嵩父子的手迫害朝臣。可到了晚年，嘉靖皇帝卸磨杀驴，罢免了严嵩，将严嵩之子严世蕃下狱论罪。

严嵩父子是嘉靖一朝出名的奸臣，尤其严世蕃这个人为祸朝廷多年，收索贿赂，迫害朝臣，劣迹斑斑，十恶不赦，百官都欲杀之而后快。为了坐实严世蕃的死罪，¹⁹审案的官员们在搜集罪证之时不遗余力，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罪状中也记

载了严世蕃迫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和锦衣卫经历沈炼的恶行，当时的阁臣徐阶看到这一条很惊讶，立刻就问审案官员：“你们到底是不是想杀严世蕃？”

审案官说：“必欲杀之！”

徐阶就说：“你们既然要杀严世蕃，却又在案卷中提到杨继盛、沈炼，这岂不是在给严世蕃帮忙？因为当初杀这两个好人，都是严嵩从皇帝那里弄到圣旨才杀的，现在你们提起这两件冤案，等于是间接指责皇帝。要是这样的话，你们这几个审案的人就要倒霉，严世蕃倒没事了。”

徐阶这位阁臣果然厉害，一语点醒梦中人，审案官赶紧换了几条与皇帝不相干的罪名报上去，说严世蕃勾结倭寇，豢养匪类，占用被认为“有王气”的土地修建宅院，有不臣之心，以这些罪名“构陷”一番，才把严世蕃给杀了。由此可见

皇权之威，言官构陷之狠——即使构陷是针对坏人。

终明一朝，身为阁臣的官员不管是正直敢言，还是奸佞妖邪，又或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庸碌之辈，大都难逃言官的弹劾，真正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为了避免将来一旦失意，遭到朝廷言官的痛击，那些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内阁重臣的官员们往往给自己做官的儿子安排一条平凡的为官之路，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做一个中下级官员。若父辈的仕途顺利，不出麻烦，则一家人安享太平；就算遇到一些麻烦，大不了父亲致仕退休，儿孙辈或可免受牵连，最多也不过贬官、革职，不至于招来更大的灾祸。

另外，王华升迁虽快，却缺少外放任职的经验，人脉只限于朝廷，在地方上缺少助力，儿子到地

方上做官，对王华也会起到辅助作用。

所以王华为儿子安排的前途是：不进翰林院，只在部里（比如刑部）担任一个中级官员，将来等待机会外放，到地方上去做官。总之是不入中枢，不做重臣，在官场上尽量不要出头，也不去冒任何风险。

如果阳明先生的人生之路完全按父亲的安排去走，那史书上应该不会留下他的名字。可王阳明并不因为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平庸的前途就甘于平庸，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奋不顾身冒死上谏，做了一个诤臣该做的事。

二忠而见弃

大明弘治十八年（²⁴1505），明孝宗朱桔樘暴

病而死。太子朱厚照登极，年号正德。而正德皇帝继位，给大明帝国那经过百年培养，已然变得像时钟一样精密沉稳、井然有序的朝局带来了一场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后都会陷入“逐步退化”的怪圈，自开国之日起就活力渐失，吏治渐坏，君主渐昏，土地兼并，百姓破产，局面一步步变得不可收拾。为了应对危机，缓解矛盾，树立权威，延长统治，历代皇帝和重臣们就共同制订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皇登极之后，要大赦天下，用这样的方式与朝臣和百姓们达成和解，然后进行一场有限的改革，澄清吏治，革除时弊，缓解土地兼并，调和社会矛盾，至少在最初的几年内让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以树立新皇帝在朝廷和民间的威信。这么一个被老百姓俗称为“新官上任三把火”²³

的惯例其实是“祖制”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位新皇帝都要遵循这套游戏规则。所以每一位新君登极、每一轮新政的开局，总是令天下人翘首期待。

其实，早在正德皇帝登极之前，大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江河日下，孝宗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也感觉到朝廷流弊日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如疏通盐法，裁撤织造太监、镇守太监，约束皇室贵戚，制止土地兼并，这些改革措施有的得以施行，多数却因为种种阻力未能深化，而明孝宗又是突发暴病而死，事发仓促，生前策划的改革顿时全被搁置，这更让满怀希望的朝臣们惋惜。所以在新君登极之时，满朝臣子和全国百姓都等着皇帝励精图治，把先皇没办成的事推行下去。

却想不到新继位的皇帝朱厚照自幼被父母娇惯，失于管教，道德败坏，任性恶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顽君，其登极伊始就违反了做皇

帝的起码规矩，不肯裁撤冗余的官僚，没有澄清吏治，反而宠信太监，疏远大臣，纵情玩乐，又渐渐地把前朝刚整顿出一点模样的盐法破坏了，好不容易裁撤掉的织造太监，又被重新派遣到各地。

在朱厚照身边又有一群陪伴他的太监，个个都是精选出来机灵乖巧的角色，能说会道，更是玩乐的好手，骑马射猎、下棋踢球样样精通。这些太监大多从小净身入宫，一辈子都长在深宫，心里根本就没有“天下”二字，只知道奴才要讨好主子，一味地奉迎太子游乐骑射。其中最邪恶的太监要数刘瑾。

刘瑾，陕西兴平人，七岁净身，九岁进宫，是个做粗活的太监，一开始在宫里混得并不得意，后来得了机会来到太子身边，²⁵这才渐渐得势，把朱厚照紧紧哄在了手心里。有皇帝撑腰，再加上

为人凶狠，有胆量，有谋略，刘瑾渐渐成为“八虎”集团的首领。

正德元年（1506）九月二日，有太监借着出宫办事的机会向皇帝“乞请”盐引一万六千引，这个做法是有违明朝的《开中盐法》。按说一位皇帝应该精通政治、经济，对本朝的盐法相当清楚，对太监们骗取金钱的花招也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可正德皇帝却不具备这些必要的政治经验，对政事一窍不通，加之太任性，也不和大臣们商量，就胡乱把盐引赏给了太监。这样一来，从弘治年间苦苦整顿而刚见成效的盐法就被破坏了。

眼看正德皇帝又在破坏国家法度谋一己之私，朝臣们忍无可忍，内阁三位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一起出面和皇帝争执，但他们不敢指责皇帝，只好把矛头指向破坏盐法的太监。在阁辅和朝廷

众臣的坚持下，正德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准备惩治刘瑾等人。想不到刘瑾事先得了消息，跑来向皇帝哭诉求饶，而正被群臣围攻的朱厚照也恼羞成怒，居然立刻收回成命，委任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领京城十二团营，又任命亲信太监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重建已经被废除多年的西厂。随即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连夜逮捕支持文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岳、范亨、徐智，准备借助厂卫特务力量打击内阁。

面对皇帝发动的政变，身为朝廷文官之首的三位阁臣毫无抗拒之力，只能一起上奏请求退休，朱厚照立刻逐走了刘健和谢迁，只留下一个李东阳，以此搞垮原有的阁臣体系，从最上层把文官集团打倒。

文官，是国家苦心培养和精心选拔出来的一个精英集团，作为个人，²⁷他们是保守的、脆弱的，

但当他们结为一个集体时，便拥有极大的凝聚力，而且怀有人格上的优越感。现在正德皇帝刚登极一年，就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公然驱逐内阁辅臣，而这几个辅臣还是孝宗皇帝托孤的重臣，这样一场野蛮的政变触动了文官集团最核心的利益，立刻引发了朝臣的不满，御史、给事中纷纷上奏，请皇帝留下两位阁老，处置刘瑾等一班阉党。

可这时候朝局已经变了，刘瑾手中控制了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十二团营共计十万精兵，司礼监的几个秉笔太监被抓捕，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荣被架空，丘聚又以司礼监秉笔的身份提督东厂，已经把这个与内阁对应的要害部门掌握在“八虎党”手中，谷大用新建的西厂虽然还未成规模，可这个特务组织却是挂靠在御马监之下，御马监又是内廷二十四衙门中仅次于司礼监的要害部门，

直接与兵部对应。可以说，刘瑾这帮太监在皇帝的授命下掌握了团营、司礼监和东厂、西厂，就等于把北京城里的一切实权掌握在手中，整个大明朝在一夜之间陷于特务组织的全面控制之下，一切不同的声音都遭到彻底的压制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奏请求留下两位阁老的御史、给事中自然就变成了特务们打击的首选目标，于是正德皇帝在幕后操纵，由“八虎”太监集团和锦衣卫、东厂特务组织出面，下令逮捕了以戴铣、薄彦徽为首的二十一名上奏的言官，每人责打三十廷杖，下了诏狱。

从驱逐内阁重臣，到逮捕御史言官，这是皇帝对文臣的打击逐渐扩大化的标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₂₉王阳明这个小小的兵部武选清吏司六品主事因过于相信正直和忠诚的力

量，给皇帝上了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请求皇帝释放被收押的御史言官们，贸然上奏抨击朝政，为被冤枉的御史言官求情。本以为凭着一颗忠心给皇帝献上一勺清冽的甘泉，可以让僵持的朝局降降温，哪想到这疯狂的朝廷却是一口滚油锅，一瓢凉水浇上去，即时就炸了。这位朝廷下层官员的一片忠心不被接受，反而被正德皇帝朱厚照下令重重责打了五十廷杖，关进诏狱里等死。

此时是大明正德元年的十一月间，北京城的天气异样的冷，锦衣卫诏狱里更是奇寒彻骨，终年不见阳光的牢房里潮湿霉朽，腥臭难闻，狭窄的过道里昏灯如豆，恍惚照见砖壁上面目狰狞的狱神像。在坟穴般的囚室里，浑身是血的王阳明辗转挣扎，想为自己寻一条活路。

廷杖之刑自古就有，可在明朝，这套刑罚用得最多。

廷杖这种刑具多是用栗木做成，因为栗木够硬，打起人来特别有劲，而且这种木材天生就是黑沉沉的颜色，冷硬阴黑，凶神恶煞，这套东西用来镇压百姓是最合适的，连孔子的弟子都教鲁哀公用栗木雕刻神社里的“社主”，取一个“使民战栗”之意。从此以后，古代衙门的大堂上站的皂吏个个身黑皮，黑着一张面孔，手里提着一根黑硬的栗木棍子，囚笼、木枷之类的刑具器械也常用栗木制成，就连官府的正堂、刑部大狱的正门上悬挂的那个形似虎头、恶狠狠的龙子狴犴，以及监牢里供奉的狱神像，也多是栗木雕刻，凶神恶煞的样子，着实令人战栗。

在明朝以前，这根又硬又黑的栗木棍子只是使“民”战栗，倒是很少与官员的身体接触，因

为历代王朝都讲究一个“君臣共治”，皇帝给大臣们留着天大的面子，这里还有个说道，叫“刑不上大夫”。

据孔子解释，周朝的法律规定贵族犯了罪，不必出动人手去捕拿捆绑，而是令其自己来投案认罪，如果犯了大罪也不必公开处死，只命其自杀，以保存贵族的“体面”，但据《春秋》记载，这些贵族犯罪之后来投案的不多，潜逃国外的倒不少，单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大夫臧孙赐、子家羁、阳虎、公山不狃等人，犯罪之后一个个都逃到别国去了。

到了后世，周朝“刑不上大夫”的成法被改成了“八议”，即所谓：亲（皇亲国戚）、故（皇帝故旧）、贤（德行出众）、能（才干过人）、功（立有大功）、贵（三品以上）³²、勤（勤于政事）、宾（尊为国宾），这八种人犯了大罪不能由执法机关定罪，

必须奏明皇帝，再由大臣公议，如果判定犯有死罪，就命其自杀，或者“戮于朝”，而不必像平民百姓那样被绑出去砍头。到北宋神宗年间更是明文规定，黥、杖之刑不用于官员，只有普通百姓或者像押司宋江、提辖杨志之类的小吏才会受这样侮辱人格的刑罚。

可自大明王朝建立以后，在皇帝眼里，大臣们的人格降了一个等级，这凶狠的廷杖也开始叫官员们战栗起来了。最早使用这种刑罚的是太祖皇帝朱元璋，但他首次使用的却不是廷杖，而是鞭子。

朱元璋是个有趣的皇帝，刚得天下的时候，谋臣刘伯温劝他“古代公卿有罪，通常旨请自裁，不轻易施以污辱之刑，以存大臣体统”，这位草莽英豪出身的皇帝深以为然，在洪武三年（1370）

建立了一个宗人府，专门掌管皇族赏罚诸事，对大臣们也一度表现出“存体统”的客气样子。但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之罪杀了宰相胡惟庸，从此永远废除宰相之权，把天下权力尽集于皇帝一身，到这时候，君为主，臣为奴，早先的“君臣共治”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笑话，洪武皇帝再给大臣们留面子、“存体统”，似乎也就没必要了。

正在朱元璋狠下心来准备整治大臣的时候，却因为犯了一次糊涂，错杀了好人，恼羞成怒之下，回过手来杀了陷害好官的永嘉侯朱亮祖，而这次杀人倒给了朱元璋一份灵感，也从此开了廷杖之刑的先例。

朱亮祖是明军中出了名的猛将，打起仗来奋勇无敌，但人没什么文化，品行也不良，镇守广东的时候在当地横行不法，“作为擅专，贪取尤重”，

被番禺知县道同弹劾，朱亮祖官高权大，哪肯示弱，当即反咬一口，也上奏弹劾道同。结果是朱亮祖的奏章先进了京，朱元璋远在京城不明真相，加之这一年正在处理胡惟庸谋逆大案，把一个谋逆案越审越宽，株连日广，问罪下狱者不计其数，前后杀人已达三万有余，杀顺手了，看了朱亮祖的奏章也没细审，一怒之下立刻下旨杀了番禺知县道同。

又过了些日子，朱元璋才接到道同的奏章，这才得知真情，可已经来不及了，县令道同已被朱皇帝错杀。朱元璋又羞又恼，又想起朱亮祖镇守广东正是胡惟庸推荐的，一气之下，立刻下令把朱亮祖逮到京城，未经审判，一顿鞭子活活打死。

鞭死朱亮祖后，朱元璋的气也平了，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种加强独裁统治的办法，于是借着“惩罚恶官”这个由头订下一项制度：但凡

皇帝认为大臣有了罪过，可以不经审讯，立刻使用杖刑。

从朱元璋以后，皇帝不经审判就责打大臣渐渐成了“规矩”，草率野蛮、蒙古味儿十足的鞭子也被看着更“郑重其事”的栗木棍子所取代。这使朝廷百官战栗不已的廷杖之刑就此确立，并以这种方式正告世人：大明朝是朱皇帝一家的私产，而朱皇帝治国用的是“人治天下”的帝王之术，在这个国家和朝廷里，一切法律条文全都形同虚设。皇帝责打臣子就像主人打一条狗，没有原因，莫问道理，打残打死全由皇帝的一个眼色来决定。

这廷杖之刑通常由锦衣卫旗校执行，另有皇帝派来的心腹太监在一旁监视。和所有置于法律之外的东西一样，廷杖的刑罚也充满了“潜规则”，
36监刑太监有时秉承皇帝心意，有时则出于自己的

私心，暗中操纵着廷杖的轻重，其办法早先是用暗语，比如要对某个犯罪的官员从轻用刑，走走形式，假打一顿，太监就会对用刑的人说：“打着问”；要把受刑人打得见血带伤时就说：“好生打着问”；要对受害人下死手的时候则说：“好生着实打着问。”这七个字一出口，锦衣卫就会下死手，受刑之人就算不死也要伤残。

到后来，这帮太监大概也知道早先定下的暗语已经被人识破，加之自明朝中叶以后，朝局越来越黑暗，皇帝和大臣越来越对立，把臣子往死里打的情况越来越多，“打着问”那种假打几乎没有了，只剩了下狠手、下死手两种选择，太监们也就与时俱进，干脆把暗语改成了暗号：行刑人偷看太监的双脚，如果脚跟并拢，脚尖张开，则为“好生打着问”之意，³⁷掌刑之人就要从重用刑，撕肉溅血，伤筋断骨；而如果太监的脚尖并拢，

就是下死手的意思，受刑的人往往就难活命了。

明朝的锦衣卫使用廷杖的技术是非常有讲究的，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很注重实战意识。据说他们用牛皮做成一个假人，往里面塞上砖头，先练怎么打死人，一直要练到打完之后牛皮上一点痕迹不留，而揭开牛皮，里面的砖头却已粉碎的程度。

练好这一层，再练怎么打而不“死”，要求是在牛皮上裹一层薄薄的宣纸，然后挥汗如雨用力猛打，打完之后，牛皮上蒙的纸都不破。想来殴打王阳明的那些锦衣卫还没练成这么深的功夫。那些锦衣卫要真能连砖头都打碎了，这五十杖打下来，想必王阳明早已内脏破裂而死，绝不会留有性命。

廷杖虽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残酷刑罚，早先却也稍稍顾着大臣的性命和体面，比如不剥衣服，
38还允许受杖之人穿上棉套裤，甚至可以往棉裤里

多垫几层棉花，打的时候也不下死手，只是为了罚他，“示辱而已”，打疼了就行。可这一次王阳明受的廷杖却与众不同，竟是裸身受杖，也就是被拖到午门之内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剥光了衣服打板子，这样做既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同时又等于加重了刑罚。再加上皇帝给太监下的令是“好生着实打着问”，也就是说，要当着百官的面把这个犯颜上谏的六品主事活活打死，用他的血来警告官员，杀鸡儆猴。按理王阳明应该命丧杖底才对，可意外的是五十廷杖打下来，王阳明刑伤极重，几次昏厥，却留有一口气，没有死。

可见，王阳明骨头特硬，打而不死。但毕竟这顿棍子是“好生着实打着问”的，五十杖打下来，王阳明也只剩最后一口气，又立刻被锦衣卫拖走，³⁹投入了诏狱。至于他为了皇家利益而上奏劝谏的

一番忠心，皇帝根本就不在乎。

忠而见弃，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很多忠心耿耿的大臣往往因为“忠而见弃”，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而崩溃。现在躺在黑牢里的王阳明也快要崩溃了，而他正拼命打起精神，强迫自己寻找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像一只趁着夜色爬到树梢的蝉，已经不可能再退回泥地上的小洞里栖身，要想在这残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只有逼着自己的身体从坚硬的甲壳里挣脱出来，尽快学会飞翔。但能否活着挣脱出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王阳明的苦痛，在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挨这顿打。

阳明先生这次冒死进谏，在他想来，既是为言官们求情，也是一心想维护皇家的面子，对正德皇帝是一片赤诚忠心，所以他在奏章里说的全₄₀是劝人的话：“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

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

“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非果有意怒绝之也……”

一厢情愿，硬把皇帝的心思往善良之处设想，这才是王阳明挨打的原因。

但王阳明并不知道自己过于天真，做了傻事，在挨打之前他也不可能面对现实，承认自己的傻，所以他还是一味地劝说在皇帝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又说正德皇帝迫害言官，“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如果皇帝肯听劝，释放被捕的御史和给事中，则“⁴¹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

不休哉”，又说“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说来说去，始终在强调皇帝和大臣都是同伙，“同伙”之间不要互相下死手，皇帝得给大臣留点儿面子…

王阳明写这道奏章时，朝局正处在暴风眼上，情势非常危险，阳明先生自己也很紧张，所谓“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不胜干冒战栗之至”。可另一方面，阳明先生显然又觉得自己说这些话是完全正确的，就故意引用皇帝圣旨里的话“政事行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来和皇帝抬杠。这么看来，阳明先生心里虽然紧张，却并不害怕，反而信心十足。

只可惜此时的王阳明还不是一位透彻明白的心学宗师，还没有擦亮“良知”这面明镜，所以他怎么也看不破皇帝和刘瑾本是一党，想不到刘瑾这个凶恶的阉奴，⁴²其实只是正德皇帝的打手而已。在王阳明想来，刘瑾是恶人，正德皇帝是好人，

现在朝廷里发生这样的事，都是因为“恶人”用欺骗之言蒙蔽了“好人”，所以阳明先生上奏指责坏人，规劝好人，心里是坦然的，是理直气壮的。

正是这么一种善恶不分的愚忠和“理直气壮”的心态，给了王阳明上奏的信心和勇气，可也正是被这一片愚忠蒙住了眼睛，万万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一道奏章而遭到残酷打击和人格侮辱。

忠而见弃，这让王阳明在精神上难以接受，随即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准备退出朝廷，一走了之。

当然，眼下阳明先生还被锁在诏狱的铁笼子里。即使出了牢笼，他仍将遭到贬谪，接受惩罚。抽身隐退，逃回家乡去躬耕自食，平平静静混过下半辈子，这对身陷牢笼的他来说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走掉了。

三 牢笼里的小算盘

王阳明受杖下狱的同时，礼部左侍郎王华也遭到正德皇帝的排斥，调任南京吏部尚书，被踢出京师扔到南京坐冷板凳去了。

明朝开国之时建都南京，后来明太宗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皇权，就把京城迁到了北京，但在南京还保留了一套官员的班子。这些南京的官员有官无权，有名无实，白领一份俸禄，整日无事可做。

王华现在从北京的礼部侍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就是典型的明升暗降，既夺去了他的实权，又割断了他在京城的人脉关系，把这位深孚众望

的朝廷重臣架空了。结果王华这么一位顶级官僚在政治风暴中竟变得毫无力量，连自己正受到迫害的儿子都无力拯救了。

现在等待王阳明的是一个异常绝望的黑暗结局。他被关押在锦衣卫的诏狱里，这是全国最大最阴惨的一座监狱，连以残暴著称的明太祖都无法忍视。在洪武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但靠着“靖难之役”夺取天下的明太宗朱棣却在登极不久就恢复了锦衣卫，还扩建了诏狱，专以“勋戚都督领之”，从此锦衣卫成了明代最大的特务组织，横行无忌，终明一朝，害人无数。

封建时代的监狱是个完全没有人性的地方。
因为在那个时代，囚禁的目的并不是对犯人的罪

行施以惩罚，而是要通过对被囚禁者的虐待和折磨来显扬王法和霸道，用暴力威吓百姓和官员。所以古代的监狱总是尽可能地虐待囚徒，从肉体上折磨他们，从人格上侮辱他们。诏狱则是一切折磨和迫害的集大成者。

诏狱里的牢房都是半地穴式的，狭小潮湿，墙角一个两尺宽的土台子就是床，受了刑伤的犯人们就蜷缩着身子躺在上面，囚室里血污便溺臭气熏天，墙缝里爬满了各种寄生虫，牢房的窗子都尽可能开得最小，上面还用手臂粗的木栏遮挡，与其说是防止囚犯越狱，不如说是故意要切断照进囚室的光线，以至于就算是白天，囚室里的犯人不用油灯也无法看清文字。

当然，被囚在这里的人，也没有文字可看。

在这所监狱里，囚徒们几乎得不到什么食物，
也禁止发出任何声响，喊冤、哭泣甚至过于频繁

的咳嗽都将招来一顿暴打。他们随时面对的是锦衣卫特务机关的提审和毫无人性的刑罚，任何一名囚犯都可能悄无声息地死在牢里，如刑伤、病痛，或者被东厂特务暗中杀害——然后对外宣称是伤病而死，那些被害死的人被趁夜抬出囚室，从狱神像的砖墙上开的一个小洞拖出去，立刻掩埋或焚毁，彻底毁尸灭迹，死因无从查证，也根本无人敢查。

现在王阳明受了很重的刑伤，却得不到任何治疗，被下狱时已经是十一月，深冬天气，牢房里冷得像个寒水地狱，在这黑暗的牢笼里，王阳明面对着两重危机：死亡的威胁和信仰的破灭。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畏惧死亡，阳明先生也不例外，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无声无息地死在诏狱里。但如今的他正处于难以名状的绝望和焦虑中，
47

要想养好刑伤，恢复健康，熬到重获自由的一天，他就必须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点，先站稳脚跟，从心理上释怀了，伤才能慢慢养好。

于是年轻幼稚又没有政治经验的阳明先生在诏狱里做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深思。不过这次思考并不是一场有哲理的思辨，而是一套有关自身生死荣辱的小算盘。经过反复揣摩朝政，掂量利害关系，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能熬过刑伤，不至于病死，自己大概不会把一条性命断送在牢狱里。

对眼下的势态，阳明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这次大规模迫害朝臣的政治事件起于内阁和宦官特务集团的直接冲突，而案件发酵却源于御史、给事中的抗谏。相对于内阁和“八虎集团”的生死较量，或者御史、给事中对皇帝和宦官的正面指责，
48
王阳明和他那道内容相当温和的奏章，真的只能

算是一个小角色。所以阳明先生将来是生是死，主要是看皇帝对御史言官们的态度。

现在内阁失败，阁臣已被罢黜，没有内阁的支持，御史言官们孤掌难鸣。事实上，这些言官入狱之后居然没有几个人能出面营救，可见言官实在不足以成为一股威胁皇帝权威的力量。

在明朝，御史和给事中官职不高，但权力不小。这两类官员加起来共有一百六七十位，人数可谓不少，能上参皇帝阁臣，下参六部九卿，其中御史的级别较高，他们隶属都察院，分为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以至左右金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是朝廷耳目风纪之臣，体系完备，从地方到朝廷所有监察参劾之事都在其权限内。他们身上穿着与众不同的袍服，胸前补子上绣着一只神兽，名为“獬豸”，它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

头生独角，力大无穷，公正无私，能审善察恶，一旦发现恶人，就会猛扑过来把人撕碎。如此看来，言官们的威严不可谓不重。而官居七品的给事中，力量比御史言官们还要大一些。

大明朝廷设立的给事中共有五十二位，他们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小官，可这七品的给事中却掌管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另外又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各部各司的公务执行情况。甚而在乡试中担任会考官，会试中担任同考官，殿试之时担任受卷官。朝廷册封宗室、藩王或者派使臣出国公干时，给事中也可以担任正、副使节，同时还有权受理案件诉讼等事项，虽然官卑职小，权力却重，很多时候，₅₀这些七品小官的表现比御史们更强硬些。

其实说穿了，这些御史、给事中只是白穿一件獬豸补子的袍服，却并不像这头传说中的“任法神兽”那么勇猛无畏，能把坏人生吞活剥。很多时候，这些官卑职小的御史、给事中们也会与朝廷重臣拉帮结派，在权臣们互相攻讦时充当打手。而在皇帝眼里，这些徒有其名的言官们只是朝廷的“门面”，摆在那里做样子的，只长着一张骂人的大嘴，其实手里没有任何实权，虽有参劾的权力，但干预朝政的力量却微不足道，皇帝也实在没必要对他们痛下杀手。

这次正德皇帝在朝廷里发动政变，公然驱逐阁臣，手段异常粗暴，已经坏了朝廷的规矩，现在他又命刘瑾这帮特务捕拿、迫害御史和给事中，更是违了“祖制”，如果特务们再公然杀害御史和给事中，朝局的矛盾将变得愈发不可收拾。所以就算皇帝再强硬，阉党再凶狠，也实在没必要

擅杀言官。

既然皇帝和他手下的特务们不愿意擅杀御史和给事中，这些特务当然更不会擅杀王阳明这个为言官们求情的小小主事。而且一旦阉党停止迫害言官，最先被释放出狱的就应该是王阳明。

想到这儿，阳明先生心里踏实了一些，干脆在牢里静养起来，自己给自己疗伤，闲来无事就和狱友们讲谈学问，还先后写了十几首诗，后来集成“狱中诗十四首”一直留传下来。其中一首《不寐》诗这样写道：

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

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

山崖再高，我能登上去；水流再深，我能游过去，可这日月（大明朝廷）之事呀，怎么这么扰乱我的心？山谷迤逦，烟霞错落，匡扶这个乱世让“贤达”去做吧，我打算回乡下种地去了。

这首小诗拿“日月”来指代明朝，大概是开规避文字狱的此类文字之先河。而王阳明在这里表露出来的，却是一番明确的退意。

这一次，阳明先生和他的老父亲王华的想法不谋而合。

四 阳明先生的颓废

当王阳明因上奏劝说皇帝而被关进诏狱的时候，刘瑾曾派人来找过王华，提出只要王华愿意登门拜见，刘瑾可以奏请皇帝重用他——也就是

说可以安排王华人阁。

这个“安排”实际上一点也不奇怪，早在前朝孝宗皇帝的时代，王华就是有实力入主内阁的候选人之一，同时又被孝宗皇帝委任为太子的辅导官，孝宗皇帝让王华这样亲近太子，本就是安排他担任太子的辅弼之臣。现在太子成了正德皇帝，而且一次就罢免了两位辅臣，内阁之位虚悬，王华身为太子的老师，有了如此“良机”，正应该在正德一朝大贵大显，成为一位阁臣，好生辅佐皇帝。

这么看来，请王华人阁显然不是刘瑾的意思，是在刘瑾背后刚刚清洗了满朝大臣的正德皇帝的意图。

王华和正德皇帝之间有很深的渊源，让他入阁，既符合孝宗皇帝生前的安排，又是正德皇帝自己的希望，同时王华在朝臣中间正直有为，坦

诚君子，名声一向很好，让他入阁很能服众。有这么一个既贴心又有口碑的老臣子入阁主持朝局，对正德来说，求之不得。

但王华回绝了皇帝的邀请，不但拒绝出任阁臣，甚至拒绝通过向刘瑾等人低头，来拯救亲生儿子的性命。

王华这样做也是丝毫不奇怪的。作为一位城府极深的高级官僚，王华有他的一番考虑：正德皇帝悍然发动政变，罢黜阁臣，行为暴烈，背离祖制，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内阁班子一定是不稳固的，现在即使入阁，也不可能长久保持地位，相反，他会因为在这个时候入阁而涉嫌参与迫害朝臣，使自己在政治名誉和人格方面留下污点。

王华坚决拒绝与正德皇帝同流合污，致使其调出京城充任南京吏部尚书，意味着正德皇帝把他从内阁候选人的名单中剔除了。

这种结果倒是王华愿意看到的，他对政治已心灰意懒，于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京城，到南京去做他那南京吏部尚书的闲散差事去了。

其后不久，刘瑾又找借口陷害王华，王华也极识时务，急流勇退，借着陷害迅速辞职，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政坛。

五年后，刘瑾倒台，被他陷害的大臣纷纷复职，王阳明也回到京城继续做官，并打算上奏为父亲辩白，希望父亲能够复出，但王华是个心思如镜的人，对政治看得太透彻，比任何人都更冷静也更实际，他清楚地知道朝廷中真正的邪恶并非来自刘瑾，而是来自坐在龙椅上的正德皇帝，所以在正德一朝，任何一位辅臣都难以保全名誉和气节。

“生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中国古代官员们一生奉行不渝的精神信念。此时的王华已经

决定放弃仕途，一味关心自己的气节和名誉了。

对王华而言，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但王阳明在政治上远没有父亲那样的城府，身陷牢笼的他正左右为难，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这一刻，对皇帝的愚忠破灭了，对朝廷的期望消失了，可三十多年洗脑的结果并不会一下子消失，在王阳明内心深处仍然希望把“效忠皇帝”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现实是残酷的，皇帝和朝廷已经彻底抛弃了他，不再接受他的“效忠”了。

失去信仰的阳明先生，就像一只被捏碎了硬壳的螺蛳，碎片仍然挂在他的身上，这些碎片已经不能保护他的灵魂，反而像 J1 片一样不断碰撞和切割着他的伤口。随着时间推移，廷杖造成的伤痛慢慢减轻，可心灵上的创伤却不知该如何治

愈。

官场的挫折，信仰的破灭，使王阳明产生了悲观情绪，他打算学习自己的老父亲，急流勇退，离开官场，从此做一个无欲无求的乡间野人。

为了验证自己这番退意“有道理”，王阳明又在牢里默背《易经》第三十四卦的卦词，用古人的智慧为自己指路，同时用这半是哲理半是“天命”的东西来麻醉神经，为逃避现实找一个借口。

《易经》是一本奇书，没人知道这本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其中所载卦象分别针对哪种人生际遇，所指无不直达关键，而提出的解决之道又精妙至极，令人叹服，就像无数历尽沧桑的智者坐在一起，把他们一生的际遇和应对危难的智慧统统讲述出来，再由一位了不起的哲人归纳总结，成就此书。虽然这本奇书成书年代久远难考，可就算在今天看来，⁵⁸它也不失为实用哲学的巅峰之

作。当年孔子读《易经》，赞叹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此言非虚。

眼下走投无路的王阳明在牢里给自己算了一卦，是个“遁卦”，退避之象。所谓“君子好遁，小人否也”，意思是说君子该退避的时候就退避，小人却做不到。

既然君子当退则退，王阳明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抽身退走了。

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是个性格敏感、脆弱的人。现在，脆弱的阳明先生就这样把《易经》当成治疗心灵创伤的灵药，用卦词给自己逃避现实的思路找到了合适的借口，又用这个借口安慰自己的灵魂。

有了借口，王阳明精神压力就减轻了。得意之下，阳明先生还吟了一首小诗凑趣儿：

遁四获我心，盍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簞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
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诗写得很一般，大概此时的王阳明实在没什么灵感，但诗里这份“精神脱困”之后自得其乐的感觉倒是很明显。这首诗里还透出了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阳明先生明知道自己门第显赫，家资不菲，就算以后不做官了，当一个地主总还不难，怎么也不至于像孔门的颜回那样“簞食瓢饮”清苦度日。想到这儿，他也忍不住说出“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这样的轻巧话儿来。

这就是阳明先生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只是这次思想上的“突围”⁶⁰既与心学理念不合拍，又

严重违背了阳明先生日后的“知行合一”的观点，更与先生后半生的事功格格不入，说是“突围”，实则只能算是落荒而逃罢了。

很难想象，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心学宗师为什么不用他那积极上进、“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来开导自己，而偏要纠缠在这些颓废消极的想法中呢？

事实上，此刻在诏狱中的王阳明不要说是什么“心学宗师”，他根本连“心学”二字都还没有入门。

在明朝，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朱熹确立的“理学”，而理学的标准教科书就是其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所有想考科举、想做官的儒生都必须熟读《四书章句集注》以作为跻身仕途的敲门砖。

王华是位状元公，能考中状元，也意味着他是理学门徒。阳明先生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来自“理学”，在他前半生的经历中，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这位“心学宗师”在正德元年受廷杖、下诏狱之前（阳明先生时年三十五岁）曾经系统地学习过心学理论。

唯一和心学扯得上关系的，就是正德元年阳明先生在京师结识了一位名叫湛若水的广东学子，两人成了好朋友，并曾经一起讲学。这位湛若水先生是心学大师陈献章的弟子，而陈献章是一位“学患不骼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的心学传人，他的高足湛若水也于心学大有领悟，早年就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大道理，在心学方面入门远比阳明要早，其后在学术方面也一直与阳明先生齐名。

阳明先生去世后，湛若水为他题写墓志铭，

其中提到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正德丙寅，就是正德元年（1506），也就是王阳明获罪下狱这一年。

湛若水是阳明先生的至交，而从阳明先生在锦衣卫监狱里表现出的“逃避”心态来看，这位后来的心学宗师，在“正德丙寅”之前，确实与心学毫无关联。

也就是说，王阳明竟然是在受廷杖、下诏狱之后才渐渐入了“心学”的门径，而且无师自通，登堂入室，进步惊人。半年后，在杭州与徐爱等人分别时，王阳明留下一篇《别三子序》已满是心学味道。继而又于正德三年“龙场悟道”，前后仅一年时间就已窥破心学的奥秘。

当然，这并不说明王阳明有什么神奇之处，只能说“心学”本身并不深奥，也不难懂。正像阳明先生自己说的：“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不但心学如此，自古至今所有哲学都一样，越是简单直白，就越有哲理。过多的论证、考据、训诂、辨析，以至人为地分割宗派，只会使哲学失去活力。

正因为心学是这样一种平易朴实的体系，根本没有“字眼儿”可抠，这种哲学思想才会显得如此伟大，如此光明，如此不同凡响。

第二次
龙场悟道，良知自救

一 杭州城外的追杀

早前王阳明对于朝政走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自从赶走两位阁老，罢黜了一批重臣之后，正德皇帝已经掌握了朝中大权，又抓住南京科道官员上奏请求留下内阁辅臣的机会，借太监刘瑾的手对言官和中下层文臣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洗，这场大清洗为期三个多月，抓了一批人，打了一批人，罢免了一批人。

正德皇帝对朝廷的大清洗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些文臣被迫害打倒之后，⁶⁵大明朝上上下下两

万多名文官再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全国六千万百姓个个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当年孔夫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羡慕这位老夫子生在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因为孔子显然对于“文字狱”的凶狠毫无体会。

到这时候，正德皇帝和刘瑾都觉得局势已在控制之中，敢说话的人都被收拾干净，皇权的绝对独裁已经重新确立，皇帝也可以对朝臣们松松手了，于是在过完大年之后，正德皇帝开了天恩，决定把在押的科道言官们逐批放出诏狱，给他们活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这些惹事的官员们很快就一个个被悄无声息地贬官外放，赶出京城去了。

皇帝微笑了，言官被释放了，朝局缓和了，
66
那个上奏为言官求情而获罪的王阳明也一起被放

了出来，立刻接了圣旨，被贬到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

驿丞，是大明朝所有官职里最卑微的一级，朝廷的九品十八级官员里没有它的名号。不仅是这么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小官儿，而且还被贬到千里之外的穷山恶水间。至于“龙场”在何处，王阳明闻所未闻。

此时王华因为不肯攀附阉党，已被赶出了京城。王阳明在京里没有什么亲戚，又失去了所有靠山，变得异常脆弱，连个立足之处都没有了。一夜之间，王阳明的人生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从前途光明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个见人矮三分的罪臣，一个连口级都没有的“犯官”。

好在此时阳明先生刑伤初愈，已能行动如常，京城除了让人恶心的奸贼，就只剩让人伤心的回忆，实在也无可留恋，于是王阳明立刻收拾行李

上了路。

王阳明毕竟是个享惯了福的人，让他一个人孤身远赴绝域，到贵州深山里去吃苦受罪，心里是不肯的。于是先从通州上船，沿着京杭运河到了杭州，本意是想到杭州略事休息之后绕道去一趟南京，和父亲见上一面，把未来前途商量一下，生活上安排一下，筹备些银两，带一两个靠得住的仆人，再到贵州去上任。却想不到他自幼体质弱，又有咳嗽的病根子，前面受了杖刑，关了诏狱，受了一场大罪，身体更加亏虚，现在又一路舟车劳顿，人一到杭州就病倒了，只好找了一间胜果寺躺倒养病，哪知病还没养好，两个锦衣卫的杀手就追到了杭州。

这两个刺客是刘瑾派来的。

68

刘瑾其人凶如虎狼，杀人如麻。自从掌握大

权之后，这个太监已经安排了多次暗杀，在其后掌权的几年里，他更是经常使用这种手段对付政敌，到底杀害了多少人，无法统计。被史书记载的几次恶性事件有：暗杀原司礼监反对他的提督东厂太监王岳；暗杀司礼监秉笔太监范亨；对司礼监另一个秉笔太监徐智暗杀未遂；在京城暗杀都给事中许天锡；派人刺杀户部尚书韩文，好在韩文机警异常，听闻风声之后弃官而逃，穿便服，走小路，潜回家乡，这才幸免于难。

杀了几个对头之后，刘瑾盯住了王阳明。

在刘瑾想来，王阳明是继朝廷重臣、御史言官之后，第三批上奏找阉党麻烦的第一个官员，杀了他，大概能对所有臣子起一个警示作用，告诫他们：刘瑾的势力足抵得半个皇帝，天下人不论是谁，得罪刘瑾的下场就是死，即使皇帝赦免他们的罪，也仍有可能被特务们干掉。

眼下这两个刺客是刘瑾直接派来的锦衣卫，他们对王阳明的追杀其实是半公开化的。现在这两个凶悍的刺客就住在胜果寺里，在王阳明身边若隐若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却并不急着动手，分明是想等王阳明离开杭州之后，在半路上对他下手。以这两个人的身手，一抬手就可以取了王阳明的性命，此时真是死生顷刻，危险到极点。

好在王阳明是个聪明人，生性敏感，尤其是在这种危险时刻，他的直觉比平时更敏锐，警觉性更高。

眼下王阳明落了大难，孤身住在异域他乡，又忽然出现这么两个可疑的人，说话带有京城口音，王阳明立刻觉得不对，加上他几年来一直在刑部担任职务，又曾到地方上去审决囚犯，和抓差办案的捕快们打过不少交道，对这些人的言谈举止、职业习惯比较了解，面前这两个人的口音、

眼神、体态和一些习惯动作，以及在胜果寺里突兀的现身，都让王阳明警觉起来。当这些特务监视王阳明的时候，阳明先生也在暗中观察他们，而且很快就识破了这两个人的身份。

但王阳明也知道这些特务势力太大，杀人的手段又凌厉，自己是个书生，生着病，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连夜逃亡也难，因为天下处处有锦衣卫，自己纵然逃出杭州，也终究逃不出这些人的手掌；一直待在寺里不走也不行，两个刺客不会等他，说不定哪天晚上悄悄摸进来就下了毒手，就算呼救也没有用，根本没有人敢上前来管，因为面对凶手的时候，大明朝的百姓们照例都是一声不吭的。

好在王阳明足够聪明，又早就看破了两个刺客的嘴脸，在这件事上占了先手，绝境中冥思苦想，倒琢磨出一个办法来：他假装对刺客的出现毫无

察觉，照样在庙里住着，每日长吁短叹，装出一副颓废消沉的模样，故意做样子给这两个刺客看，然后趁着深夜溜出了杭州城，来到钱塘江边，把自己的衣帽脱了放在岸上，留下一首《绝命诗》。

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至此欲何如。
生曾许国楚无补，死无忘亲恨不余。
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
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江涛泣子胥。
敢将世道一身担，显被生刑万死甘。
满腹文章宁有用，百年臣子独无楚。

涓流裨海今真见，片雪填沟旧齿淡。昔代衣冠谁上品，状元门第好奇男。

这首诗写得真糟糕，尤其是越往后，词句越糟，看来阳明先生当时也是心慌意乱。其中“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两句意思非常明白，

就是阳明先生绝望之下，已经投江自尽了。

搞了这么一个自杀的假现场之后，王阳明再也没回胜果寺，而是沿江而行，隐入江湖去了。

其实阳明先生这个自杀的假现场并不算特别高明，这些锦衣卫都是办案的老手，细细勘察之下，难保不给他们看出破绽。如果被他们看出毛病，那么对王阳明的追杀就将继续。可说来也巧，王阳明的“自杀”居然引发了杭州城里一群高官的呼应，结果把一个“自杀事件”硬生生地弄假成真了。

原来这一年正是乡试之年，王阳明的弟弟王守章到杭州来考举人，起先还不知王阳明也从京城来到杭州，并未会面，尔后忽然市井风闻“浙江名士王守仁跳江自杀”，⁷³守章大惊，急忙换了素服带着祭礼赶到江边哭祭，结果这一场祭礼惊

动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时任杭州知府的杨孟瑛。

杨孟瑛是涪州丰都县人，在杭州做了六年知府，为官清正，治民有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官员，杭州人呼为“贤太守”。眼见杭州西湖日渐淤积，已将要废弃，这位知府下大力气整修西湖，为杭州保全了这一方胜景。

阳明“自杀”之时，杨孟瑛正带着民工疏浚西湖，日夜赶工，忽然听说浙江名士王阳明投钱塘江而死，大吃一惊。

阳明先生是状元公之子，本人又有诗名，在北京还不显，但在浙江却俨然是一位名士，这一次又因为上谏皇帝，力斥奸党，受了牢狱之苦，贬官外放，忠直之名传于天下。现在这位忠臣名士忽然在杭州投水自尽，引得这位为官刚正的杨知府满腹唏嘘，于是备下祭品到江边祭了一回。
74
这一来，更把事做大了。

杨孟瑛在杭州已经做了六年知府，名声极好，百姓拥戴，现在他到江边祭祀阳明先生，事情立时传开了，都说是“贤太守”来祭“大忠臣”，结果越传越广，人尽皆知，引得杭州不少书生、名士纷纷到江边来凑热闹，最后连浙江按察司、布政司都来了。

眼看钱塘江边高官显贵、名士文人此来彼往，热闹非常，两个刺客终于认定阳明先生确实已死，这才回京复命去了。

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想办法混上一条海船，漂出钱塘江一路到了福建。

因忠见弃，下狱受罪，已令王阳明悲愤、忧怨，再加上被人暗害带来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创伤，王阳明完全陷入了消沉绝望的情绪之中。经过反复思考，王阳明竟做出一个极不明智的决定：先

逃到福建去寻找一位朋友，在那里躲避一段时间，然后抛弃一切，就此出家做道士，摆脱世上的所有烦恼。

当然，说王阳明决定逃往福建投奔一位朋友，并有弃世出家的打算，这只是一个推测，它来自《王阳明全集》。按书里的说法：阳明先生逃过刺客追杀之后，搭上一条商船一路出海到了福建，登岸之后在深山里迷了路，天黑的时候想进一间寺庙借宿，可庙里的人不知他的来历，不肯让他进去，阳明先生就在外面睡了一夜。这里偏巧是个“虎穴”——老虎的家，当天晚上老虎回家，见阳明先生睡在这里，都不敢过来，阳明先生踏踏实实睡到第二天，和尚们以为他一定给老虎吃了，过来“收取行李”，一看，阳明先生竟安然无恙。

好狠心的和尚，这⁷⁶哪里是出家人？这简直是水泊梁山培训出来的贼人嘛。

更有趣的故事还在后面：庙里有个人忽然写了一张纸条给阳明先生，上面写着“二十年前会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原来这个人竟是二十年前在江西南昌铁柱宫曾和阳明先生有一面之缘的道士，现在未卜先知，知道阳明先生来了，所以请他来聊天……

全是无稽之谈，不值得再说下去了。

但从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里可以推出一个简单的真相：王阳明从杭州脱险后，眼看无处安身，只好坐船逃到福建，投奔当地的一位朋友。结果这位朋友劝他说：“你现在被贬到龙场做驿丞，如果就此逃走，刘瑾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去迫害你父亲，还是到龙场去，熬过这三年的谪戍期以后，再作别的打算吧。”⁷⁷阳明先生被这位朋友说服，又得到朋友的资助，就从福建一路返回了南京。

此时的王阳明当然不敢肯定他是否已经侥幸避过了追杀，心里难免恐慌，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所以在回程中，阳明先生显得很谨慎。他没有走捷径，从海路回杭州再转往南京，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先横穿福建一省进入江西，在半路上还顺道游览了风景名胜武夷山，从这里进江西之后，又辗转到了南昌府一带，这里是早年王阳明的岳父诸让老先生做过官的地方，王阳明年轻时曾到南昌来迎娶夫人，与南昌的人脉更熟一些，这里应该有落脚之处，可以让他稍事休息。之后阳明先生从南昌下了鄱阳湖，由此出章江，入长江，从水路东下到了南京。

从杭州出走福建，再横穿福建全省进入江西，又纵穿半个江西到南京，这个弯子真是绕得够远，也足见当此危局，阳明先生心里是很有些惊惶的。
这一路上风餐露宿，冷暖寒薄无人问津，对王阳

明这位公子哥儿来说真是满腹辛酸，一言难尽，也是在这逃难的路上，阳明先生不得不第一次直面人生，学着自己照顾自己。

这一阶段流落江湖，同贩夫走卒打交道，事事亲力亲为，倒让王阳明这位贵公子长了见识，学了经验，也多多少少放下了身上那官二代的架子。

一路辗转，足足走了半年，王阳明总算到了南京，见到了还在担任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父子相见倒也悲喜交集。此时的王华对做官已经心灰意冷了，只想在南京任上混到退休罢了，但王阳明却还是个获罪贬谪的臣子，就算不愿意，他也必须在这条仕途上继续历练下去。

前一段王阳明在江湖间吃苦受罪，实属无奈，但他那公子哥儿的心性却没有变，一见老父亲，
不由地撒起娇来，就伸手要钱要仆人。于是老父

亲筹了些钱给儿子带上，又从府里挑选了两个忠实可靠的仆人，让他们跟着阳明一起去贵州赴任，相互有个照看。

辞别父亲，王阳明从南京又到杭州，准备由此出发前往贵州。

阳明先生第一次到杭州是正德二年的春夏之交，可第二次到杭州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朝局进一步缓和，刺杀活动也基本停止了，刘瑾虽然凶狠，但毕竟是个大忙人，上要奉承皇帝，下要笼络官员，罗织自己的党羽，还要急着索贿受贿，也实在没心思总琢磨着怎么去害王阳明这个贬到天边儿去的小官。所以王阳明一路走来，再也遇不见刺客了。再加上身边还有两个仆人陪伴，一个叫王祥，一个叫王瑞，加起来就是“祥瑞”，⁸⁰多么吉利！所以王阳明这一

次也就不再害怕，进杭州之后，照旧住在上次差点遇害的胜果寺里。

从夏天到深冬，这半年时间王阳明吃尽了苦头，也正是在这半年的艰苦磨难中，王阳明才有机会展开一场反思，由此渐渐出离理学，踏人心学的门径。也正是这次下杭州，阳明先生收了三位弟子，其中一个是他的妹夫徐爱。

徐爱，字曰仁，同是浙江余姚人，拜在阳明门下时才二十岁，第二年中进士，做过祁州知府，曾任南京兵部员外郎、南京工部郎中，正德十一年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当下普遍认为他是阳明先生的首徒。

收弟子，对王阳明来说也不是第一次，早先他在京城的时候也收过几个学生。只是那时候收学生讲的是糊涂学问，⁸¹现在收弟子讲的是明白学问。离开杭州时，王阳明写了一篇《别三子序》

送三位弟子，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阳明思想进入一个新天地的诸多苗头，其中开篇第一句是“自程、朱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无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

其中，“大儒没，道遂亡”，能看到这几个字，说明阳明先生已经是心有所思，思有所得了。

二不是悟，就是死

且说正德二年冬天，阳明先生带着两个仆人从杭州出发，到贵州省贵阳府城外的龙场驿站时，已经是正德三年的春天了。

龙场驿站设在贵阳城外的深山之中，离城九十多里。在今天看来，⁸²这九十多里路似乎不远，

但在当时，却是山高水远。

五百年前王阳明被贬到龙场之时，龙场一带还是一望无际的原始丛林，潮湿沉闷，荆棘遍地，野兽出没，毒虫肆虐，瘴气横生，外来之人水土不服，常会丧命。王阳明从小就体质虚弱，又挨了打，坐了牢，贬了官，被人追杀，先后得过几场病，身体糟得一塌糊涂，走进这片丛林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否活着出来。

和气候条件相比，当地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龙场驿站是从贵阳府进入水西宣慰司的门户，水西宣慰司处在贵州和四川、云南、广西四省交界之地，其土地东起威清，南抵安顺，北临赤水，西面更是深入四川省境直达乌撒。水西土司分成则窝则溪、于的则溪、化角则溪、六慕则溪、以著则溪、陇胯则溪、朵泥则溪、的独则溪、火著则溪、架勒则溪、安架则溪、雄所则溪、木胯则

溪等十三则溪，其中大土司自领“则窝则溪”，其他分别归土司的十二个宗亲管理，号称土地千里，军民四十八万，是整个贵州一省土地最多、实力最强的土司。

明朝建立的时候，派驻当地的都御史马骅曾试图发兵吞并水西，当时的彝族女土司奢香夫人凭着大智大勇化解了这一危机，其后为了表示归顺朝廷的诚意，奢香夫人在其领地上建起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九座驿站，以奢香驿为中心，联结成一个消息传递的网络，使朝廷和土司互通声气，既保证了朝廷的政令畅通，又让中原的文明教化流入水西的深山密林。

水西的大土司是彝族人，但其治下多民族混居，其中苗族人的势力一向很强。而龙场一带又是汉、苗、彝几个民族杂居之处，其中苗人占大

多数。这些苗人既受彝族土司的统治，又遭大明朝廷的欺压，只得结寨自保，逼到急处就会起兵造反。而水西的彝族土司和各大宗亲贵族之间千百年来也一直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血战不断，各族、各寨、各土舍土目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冲突。加之水西宣慰司与普安州相连，而普安又是苗民反抗明军的主要战场，水西土司在朝廷的授意下于普安一带连年交战，在水西土司领地附近又有播州土司、酉阳土司、黎恺土司以及广西南丹、那地一带岑氏土司的狼兵，湖广保靖、永顺一带彭氏土司的土兵……可以说，大明朝西南连续地区各路最凶悍的土司兵马，都分布在水西宣慰司的周边。

就是这么一块错综复杂的是非之地，数十年间，这一带方圆百里战乱不止，小小的龙场驿站，
85

就像这血腥战场中间的一座孤岛，背靠贵阳府城，面对千里蛮荒，仗着朝廷的势力和土司的保证，才能勉强维持下来。在这个地方当驿丞，随时可能染上瘟疫，病死在深山老林，或者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而被杀害，又或一不留神被猛兽拖入丛林，或被毒虫咬上一口不治而亡，一个人沦落到此，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是这么一座深山绝谷中的荒凉驿站，仅配置驿卒一名，铺盖二十三副，驿马二十三匹，加上王阳明和他带来的两个仆人，一共只有四个汉人。驿站虽然修了两间土房，可阳明先生是个被贬的犯官，依律他虽然是驿丞，却没有资格住进驿站，只能自己想办法。

面对困境，王阳明束手无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和仆人们一起动手砍树折枝，胡乱凑合着搭了几个齐肩高的小窝棚栖身。然而贵州深

山潮湿多雨，几场雨下来，小窝棚全垮了，人根本待不住。没办法，阳明先生只好到附近山上去寻找山洞，不久在驿站附近找到一个潮湿阴森的山穴，当地人管这地方叫“东洞”，虽然阴湿恶臭，好歹还能避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王阳明到这时也无选择余地，只能带着两个仆人钻进洞里安家了。

在这糟烂的破山洞里，衣服、粮食、器具，甚至人的手脚上，没有一处不发霉的，潮地方睡久了腰酸腿疼，咳嗽不止，王阳明本来就身子弱，年轻时又因为不爱惜身体，得过比较严重的肺病，要是在这阴暗潮湿的山洞里住几年，非落下一辈子的病根不可。在洞里住，还真不是个长久之计。

生计艰难倒在其次，对王阳明来说，自到龙场驿站，最难捱的要数这一天到晚无穷无尽的寂寞。

龙场驿站设在荒凉的大山深处，一年到头没有一件公事，寂寞像一条蛇紧紧缠在人身上，乏味到使人没有一丝想头儿。

深山里一年难得见到几个汉人，就这仅有几个汉人又都鬼鬼祟祟弄不清来历，王阳明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人。周边虽有几座苗寨，可苗人和汉人素来不和，对驿站上的人冷眼而视，从不往来。当地很穷，又经常打仗、仇杀，人口稀少，粮食短缺，有银子也未必买得到，何况阳明先生身上也没多少银子，弄得三个人经常吃不饱肚子。仆人们虽然想过这趟来贵州怕要吃苦受罪，却没想到把罪受到这个地步，在阳明面前难免抱怨几句，说出来的话很难听。

此时此地，王阳明也没有办法，只能以清高淡化困苦，用穷酸调剂孤独，写诗安慰自己：“88岂无数尺粮，轻裘吾不温？邈矣簞瓢子，此心期与

论？”

椽子数尺长的高级房子就别想啦，轻裘看来也是穿不上了，在这个破山洞里睡得好不好，身上暖不暖？阳明先生自己知道。至于说要跟“簞食瓢饮”的颜回比一比心态，阳明先生觉得眼下在这么个破山洞里窝着，又艰涩又委曲，说不出的凄美，道不尽的清高，真有资格跟颜回比一比“清苦”了。

原来初到龙场的时候，阳明先生竟是在用自怨自艾、自伤自怜的消极方式排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在这位未来的心学宗师身上，竟是一点积极因素都没有表现出来。

儒生们的审美观念自古就有一种奇怪的病态美，而这种病态美的最佳代表人物就是孔子门下那位贫穷的弟子颜回。阳明先生很喜欢拿自己比

颜回，在京城坐牢的时候就这么比过，现在困居龙场时又说同样的话。其实稍稍分析一下，他和颜回并没有多少可比性。

颜回这位春秋时代的古人是个平民百姓，他的穷是真穷，所谓箪食瓢饮居陋巷，颜回一生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可阳明先生实在不“穷”，是个官家少爷出身，家大业大，被贬了官到龙场来受罪，还带着两个仆人伺候他，所以王阳明的“穷”是装出来的，他其实是受不了这份穷困。

颜回虽然穷，却不改其乐；阳明先生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却是满腹牢骚。

颜子穷归穷，毕竟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至陷于绝境；阳明先生如今陷在深山野洞里，一条性命朝不保夕。

再说颜回虽然穷苦，⁹⁰身边还有孔子这位老师，以及一帮同学朋友讲论学问，互相帮助。王阳明

独居域外，只有野猪野鹿来看他，从中原逃出来的流民偶尔来“访”他，说穿了就是这些穷苦人没了活路，跑到驿站来弄点吃用，占些便宜，而阳明先生性情又太清高，瞧不上这些穷苦的人，和同是汉人的“亡命”之人没有话题。正是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住没得住，想没得想，自己把自己的活路一条条都堵上了。

据阳明的弟子后来说，此时的王阳明似乎对自身荣辱渐渐不再重视了，可是对“生死”二字却还不能看透，就弄个“石椁”，躺在里面反思，但反思了很久也没有结果。其实以王阳明现在的处境，哪里弄来一个什么“石椁”？他分明是把自己住的这个山洞比喻成了一个“石棺材”罢了。

躺在“石棺材”里的人，就算是个“活死人”了，两只脚还踩在地上，半个身子却已探进了死路。就是在这个石头棺材里，王阳明被迫对“生

死”二字做一番深刻彻骨的思考。只可惜，“生死”这个题目太大了，光靠坐着发呆，是不会得出什么结果来的。

那么，此时的王阳明真的把“荣辱”看淡了，只剩“生死”二字还参不透？

从精神层面来说，“生死荣辱”四个字是一体的。荣指有信心，有目标，有动力，也就是生气勃勃；辱指受了挫折，失了信心，没有目标，缺乏动力，也就是死气沉沉。王阳明现在不提荣辱，却提生死，其实是他对“荣辱”二字看得太重了，在“信仰”这一方面的疑惑太深了，以至于上升到了“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高度。

像这样一个因为愚忠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他的人生目标已经失去，自信心已经垮塌，在龙场驿站这么一个荒凉偏远、实际上已被朝廷抛弃的

地方，他生活的动力也已经消失殆尽。王阳明现在考虑的并不是“生死”二字，而是一个无法突破的“死结”。

所以阳明先生在深山野洞里枯坐的时候，说出了一句非常绝望的话：“吾惟俟命而已”——只是等死罢了。

躺在山洞里等死的时候，阳明先生写了一首《去妇叹》，借别人的事说自己的话，写得好不可怜。

委身奉箕帚，中道成弃捐。

苍蝇间白璧，君心亦何愆？

这哪是“去妇”诗？分明是“弃臣”王阳明在向皇帝撒娇呢！

感此摧肝肺，泪不可挥。

冈回行渐远，日落鸟群飞。

群鸟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初到龙场的王阳明竟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难怪他要躺在石棺材里等死了。

在困居龙场的时候，王阳明的情绪如此颓丧，如此糟糕，那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的思想忽然发生重大转变，以至于一夜悟道？是长时间思考，精诚所至？还是像他的弟子们说的那样，“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有神仙托梦告诉他的？

都不是。

关于龙场悟道，所有资料都把它解释得很含糊，甚而有些人把这一事件神秘化了，说王阳明静坐沉思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他身边耳语，于是豁然开朗，洞悉大道，以至纵声长啸。这些人也许是不知道“龙场悟道”的真境界，又或是

想用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把阳明先生捧成“圣人”，让后人崇敬他，进而崇奉心学，但为了传播学说而造假、造神，其实没什么意思。

实际上龙场悟道本身没有神秘之处，而是一股看起来实在不起眼的力量拯救了王阳明，这就是：跟他一起来龙场的两个仆人病了。

这两个仆人从南京一路追随阳明先生来到贵州，是来侍候这位公子爷的，可这一对“祥瑞”却显然没想到龙场的生活条件竟是如此之差，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加上“瘴气”的影响，两个人先后病倒了。

按说仆人的身体应该不比阳明先生更差，可王阳明还没有倒下，仆人倒双双病倒了。说到底，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平时不读书识字，他们的精神世界过于贫乏，文章诗词一概不通，《易经》、《坛经》一律不读，他们没法像王阳明那样用各种“穷

酸办法”去应付面前的困难，结果心里的烦躁怨气愈积愈重，时间一长，两个仆人都被自己的坏情绪压倒了。

对王阳明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龙场气候炎热，瘴气横生，瘟疫多发，又无医无药，外地来的人病死的极多。王阳明自己是个“罪臣”，被贬到龙场来受罪，就算病死了也没有办法，可仆人们并没有罪，只是跟着来伺候他的，如果病死在龙场，王阳明的良心将会永远不安，如今他只有用尽一切力量照顾他们。

服侍病人，不但要处处动手，更需要事事用心。王阳明是个傲气十足的公子哥儿，从来不用做那些杂事，更不懂得用诚心对待下人。现在事到临头，心里的良知逼着他不得不事事躬亲，时时用心，平生第一次学着煮饭、熬粥、服侍别人，关心呵护，问寒问暖。看到仆人意志消沉，就跟他们讲论文章，

或者念几首诗给他们解闷。

然而，诗词文章是公子哥儿的玩物，仆人哪有这样的雅兴？根本不爱听他谈诗，也听不懂，王阳明就改了主意，不讲诗文，改成唱歌唱曲，唱余姚小调滩簧腔儿。在这些市井快活上，阳明先生会的不多，很快就没词儿了，只得又搜肠刮肚去编些笑话，总之就是想逗仆人一笑，缓解他们心里的压抑情绪。

许是侥幸，在王阳明的认真照料下，仆人的病倒也慢慢好了起来。

这是王阳明这位贵公子一辈子第一次这么努力地为别人、尤其是为下层人着想，如果他仍然是礼部左侍郎的公子、朝廷里的六品主事，或是一个退职回乡闲居的庄园主，他都永远不会这样做。这一年阳明先生三十七岁，在此之前，他的诗文不可谓不精，学养不可谓不厚，但阳明先生

在前面三十七年的人生中只能说一事无成。而现在，就在这荒僻孤寂得像坟墓一样的龙场，在替仆人煮粥做饭，挖空心思只为逗仆人一笑的过程中，王阳明却感受到了自谪居龙场以来所未有过的充实、轻松和快乐。

阳明先生的整个思路，就是在这个节点上转向正常的。

在和仆人们像朋友一样交往的过程中，在照顾病人、煮粥唱曲说笑话的过程中，他忽然明白：原来孔子一直提倡的“仁”，儒家学说奉为至宝的“仁”，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到极点的意思。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他是为自己活着，同时也为天下人活着才对。人生的意义，就是对内实现自我价值，对外服务他人。

王阳明这个正直勇敢、博览群书的才子，就

是在与仆人交往的过程中，悟到了孔夫子所谓“仁者，爱人”的真谛！用阳明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这就是王阳明在地狱一样的小山洞里自问自答，给自己寻找出的人生答案。也就是传说中的“龙场悟道”。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里总结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如此看来，王阳明前半生的道路全走错了，初到龙场时的想法也错了。以前的阳明时时刻刻想着依附于人、追随于人，从没有自己的主见，也不问本体之良知。现在他才明白，原来“良知不假外求”，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是平等的、独立的、自觉的，这世上没有什么“弃妇”，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不抛弃社会，不放弃希望，抱定一颗“仁

者”之心，就不存在“被抛弃”一说。

当悟到“良知不假外求”的真义时，很多压抑在心底的谜团也就解开了。王阳明在一瞬间感受到了思想爆发的极度快乐，快活到了极点，忍不住纵声长啸，把已经睡下了的仆人们吓了一跳。

龙场悟道，悟到的是一个“仁”，是一个“良知”，一个不假外求的“自我”，这些体悟使王阳明的灵魂得到解脱。后来，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里写下了一段有重要意义的话：“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¹⁰⁰这是《尚书》里的话，被古人认为是从尧舜禹时

代起就代代相传的“十六字真言”。对这“十六字真言”，古人解释颇多，内容驳杂，而王阳明竟以“惟务求仁”四个字对这上古“真言”做了最杰出的总结，他理解得既简单精准又富有意义。

在写给儿子正宪的《手墨二卷》里，王阳明更加简明扼要地说道：“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之可致矣。”也就是说，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良知”与“仁”是相同且相通的，不能体会到“仁”的内涵，则“致良知”的工夫也无从做起。

良知，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有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一个人才能真真实实地领悟良知。一旦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古代哲人所推崇的“仁”、“义”、“理”诸多概念，在阳明心中就都能融会贯通了。

¹⁰¹

激动之余，王阳明在阳明小洞天里写了一本

《五经臆说》，把自己对于五经四书的一些想法全都写在里面了。

可惜《五经臆说》并未流传下来，后来王阳明和弟子们讲起自己在龙场悟道的经历，提到了这本奇怪的小书，学生们立刻提出要看这本书，王阳明笑着说：“已付秦火矣。”

《五经臆说》是被王阳明自己亲手毁掉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本书仓促而成，内容显然还不太成熟；二是这本书是王阳明在思想爆发状态时写下的，其中必定有许多不被时人所知的“敏感”内容。这些内容是不能被一心拱卫皇权的官僚集团发现的，否则不但王阳明的家族要遭灭顶之灾，就连他的学说和弟子们也会遭到清算。

虽然《五经臆说》被“秦火”烧毁了，但王阳明悟到的哲理，却已经在他的思想深处生了根。
102
从这一刻开始，阳明先生不再是贵族纨绔，不再

是“罪臣”，更不再把自己当成什么“弃妇”，他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像普通人一样走进阳光，开始体验属于他的那份人生。

王阳明的灵魂得救了，他的哲学思辨之路也正式展开了。

三 无处不在的良知

“良知”二字，是阳明学说的重中之重，是心学一切理论的核心。

早在龙场悟道的时候，阳明先生对此已有所立论，但对“良知之学”进行全面整理，使之成为一个哲学体系，还是回京任职，在北京、滁州、南京等地讲学的时候完成的。¹⁰³

中国真正的儒家学说——也就是所谓“孔孟”文学有一个特点，即讨论学术时的灵活性。儒学虽有师生之别，却无师生之实，师可以为生，生亦可以为师。唐代大儒韩愈总结出一句了不起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工，如此而已。”韩夫子这句话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来自孔子的名言。《论语·子罕》有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认为，老师和学生都只是“思考者”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师和学生是完全平等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人知道这个道理，那个人暂时还不知道，于是知道的就讲给不知道的听，此时知者为“师”，学者为“生”。显然，这种“师生关系”随时可能消失，或者转换。104你懂，你教给我，这时你是师，我是生；另一个问题我懂，你不懂，

又想学，则我教你，于是我为师，你为生。

其实韩愈提出的这种“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松散师生关系，在《论语》里另有一个精彩的版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大家在一起做事，同事们身上必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看到同事身上的优点，我把它“吸收”过来；看到同事身上的缺点，我反省，如果我也有这样的毛病，则把它改掉。此处强调的，是“自我”和“自觉”。

在此处大谈“儒家师生关系”，似是题外话，其实不然，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学说本身非常强调“自我”和“自觉”两个概念。

自我和自觉，是良知的基础，王阳明“良知论”的基础也建立在此概念之上。

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概念来自《孟子·尽心上》中的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王阳明对孟子的这一观点从一开始就非常认同。在《传习录》中，他这样告诉弟子：“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这正是从孟子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推演而来的。

对于良知，孟子的看法很是坚定，他认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看来，良知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只要善加引导，人心里的“仁义”观念就可以自然成型。

而王阳明也针对这一观点，专门针对孩子们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¹⁰⁶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

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露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王阳明所说的，可视作他对于儿童的教育方针，而这个“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的教育思路直接来自孟子。在思想保守、主张体罚教育的“棍棒出孝子”时代，王阳明的教育思路恐怕未必能让时人接受，但在今人看来，这种“鼓励式”教育思路是如此正确，以至根本无需辩论。

通过对孟子“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这一“良知”理论进行推演，王阳明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即：良知人人皆有，不管是帝王还是百姓，不管是圣人还是普通人。对此，王阳明在《书朱守乾卷》里明确指出：“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知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107

无有不同。”这种对良知“普遍性”的极力肯定，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此一来，就把“圣人”和“愚人”、帝王和百姓之间的等级鸿沟彻底抹去了，使圣人和普通人、皇帝和百姓完全站到了一个平面上，再无“贵贱贤愚”之分。

基于此，也就为阳明心学思想的最高峰——“满街都是圣人”理论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当然，“满街都是圣人”这一观点如此重要，王阳明要想确立这一命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善。而阳明先生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良知”这一概念不断放大，不断强化，使之不可能被推翻、被撼动。于是王阳明首先迎战朱子理学，借着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直接提出“良知即天理”，用这样的办法提升“良知”的地位。

在《答欧阳崇一》¹⁰⁸中，王阳明指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在《传

习录》中也有类似的话：“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在另一篇《答舒国用》中更指出：“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王阳明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把心之本体、天理、良知这一系列概念通通简化合并成了同一概念。

简化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概念。当良知与天理合而为一后，王阳明开始向他希望的方向引申，将良知提升为人生的准则，对此，王阳明是不厌其烦去强调的。

阳明认为：“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把良知奉为“明师”，就把“帝王洗脑术”对学子们的思想控制和灵魂搅和过滤掉了一大半。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地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这里锁定了良知是“自家准则”，也就是说，良知这个与生俱来、无处不在、等同于天理的了不起的概念，是在“自己”心里的。既不是别人强加于你，也不可能被别人强加进来。

在指出良知是天理，是明师，是准则后，王阳明干脆提出良知即是人心灵中的“天植灵根”。在《传习录》里，他说：“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又把良知称为“主人翁”，认为良知是主宰，是至善。在《答季明德》一篇中也大谈：“善即良知，言良知则使人尤为易晓。”由此层层推进，把良知一步步由外而内引向了“自我”和“自觉”。

“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割繁理剧，非以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劝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死义，非以为节也。”

王阳明在《题梦槎奇游诗卷》里说的这一段话，可谓掷地有声。但乍看却又让人觉得有些窝火，甚而产生疑问：为什么每到讲哲说理的时候，古人必要大谈“忠孝”呢？难道舍此就无其他可谈吗？

对古人来说，确实，舍“忠孝”再无其他可谈！这是他们思想上的狭隘和可怜之处，是两千多年“儒皮法骨”的封建独裁统治、长期的学术洗脑和凶狠的“文字狱”¹¹¹这三股邪恶力量共同作用的

结果。

但王阳明所说的“忠孝”与其他儒者（比如朱熹）所说的“忠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那一套“忠孝”不一样，他所说的是“夙兴夜寐、剿繁理剧、嫉邪祛蠹、规劝谏诤、临难死义”，也就是从忧国忧民，到勤于公务，到反腐反贪，到上谏抗争，直至抗争而死，这一切，都是一个儒者的良知，正是这良知，使得一个真正的儒者可以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这也正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此之后，王阳明经过对“良知”的反复推演，终又在这一切思想上加了一个“帽子”，归拢到“满街都是圣人”的语境中去，使帝王和百姓平等。¹¹²但天下人在自我和人格两方面得到平等地位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就应该懂得王阳明的心了。

至此，王阳明把“良知”由天理一步步引申，最终化为人生的准则，成了勇敢者手中的利剑，成了正直者心里的定盘星、试金石，成了一种最“自我”、最高尚的哲学理念。在此基础上，阳明先生又回过头来，想把这高尚的理念化为和风细雨，吹进每个人的心田。于是在《传习录》里提出：“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做还是不该做？该努力还是不该努力？怎么来决定呢？仍然是用良知来做定盘星。

夙兴夜寐、割繁理剧、嫉邪祛蠹、规劝谏诤、
临难死义，¹¹³这样的大事业、大是非，不是每个人

都会遇上的，多数人只是在社会的角落中过着最平凡的日子。当明白了良知是天理、是准则、是灵根、是定盘星、是自我、是自觉以后，就会发现，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中，良知，同样无处不在。

社会上常常有一些人，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好人，可身上又总有很多不良的习惯。这些人无视社会公德，不顾别人感受，行为举止很不检点，甚而把占小便宜当成人生乐趣。他们会在“请勿吸烟”的牌子下吸烟；在“请勿喧哗”的牌子下吵嚷；明知不能占道经营还要占道；见地上有一张钞票，立刻拾起装进自己口袋……一边最“老实”，一边又最无道德，结果“老实”和“不道德”混在一起，变成了猥琐。

一个人猥琐，是因为没有“自觉”，因为失去了“自我”和“自尊”，而归根究底，是心中的¹¹⁴“良知”被尘埃蒙蔽了。

《传习录》里有这样一句话：“‘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里说的“是非之心”就是自我，而“好恶”就是自觉。王阳明把良知比作一面镜子，教人常常擦拭，要擦得一尘不染才好。

我们在公共场所常会听到一个人斥责另一个人：“请你‘自觉’一点。”这句话多少有一点儿效果，对方常常会有所收敛。

“请你自觉”，其实就是在唤醒对方心中的“良知”。它之所以会有效果，是因为良知是个“灵明”，是个“心印”，是“试金石”和“指南针”，因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当良知被触动时，一定会有效验。

但“请你自觉”的效果又很有限，只能维持
115片刻工夫，因为良知归根到底还是个“自我”，

它只在你的心里，要靠你的手把它擦亮，别人帮不上忙。

四 狂者胸次

自从“悟道”之后，阳明先生在龙场驿站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因为他现在放下了架子，也抛下了负担，他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尽快修好驿站的房子，在这深山里怎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好让自己过得舒适、快乐一些，就领着仆人和驿卒砍树架梁，打坯为砖，在驿站修起房子来了。

放下身段，人活得轻松很多。到这时候，阳明先生才注意到，其实自己并不孤独，至少眼前就有三个朋友和他做伴。有趣的是，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不孤独，就越容易交到朋友。

很快王阳明就注意到在龙场附近生活着不少汉人，有的是从内地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是因为犯了罪，被弄到这深山老林来受罪的，他们和阳明先生一样都被困在这大山深处。早先这些人曾和阳明先生打过些交道，却没能成为朋友，因为那时的王阳明在内心深处瞧不起这些人。现在阳明先生没有架子了，大家也就混熟了，王阳明知道这些人在当地还没有立足之地，就用自己刚刚领悟到的那种乐观心态劝说他们跟自己一样“范土架木以居”，盖起中原式的土坯房来。

有了住处，有了事情可做，王阳明真正品味到“吾性自足”的乐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放眼四顾，生活中到处都是乐趣，充实得令人惊讶。

要想在龙场过好日子，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种庄稼，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于是王阳明拜龙场一带的苗族人为师，开始学习种庄

稼。其实当地苗人的耕作手段比较落后，所谓刀耕火种，收成不佳。但这套技术简单易学，王阳明像他的老前辈孔夫子一样，学富五车，志在四方，开宗立论，却偏偏不精于农事，只能粗手粗脚地放火烧荒，学着苗人种起庄稼来了。

想必除了“刀耕火种”这套苗人的手艺外，阳明身边的仆人和驿卒也多是农夫出身，耕作起来还是有一套办法，于是到秋天就有了一些收获——而按照阳明先生诗里的意思，他们这一年辛苦赚来的点点收成，大半都进了“鸟雀”们的肚子，但有了这种忙碌的生活和体验，王阳明活得既充实又诗意，比前一年躺在“石棺材”里等死的状态，到底是天壤之别了。

种粮种出乐趣来了，得意之余，阳明先生又开始学习种菜，这些在农夫看来最平常的事，¹¹⁸阳明先生全都不懂，一切从最基本的开始，倒也饶

有趣味，还记了一本笔记：地势低的地方适合种稻，地势高的地方适合种稷；种菜的时候土要疏松，湿度要掌握好；天太冷了谷穗长不结实，天太热了田里长虫子；草要经常除，耘田的时候要细心认真。最后又做总结说：“这套经验我是记住了，可真要操作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别以为只有在朝廷里琢磨着怎么整人才是本事，这种庄稼的本事也不能轻视呀。”

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阳明先生兴味十足，甚至专门写了一首诗作为纪念，诗的内容很一般，可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叫作“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要是把这个长得像绕口令的题目每四个字加一个逗号分隔开来，倒成了一首不错的“梨花体”小诗，比诗的原文还要精彩。可见王阳明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本就是半开玩笑。
119
这时候他的心情大好，绝境之中有此心境，也算

是很难得了。于是又有了另一首直白的小诗：

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

“万里入炎州，官卑得自由”，阳明先生真的快乐到如此程度吗？倒也未必，但这一阶段的心情着实好了很多。

这时候的王阳明已不再是个与百姓格格不入的官僚，而是一个放下架子有说有笑的正常人。此时，王阳明又注意到一个问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得十分艰辛。

自明朝建立以来，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血腥征讨就没停止过，其中在贵州一省，苗人受害最深。尤其景泰元年¹²⁰（1450），贵州苗王韦

同烈起事，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聚众二十万人，在普安州的香炉山筑起大寨，率军围攻新添、平越、清平、兴隆各处官兵卫所，其中位于贵州福泉县的平越卫遭到围攻，“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明军随即发起反攻，出动二十万大军攻克香炉山，杀了韦同烈。这场大战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大减，又造成了朝廷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从此贵州一省大小战乱不断，民族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这方面王阳明实在帮不上多少忙，只能尽力而为，而他所能尽的力，就是给苗人讲学。

苗族没有文字，只知道结绳记事，所以学会识字、简单的算术对苗人来说很重要，而这些却是汉族知识分子平素不肯教给他们的，因为多年的民族成见已在汉人和苗人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

现在王阳明决定抛弃成见，打破藩篱，在自己居住的驿站开设学堂，教化苗人。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正式对外使用“阳明”这个号。

“阳明”二字，得自阳明先生家乡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一处名胜。

山阴县有一座著名的会稽山，风光奇秀，山中观庙林立，其中有一座道观叫龙瑞宫。龙瑞宫附近又有一个名胜，是山石间的一处小穴，被认为是当年大禹收藏宝物之处，因缘附会，被认为是一处神仙聚会之所，称为“天地阳明紫府”。阳明先生曾到此游玩，意外地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清静无人的山洞，此时的阳明先生正在家乡养病，又一心迷恋道术，就径自占了这个山洞，取名“阳明洞天”。后来又在洞外¹²²盖了一处房子，时常和朋友在这个“阳明洞天”里聚会。

平时阳明先生闲来无事自己找点穷乐子，就借着家乡那个“神仙聚会之所”的名字，给这个阴暗潮湿的山洞取名“阳明小洞天”，以纪念在家乡度过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如今给苗人讲课，做了先生，觉得给人直呼名字不雅，便给自己取了个雅号叫“阳明先生”，自此，“阳明先生”四个字开始传播开来。

给苗人讲课，正是“已欲立而立人”，应了孔夫子“仁”的本意。从放下身段照顾仆人，到与周边的人交往，再到结交苗人，直至给苗人讲学，阳明先生对良知的感悟越来越深，同时把自己心里的良知大而化之，勇气、智谋与之俱增，帮助的人越来越多，这又应了孟子所言“充其恻隐，而仁不可胜用矣”。

良知，是一个神奇的概念。它就像一颗火种，¹²³

在人的心里点亮，你只要伸出手，就能把这火种接过来，点亮自己的心，也能用一片良知去对待别人。正像阳明在《大学问》里讲的：“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当下阳明的修行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孔门之传，求仁而已矣”这一点他是悟到了，“仁即心也，心即知也，知即物也”，他也完全理解了，并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阳明投桃，苗人报李。在书院讲学一段时间之后，龙场一带的苗人都把阳明先生当成了朋友，看到王阳明主仆三人住在阴冷潮湿的山洞里，生活异常艰苦，他们就自发帮他在龙场建起了几座木楼，以便居住和讲学之用。王阳明给其中较大

的木楼取名“何陋轩”，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意思，另外还有“寅宾堂”、“君子亭”等几处建筑，算是小有规模了，这个地方也就被正式称为“龙冈书院”。

这时候的龙冈书院还不算一座学堂，它主要是阳明先生为苗族朋友们开设的识字班。而在此时，正在大山深处过着隐居生活的王阳明，却意外遭到了来自山外的骚扰。

在王阳明离开南京到龙场驿站就职后不久，刘瑾又一次派人到南京和王华谈判，内容和早先一样：只要王华愿意和正德皇帝组织的“一龙八虎党”结合，就可以安排入阁。

当然，这一次仍然是正德皇帝借刘瑾之手来拉拢王华，而王华又一次拒绝了。

目的“老师”彻底放弃了。于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刘瑾展开了对王华的新一轮陷害，这次的做法是先对另一个官员进行打击，然后由此事牵扯出王华在礼部任职时曾经“受贿”，并以此为借口向王华发难。

王华任礼部侍郎的时候是否受贿已无从查起，不过王华倒是很识时务，早已做好辞官的心理准备，此刻也就没有更多的争执，老老实实辞去南京吏部尚书之职，致仕还乡。

王华遭陷害被迫辞官的这一阶段，也正是刘瑾手中的权柄登峰造极之时，这个凶恶而又愚蠢的太监开始回过头来陷害那些早就被他赶出京城的政敌，包括已经退休的大学士刘健、谢迁，曾组织百官联名奏请诛杀刘瑾的户部尚书韩文，已经退休的兵部尚书刘大夏等人。结果年届七十三岁的刘大夏被判充军，¹²⁶韩文被投入诏狱，刘健、

谢迁等人也险些遇害，全靠留在朝廷的首辅李东阳暗中保护才得以脱险。

此时刘瑾已经在朝廷和地方上培植起相当数量的亲信，从内阁辅臣曹元到尚书张彩、焦芳、刘宇全都是刘瑾的死党，都察院被刘瑾的亲信屠溏控制，锦衣卫落在杨玉手里，地方上的要员有些攀附刘瑾势力，有的则逐渐被换成了刘瑾的党羽。现在这些人看到刘瑾对前朝重臣的打击不遗余力，就决定给主子提供弹药，帮助他陷害这些老臣，以向刘瑾邀功请赏。于是刘瑾爪牙之一的贵州都御史王质决定对王阳明进行暗算，从阳明先生身上找到突破口，去攻击他的父亲。

当然，王质身为贵州都御史，是一个省级高官，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罗织王阳明的罪名，所以王质私下授意贵阳知府，再由这个知府“遣人至驿侮

先生”，派了几条狗腿子到驿站找王阳明的麻烦。

可王质没想到，王阳明在龙场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已经在这一带的苗族人心目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龙冈书院是苗族青年汇聚的地方，贵阳知府派来的官差跑到龙场来找阳明先生的麻烦，没能“侮”到王阳明，却惹恼了龙场的苗族人，被人家狠狠揍了一顿。

王质派人来龙场找茬的本意就是“收集罪证”，现在这几个官差挨了苗族人的打，正好落下一个口实，他立刻告到贵州提刑按察司，要求逮捕王阳明。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是个正直的好人，他知道王阳明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过错，更深知王质借这件小事陷害王阳明，其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毛科推三阻四拒绝捕人，反而腾出时间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¹²⁸他派人专程送到龙场，把在贵阳发生的事情前后经过讲明，让王阳明到

贵阳知府面前去跪拜谢罪，只要阳明先生肯就此事郑重道歉，“驿丞纵容苗人殴打官差”这一事件就可以和解了。

显然在这件事上，毛科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斡旋。在他的运作下，这一事件绕过了真正的幕后指使者——贵州都御史王质，变成了王阳明和贵阳知府之间的矛盾，而贵阳知府在按察司面前毕竟只是个下级官员，冲着毛科的面子，他不敢过于难为王阳明，只要阳明先生出来道歉，这件事就可以化解了。

可王阳明却作出了一个强硬的决定：对贵阳知府不做任何道歉。

当然，王阳明也有自己的考虑，毛科在这件事上花了这么多工夫，₁₂₉完全是一片好心，自己这边也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以免让为自己说话的

毛科为难，于是写了一封巧妙的回信给毛科。信中首先就毛科的斡旋表示感谢，继而提出那些官差到龙场来殴辱自己，是官差自己仗势欺人，“非太府使之也”；又说龙场苗人和官差争斗“亦非某使之也”。也就是说，知府衙门的官差跑到龙场来欺负王阳明，这“并不是”知府大人指使的，苗人打了官差，也不是王阳明指使的……

在这个前提下，王阳明就进一步认为：既然知府大人没欺负我，我也没打知府大人的手下，那我有什么罪呢？既然根本没有罪，那我凭什么去知府衙门叩头认错？所以不肯去道歉。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魎之与游，日有三死焉……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³⁹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

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

王阳明这番话说得非常硬朗，俨然已做好了死的准备：宁可被知府的爪牙暗中杀害，也绝不向刘瑾这帮奸党的邪恶屈服。就像阳明先生后来在讲学时对弟子们说的：“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我现在坚信良知是确定大是大非的原则，就照着这个原则信手去做，根本不用隐藏什么。到这时候才能说自己是个敢做敢为的“狂者”胸怀，就算天下人都说我言行不一，我也不在乎。）

“狂者胸次”，这是当年孔子提出的一种人格，也是王阳明极为推崇的真性情、大勇气。简言之，就是：见了好人好事就称赞，¹³¹哪怕因此被人陷害

也要称赞下去；见了恶人恶事就要骂，哪怕被打击报复也要骂到底。该谈志向就谈志向，想说原则就说原则，拍着胸脯展示自我，高谈阔论大谈个性，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怕别人说我“言行不一”。

我自有志向，自有原则，自有良知在胸中，自是一个坦荡勇敢的真君子！那些已经没有理想，没有原则，埋葬了良知，一心要和坏人同流合污的家伙们不去反省自己，倒来笑话我这个有理想、有原则、有良知、有个性的勇敢者吗？

在现实中，常有些同流合污的小人因为自己没有志向，就去取笑那些有志向的人；自己没有良知，就去讽刺那些有良知的人；自己不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就去斥责那些敢于勇敢的人。对这样一些小人，我们无需理睬。

良知，神奇的良知。¹³²不久前它让王阳明懂得了人应该怎么面对生活；现在它又让王阳明知道

了人应该怎么面对邪恶。这“良知之学”，就是心学。此时的阳明先生已经登堂入室，体会到心学的精髓了。

最终，阳明指使苗人殴打官差这件事被提刑副使毛科遮掩过去了，王阳明的父亲也没遭到进一步的陷害。这可能出于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原因：权阉刘瑾对状元公出身的王华十分崇拜。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刘瑾居然是王华的一位“粉丝”。史料称，刘瑾这个不学无术的太监对自己的无知和愚昧颇有自知之明，因为没读过书而感到自卑，所以心里非常崇拜那些饱学之士，而在刘瑾眼里，朝廷中最“饱学”的才子正是王华。

状元出身的王华当年屡任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少詹事，东宫辅导，给太子讲学时侃侃而谈，¹³³这一时期刘瑾也曾陪伴在太子身边，因此他非常

崇拜王华的学识，对王华有极深的好感。

虽然王华在关键时刻没有接受刘瑾的拉拢，可他毕竟和正德皇帝有一段“师生”情，又是个城府极深的官场老手，从刘瑾上台到自己退休，始终没有和刘瑾发生过直接冲突，算是急流勇退，走得比较干脆。尽管刘瑾因为王华“不识抬举”而恼火，倒还不至于恨他，所以在打击报复老臣的名单上并没有王华的名字。

就这样，一场从贵阳城里来的政治迫害终于被躲过去了。可谁想到，另一个“麻烦”却又悄悄找上门来。

五 劝服土司

在王阳明到龙场的第二个秋天，几场大雨冲

毁了道路，切断了驿站和外面的联系，驿站粮食的给养供应遇到了困难。好在苗人把阳明先生当成朋友，送给驿站一部分粮食，但这只是解了燃眉之急，困难仍然存在。正在阳明先生发愁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队马帮，送来一大批猪肉、鸡鸭、大米和柴炭，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水西宣慰司安贵荣派人送来的礼物。

宣慰司，其实就是地方上的大土司。而土司制度历史久远，《明史》中记载：“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筰、焚、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南，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据说这水西土司就是古代“夜郎国”的后裔。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开始设置土司，“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¹³⁵其土官衍号（依土司势力大小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

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这些土司职位有高有低，领地有大有小，其中贵州一省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土司就是水西宣慰司的安氏土司，在明洪武六年（1373）受封为从三品宣慰使。

现任水西宣慰使安贵荣是水西地方的第七十四代土司，他是一个勇猛好斗、精力充沛的强人，除了水西宣慰司这个世袭官职外，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正三品的昭勇将军官职，手下兵强马壮，威震贵州，而安贵荣本人也颇有雄心壮志，并不满足眼下的势力，就到处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现在他发现被贬龙场的王阳明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按照当地彝族人的习俗，派了一批人带着肉食米粮到龙场驿来服侍阳明先生，这件事让王阳明大为惊讶。作为一个犯罪被贬的官员，¹³⁶王阳明身上背负很大的嫌疑，如果他

和当地土司接触过多，很容易被人诬陷为勾结土司，这可是一项重罪！此刻，百里外的贵阳城里有一个都御史王质等着找王阳明的麻烦，所以他不愿意惹事，就坚决把这些奴仆退了回去，不肯接受。

想不到安贵荣却会错了意，以为阳明先生嫌礼物太轻，于是又派使者送来了一箱金银，几匹好马。

到这时候，王阳明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必须认真面对。因为安贵荣送来的礼物昂贵到了吓人的程度，其含意已经超越了友谊，显然安贵荣是想借机招揽王阳明，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归附于土司府，能直接成为安贵荣的谋士那最好不过。要真弄成这个结果——哪怕只是造成这么一种假象，对于获罪贬官谪居龙场的王阳明来说，都太糟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拒绝土司送来的礼物是不礼貌的，很可能引起对方的误会，因为收受这样的重礼，会被土司视为“谋士”，继而被解读成“背叛朝廷，投靠土司”，这种情况对王阳明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更不妙的是，眼下安贵荣仗着自己手握重兵，正伸手跟朝廷讨官要赏，闹得不可开交，和朝廷之间芥蒂已深，在这种时候王阳明和安氏土司扯上关系，麻烦就更大了。

左右为难之下，王阳明只好作一个折中的决定，收下两石大米以及鸡鹅、柴炭等比较普通的礼物，而将奴仆、金银、好马退回，同时写了一封信向安贵荣表示感谢，并在信里声明：那些粮食、肉食，王阳明是把它们看作水西宣慰使对龙场驿站的“周济”而领收的，也就是说，这是上级衙门对下级僚属的救济，而不是私人交往中的礼品馈赠。至于其他贵重礼品则“殊骇观听，敢固以辞”，¹³⁸

坚决不能接受了。

王阳明这样说，只是希望安贵荣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此时窘迫的处境，“处人以礼，恕物以情，不致再辱”。好在安贵荣也确实从阳明先生的信里读出了他的苦衷，并给予理解。

经过这件事，王阳明和安贵荣成了朋友，其后两人一直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直到王阳明离开龙场为止。

在和安贵荣打交道的时候，王阳明脑子灵，反应快，处事也很得当，总算把这件麻烦事应付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时期，水西土司和中央朝廷之间的冲突仍在不断升级，矛盾已经到了即将爆发的边缘。

在王阳明来龙场的前一年，苗王起事的普安州发生了战乱，战争的核心仍是香炉山一带。由

于水西宣慰司下属的架勒则溪、要架则溪紧邻普安州，朝廷就命令安贵荣出兵征讨，安贵荣也确实发兵配合官军作战，大获全胜，安贵荣就倚仗军功向朝廷上表，希望得到一个“都指挥佥事”的武职，这是个正三品官职，比原来世袭的那个从三品宣慰使级别高一些。在安贵荣看来，这将增加水西土司宣慰府的荣耀，也能借机压制周边的其他土司，尤其是在自己的老冤家——水东土司宋然面前，可以摆摆威风。

想不到朝廷却有自己的打算。

大明朝廷的重臣们早已觉察到安贵荣的骄横，对他留着十二分的心。现在安贵荣上奏求官，朝廷给了安贵荣一个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文职，这样一来就不是升官，而是在“宣慰使”之外另加了一个文官职位，最让安贵荣不满的是，这个官职只是比从三品的宣慰使还低的从四品。
140

事实上朝廷给安贵荣安排这样的官职，说明朝廷方面对他起了戒心，并用这样的方式示以警告。这一点安贵荣也不是看不出来，可这位大土司生性鲁莽，不但无惧朝廷的警告，反而一连几次上奏求官，言语中也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这么一来，朝廷对水西宣慰司更不放心，便准备在水西附近增设卫所，驻扎官军，防备安贵荣。安贵荣得知消息后也针锋相对，打算奏请撤销龙场驿站，切断水西土司和贵阳府城之间的联系……

如果水西土司和朝廷的矛盾按照这种惯性一路发展下去，矛盾将逐渐升级，最终注定要爆发一场血腥战争。好在关键时刻安贵荣想起了王阳明，于是给朝廷上奏“请求”——实际上在安贵荣通知朝廷准备裁撤龙场驿站之前，先写了一封信，派人来询问阳明先生的意见。

综复杂的政治事件，更重要的是，这是王阳明第一次抛弃自身对人对事的种种成见，完全凭良知来指引自我意识，对重大事件作出判断。结果阳明先生发现了“良知指引自我意识”的神奇之处：用良知来引导思路时，很多平时看不到的重要内容，此时都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比如眼前这件事，表面看来是土司和朝廷之间的角力，如果不用“良知”进行思考，只用王阳明自己的“私欲”来分析，那王阳明就只有两个立场，要么站在朝廷一边反对土司，要么站在土司一边算计朝廷。最终，王阳明显然会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对安贵荣表示出敌意，甚至会把安贵荣请求裁撤驿站的消息抢先上报给朝廷，以表忠心，得到朝廷的奖励。¹⁴²但如此一来，王阳明就等于在朝廷和土司之间起了一个反作用，由于他的

介入，将使得土司和朝廷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可是当王阳明放下自己心里的“私欲”，抛开对皇帝的愚忠，拿出“良知”来分析这件事，却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来。因为“良知”告诉王阳明：土司也好，朝廷也罢，他们都是统治者。土司倚仗强兵的骄横，朝廷想攫取水西土地的贪婪，这两者都是私欲。而心里的良知却引导阳明先生透过“私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于是他在土司和朝廷两股私欲之间看到了真正值得他关心的内容，那就是：水西境内四十八万百姓的切身利益。

土司和朝廷交战，死伤最多、损失最大的一定是百姓，而阳明先生既不应该站在朝廷一边，也不该站在土司一边，他应该和百姓站在一起，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百姓的利益。

看清这一点，后面的事就好办了。要想维护百姓的利益，王阳明就必须想办法迫使土司和朝廷同时作出妥协。只有这两股霸道的力量同时让步，战火才能平息，当地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

经过一番深刻思考，王阳明确信朝廷对水西土司的高压态势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因为朝廷表面是个强大的帝国，其实却是财政困窘，皇帝昏庸，外强中干，并不真想打仗。而水西土司是明朝建立以后第一批归顺的土司，这些年一向对朝廷恭顺，在当地又拥有强大的实力，双方把关系闹僵，对朝廷来说只有麻烦，因此朝廷并不愿意和安贵荣闹僵。

同样，安贵荣也不愿意和朝廷闹僵。因为水西土司虽然强大，但毕竟只有“千里之地”和“四十八万百姓”，与大明朝广大的版图、六千万子民和一百八十万军队相比，它是微不足

道的。而水西周边又强邻环伺，一旦朝廷下决心征讨水西，只需要发出一道圣旨，再号令各路土司一起对水西用兵，安贵荣势必四面受敌，难以招架，所以安贵荣虽然表现强硬，其实内心里是不敢、也不愿意和朝廷硬碰的。

这么说来，朝廷和土司表面看来都气势汹汹，其实两家谁也不想真的开仗。只要水西土司能够对朝廷继续表现出恭顺的态度，给朝廷一个台阶下，事情就会出现转机。

此时，王阳明已经把整个事件分析透了。当然，他一个小小驿丞，影响不了朝廷的决策。可王阳明正待在安贵荣身边，和这位土司又是不错的朋友，劝一劝安贵荣，他是办得到的。只要王阳明能想办法劝动安贵荣，请他率先向朝廷表示恭敬，主动辞去那个“贵州布政参议”的头衔，再说几句客气话，不提裁撤龙场驿站的事，朝廷方面势

必会缓一缓，以求息事宁人。

良知，帮助王阳明透过复杂的表象，看清冲突的本质。当王阳明用这种精妙的思维得出一个深刻而精确的结论后，这件原本难以解决的事忽然变得简单起来，以至于王阳明只要给安贵荣写一封信，就能把整件事搞定。

把整件事想通之后，王阳明就给安贵荣回信，抓住这些贵族老爷性格上的弱点，首先抬出“祖宗”这顶大帽子来唬他说，“朝廷制度定自祖宗，不可擅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水西安氏从汉朝开始就在贵州当地做大土司，至今已立千年，全靠着“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才一直延续到今天。把这一套大道理摆明之后，又向安贵荣强调这水西驿站是他“祖宗”奢香夫人在明朝皇帝的“祖宗”朱元

璋洪武年间设置的，一件事牵涉两位“祖宗”，所以不能擅改，一旦撤销驿站，朝廷一定不能接受。贵州地方政府也会出来干涉，连土司内部有权势的族人们都会产生反感，所有人都会责备安贵荣“变乱祖制”，最终可能会导致众叛亲离，对安贵荣没有任何好处。

说了这些劝人的话之后，王阳明又转弯抹角地威胁安贵荣说，“驿可减也，（官军卫所）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把安贵荣面临的危机逐一挑明，让他自己意识到来自朝廷的压力比他设想的要大得多，不管朝廷方面是在水西附近增设卫所，还是直接革去他的宣慰司职务，安贵荣都将面临绝境。

“祖制”这个东西虽然迂腐，可是完全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土司政权却最认同：“实力”这个东西虽然霸道，可是依靠军队生存的土司们最

信。用“不合祖制”和“实力悬殊”来压服安贵荣，果然特别有效。

估计这两顶大帽子基本上能把安贵荣唬住了，王阳明又提出土司帮朝廷打仗平叛是分内事，不该向朝廷额外讨赏，免得朝廷疑心。最后干脆告诉安贵荣：宣慰使是“守土之官，世有其土地人民”，贵州布政使司参政则是“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一个土司可以永远在自己的领地上统治人民，再将这个权力传给子孙，可要是被加封为朝廷官员，就随时会被朝廷调遣，一旦朝廷下令将安贵荣调离水西，他若不去，就是抗旨，会立刻被治罪；如果去了，就是离开了家族世代居住的土司领地，这么一来，则“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

王阳明这一句极其中肯的话，把朝廷对安贵荣的“算计”¹⁴⁸整个摊到桌面上来了。如果不是出

于一片至诚，他不会把这些话说给安贵荣听。

说到这里，王阳明已经用一片真心劝住了安贵荣，于是说出自己真正要说的话：“今日之（贵州布政司）参政，使君将恐辞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你要是愿意听我劝，就应该急着辞去朝廷所封的“布政参议”一职才对，而且态度还要谦虚，要客气，更不能继续向朝廷索要更高的官职了。）

王阳明这封信有理有据，真心实意，彻底把安贵荣给说服了。这位统治着贵州千里之地、四十八万百姓的强人终于放下了架子，很快就上奏辞去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职位，而且对朝廷说了一大套谦恭的客气话。

也正如阳明先生所料，朝廷并不想和安贵荣闹翻，眼看土司服软了，在水西附近设置卫所、¹⁴⁹驻扎官军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六 存天理，灭人欲？

在土司和朝廷的矛盾面前，王阳明用“良知”设定问题，指引思路，再运用“良知”去寻找答案，用智慧解决问题，最终使得安贵荣主动辞去布政参议的职务，同时也赢得了朝廷对水西土司的妥协，于是一场被逐渐激化的矛盾消于无形，水西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王阳明拯救一方百姓的意愿也终于达到了。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危机解决没多久，更大的危机又出现了。

在水西大土司身边还有一水东土司，这两大土司以乌江为界，各霸一方，实力都很强劲。其中势力强大的水西安氏⁵⁰土司被明朝封为宣慰使，

势力较小的水东宋氏土司被封为宣慰同知。

水东宋氏居住在贵阳城侧，手下划分为十个长官司，土地人口只比水西土司手下的“十三则溪”略少些，宋氏自己亲领“洪边十二马头”，实力仅比水西安氏低一点。他们在贵阳城里都设有官署，而宣慰府的印信一直掌握在安氏土司手中，由此引发了两大土司历时百年的明争暗斗。加之这两大土司控制的地域互相毗邻，犬牙交错，互相之间为了土地和人口也时有争执，小冲突累积起来，就变成了大矛盾，到了安贵荣这一代，矛盾已经愈演愈烈，渐渐失控。只是两家土司都在朝廷控制之下，不敢直接动武。

这一年，水东宋氏土司手下的三个头人阿贾、阿札、阿麻同时起兵反叛，把水东的大土司宋然围困在大羊场的官寨里，¹⁵¹贵阳府城周边的局势立刻动荡起来。朝廷急忙下令安贵荣发兵平叛，救

援水东土司。安贵荣和宋然两家为了争夺宣慰府的官印曾起过争执，在贵州官府那里打过一场官司，而官府在这场土司间的冲突中耍了个“扶弱抑强”的小花招儿，偏帮宋然，压了安贵荣一头，惹得安贵荣既恨官府，又恨宋然。现在宋然那边出了事，安贵荣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是笑开了花，就打算看一出好戏，借这场战乱削弱宋氏土司的实力，于是不理朝廷的连番催促，坐在乌江西岸来了个“隔岸观火”，坐视不救，任由宋然被手下的头人围攻。

水东这一场叛乱影响很大，贵阳方面的官府无力插手，想从别处调兵，又鞭长莫及，只得连连发出紧急公文，命令安贵荣出兵平叛。可安贵荣早打定主意，就是不肯出手，直到被催得坐不住了，这才出动一支部队从背后攻打叛军，杀了₁₅₂阿麻头人。朝廷见安贵荣出了兵，以为叛乱很快

可以平息，就放下心来。想不到安贵荣又要了个花招，在前面应付了一下，打了一仗，眼看朝廷不再催逼了，就对外宣称自己生了病，回到官寨闭门不出，早先派出去的部队也都悄悄撤了下来。

这么一来，刚刚好转的战局又变得复杂起来，被围困的宋氏土司只得又向贵阳方面求援，贵阳方面也再次急令安贵荣进兵，可安贵荣却觉得自己出的力不算少了，就此称病不出，躲了起来。

社会上，有时候一个头脑聪明的人却未必就能取得成功，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惹上大麻烦，可是这些聪明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聪明，要看他的思想是否正直，想出的主意是否合乎“良知”。如果是合于良知的聪明，就可以叫作“智慧”；如果动的是不合于良知的歪脑筋，那只能叫做“伎俩”罢了。智

慧可以解决问题，而伎俩却往往害人害己。这正应了那“尧舜禹相授受”的著名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安贵荣这个装病的主意就是“伎俩”。说难听些，这是搬着石头往自己脚上砸。

在安贵荣想来，他这个装病不出的计划很妙，可以让水东兵马和叛军斗个两败俱伤，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可他哪能想到，就因为他的用心不良，便宜没有占到，反而弄巧成拙，不知不觉间，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降临在他的头上。

安贵荣是贵州一省势力最大的土司，如果他出兵帮助宋氏，叛军一定无力抵抗，可现在他在家称病，反叛的阿贾、阿札两个头人自然抓住机会放出风声，说安贵荣“锡之以毡刀，遗之以弓矢”，暗中协助叛军攻打水东土司。

其实安贵荣虽然有纵容叛军之意，却也不至于拿出J枪弓箭直接帮助叛军，但叛军放出这样的风声，既可以威胁被围的水东土司，乱对方的阵脚，又有可能在关键时候把安贵荣拉下水，对叛军来说好处颇多。所以他们到处散播谣言，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安贵荣正在“帮助叛军”。

与此同时，在水西内部也传出谣言，说水西“连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深坑绝坉，飞鸟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纵遂高坐，不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意思是说水西地大兵多，不惧朝廷。这些话显然不是安贵荣的意思，而是水西土司内部有权势的人故意放出风来诋毁安贵荣，想挑起他和朝廷之间的直接冲突。促成朝廷发兵对安贵荣展开征讨，那时这些水西内部的大贵族就出来和朝廷联手算计安贵荣，趁机夺取土司之位。

其内部有大小四十八个族支，各自都有自己的领地，而这四十八族支的首领——土舍和土目们，都拥有贵族血统，有权力分享土司职位的继承权，所以水西土司内部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现在就有人趁着安贵荣不救水东土司，开始在背后兴风作浪，算计他了。

到这时，称病不出的安贵荣对外得罪了官府，对内引起了贵族对他手中权柄的觊觎，一时间，水西千里之地暗流汹涌，杀机四伏，安贵荣身边那些人各自动起了脑筋。内忧外患齐至，大祸已经临头。处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安贵荣竟然一无所知，仍在家装病，不肯发兵。

安贵荣打什么样的主意，和王阳明并没有关系。但龙场驿站正处在这场战乱的边缘地带，王阳明又和当地人混得很熟，所以对战场上的态势

比较清楚，各种谣言、鬼话，也都纷纷传进他的耳朵里。

经过一番分析，王阳明估计到：如果安贵荣再继续拖延，不救水东，则水东土司很可能会被叛军消灭。一旦水东土司灭亡，朝廷就会认为这是安贵荣和叛军联手所为，为了保证贵州宣慰司地方的安宁，很快就会派大军进剿，这么一来，占领水东的叛军和水西的安氏土司都将遭到打击，水西土司内部也会发生严重的内讧，对地方来说，则是整个贵州宣慰司——包括水西、水东两个土司以及周边广大地区的所有民众，都将被卷入一场恐怖的战祸之中。

又是“私欲”——安贵荣这个大土司削弱对手实力的“私欲”，阿贾、阿札两个头人消灭宋氏自立为土司的“私欲”，¹⁵⁷水西贵族们夺取土司之位的“私欲”，这些贵族和统治者的邪恶欲望

搅缠在一起，即将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场可怕的兵灾！

在此如此危急时刻，王阳明依据良知，为了当地百姓的利益，对战场上的通盘局势做了一番认真的评估，很快想出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准备用自己的“智慧”来击破安贵荣的“伎俩”。

拿定主意后，王阳明立刻给安贵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外面已经传出消息：“阿贾、阿札等畔宋氏为地方患，传者谓使君使之”，有人正在往安贵荣头上栽赃，说他暗中支持叛军！“斯言已稍稍传播，不知（贵州的地方官府）三堂两司已尝闻之否？”

当然，安贵荣装病不肯出兵平叛的事，贵州地方官府早已知道，而且三番两次下令催促安贵荣进兵。只是安贵荣目前正在装糊涂，而装糊涂

的人有时候真的会“催眠”自己，以假乱真，竟以为别人不知道他在耍的这些花招。现在阳明先生把安贵荣的花招点了出来，一下就把装糊涂的人给点醒了。

接着王阳明又用厉害的话吓唬安贵荣，说这些谣言一经传出，官府一定信以为真，会向朝廷请求发兵征讨水西。水西土司周边有播州、黎恺、酉阳、保靖各处土司，全都兵强马壮，也都在觊觎水西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朝廷觉察安贵荣有反叛之心，发圣旨命令这些土司来攻打水西，安贵荣肯定无法应付，那么水西土司就有顷刻覆灭的危险。

当然，王阳明写信给安贵荣，用意是劝说，不是吓唬，而且安贵荣是个鲁莽的人，唬人的话说多了，弄不好会适得其反，所以这些话点到即止。
159接着王阳明又换了话题，告诉他：安氏土司共有

四十八个宗族支系，每一个宗族支系都有资格成为土司，现在安贵荣这一支系已经担任土司长达三世，其他族支不敢公然起兵争夺，那是靠了朝廷的任命，是朝廷在背后撑腰，安贵荣才能压服同族，一直占据土司之位。如果他的家族因为“水东事变”失去了朝廷的信任，不能获得官府的支持，就是给了其他支系以可乘之机，那时候怕是有人要出来和他争土司之位了。

确实，这次安贵荣称病不出，放任叛军攻掠水东，早就有身边的贵族们在算计他了，现在阳明先生把这些“背后捅刀子”的话都透露给安贵荣，又把厉害之处一一指明，安贵荣确实需要三思了。

在信的最后阳明先生劝说安贵荣：“使君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¹⁶⁰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这一串话句句切中要害，安贵荣实在没

办法不听阳明先生的劝告了。

安贵荣虽然莽撞，但并不是傻子。这位大土司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很信任自己和阳明先生的这份友谊，所以也真把王阳明的劝告当一回事。

三思之后，安贵荣很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也体会到了王阳明的一番好意。此时安贵荣立刻集结兵马，以最强的兵力、最快的速度赶到水东平叛。

而水东叛军围攻宋氏官寨已经有一段日子，安贵荣始终不肯发兵来救，以至叛军都相信安贵荣的人马绝不会来了，可现在水西军马忽然倾巢而出，杀到眼前，结果一击得手，很快就平定了这一场大乱。

这一仗安贵荣花费不大，折损不多，却立了大功，名利双收，捞了不少好处，从此他对王阳明更加敬重，以至于王阳明离开龙场时，土司亲

自来送行，并在阳明先生住过的山洞上提了“阳明先生遗爱处”七字，至今犹存。

可是给安贵荣当了一回“谋士”，出了这么个好主意，阳明先生并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利益。

在这件大事中，王阳明是否得到“好处”，不能简单去算计，否则就不合于良知了。

阳明先生做这一切事，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好处，至于安贵荣从事件中得到什么好处，在王阳明看来根本不重要了。要紧的是叛乱平息了，水西、水东两地的百姓又过上了太平日子。孔夫子教育儒生们要“泛爱众”，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由此推之，水西的老百姓得到好处，就等于阳明先生得到了好处，这就够了。

如果非要问“好处”，那么可以去一趟贵州省修文县，到当年的龙场驿站所在地去打听“王

阳明”三个字，在当地无人不知，五百年前王阳明住过的小山洞至今仍在，洞壁上，大土司安贵荣的儿子——水西第七十五代土司安国亨亲手题写的“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字，宛然在目。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这话说得对呀！阳明先生帮助了百姓，虽然没得一两银子的“好处”，可五百年过去了，“阳明遗爱”仍在当地流传，再过五百年，应该也不会被人遗忘吧！

为什么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那么厉害？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官员们，却没有阳明先生这样的功业？因为这些官员满心都是私欲，根本没有为百姓打算。大儒朱熹曾提出六字真言：“存天理，灭人欲。”对这六个字，阳明先生是认同的。天理，是人民的利益；人欲，是统治者的私心。
163
而良知，就是要保护人民这个“天理”，灭统治

者的“人欲”。

王阳明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思路正确了，他当然就成功了。

知行合一，无解中求解

一 由良知带出知行合一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在此又耽搁了一年多，但在这段时间里，体会到良知的阳明先生，在龙场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片荒蛮之地已经稳稳站住脚了。此时的王阳明在良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这就是人人皆知的“知行合一”。

说起阳明先生的学问，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这一理念是王阳明在龙场受苦的时候体会出来的，而其为世人所知则是从他¹⁶⁵

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开始。

依《年谱》记载：“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

其后又说：“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求之吾性命本自明也。’”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知道，王阳明悟到“知行合一”是在正德三年（1508）龙场谪居之时，而当时担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做了第一个听众，同时，也成了第一个向王阳明质疑并被其说服的人。

另外，席书还是一位尽力帮王阳明摆脱困境的知心朋友，在听过阳明宣讲“知行合一”之后，
166
席书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更是耐人寻味：“圣人之

学复睹于今日。”这正应了王阳明舍弃后世诸儒，回溯儒学源头，直追孔孟，还原儒学本来面目的志向。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本身是一剂良药，目的是要治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恶劣习气。王阳明讲心学，讲知行合一，目的是要救这个社会，救这个国家。在《书林司训卷》中王阳明严厉地指责当时的士人官绅：“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詐，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王阳明认为社会风气之所以会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主要原因就是“（有良）知而不行（不肯照办）”，导致良知与行动脱节。在王阳明看来，世人心里都有良知，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却用虚伪狡饰掩盖良知，不但自己做伪，蒙昧心镜，而且“相规以伪，相

“ 轶以利 ”， 伪饰之行已经成了社会的潜规则，甚至很多人自我麻醉、自我催眠，把自己的邪恶倾轧、同流合污视为 “ 圣贤之学 ” 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孔子最厌恶的 “ 乡愿 ” 。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 “ 乡愿，德之贼也。 ” 孟子给 “ 乡愿 ” 加了一个批注： “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 ‘ 德之贼 ’ 也。 ” 后世学者李大钊说得更直白： “ 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 ” 乡愿危害之甚，由此可知。

针对于此，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他的首徒徐爱说： “ 今人却将 ‘ 知行 ’ 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 ‘ 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 ’ ，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 ”

在《答周道通书》中，王阳明更是坦言：“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

在这里，王阳明所说的“终身不行”就是指人们蒙昧了良知，而且存心自我蒙蔽，一生都不肯醒悟。王阳明指出的问题，不仅是明朝的社会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社会病”。

针对这种“社会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要让世人把心中的良知和自身的行动统一起来，用良知指导行为，如此则真伪立判，无所隐藏。就像王阳明说的：“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¹⁶⁹这里所说的“将不善的念克倒”，正是良知救世的治疗过程。

既然病因已经找到，下面无非是开出对症的药方了。

王阳明认为只要理解了“知行合一”的宗旨，知道了人的一切行动、行为全都是因“良知”而发动，以“良知”为引导，这时候就算把“知”和“行”分开说也无妨了。因为心学的宗旨就是“良知”，当良知站稳了脚跟的时候，一个人时时刻刻不会忘记良知，不会欺瞒良知，不会蒙昧良知，那么这个人的“行”必然符合“知”。

对此，王阳明颇多立言，都非常精彩。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对徐爱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在《答友人》里，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¹⁷⁰

在《答顾东桥书》中，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王阳明下了很大工夫分析“知”与“行”的关系，越分析越透彻，越讲论越明白，讲到最后，“知”和“行”已经紧密合为一体，再也不能分开，甚至王阳明自己说出了这样一句妙语：“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

知行合一，简单地说来，就是以良知引导行为，一产生良知就立刻行动起来，以至“明觉精察，真切笃实”，这本身说来似乎不算太难，但在实际运作时却远非如此顺利，针对此，王阳明对弟子们说了一句重逾千钧的话：“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阳明的弟子徐爱曾经提问：“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两件事。”

阳明答道：“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

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

阳明的好友顾磷问：“如知食乃食，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

阳明答道：“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人口而后知，岂有不待人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

弟子和友人的提问，阳明先生的回答，哲理性都很强，但真正的社会实用性却并不强，令人看后似懂非懂。而阳明学说又是最重视实用性的，
172如果不到社会上去体验，单从哲理上去悟，就又

成了阳明所责备的那种“必欲先用知之之功，遂致终身不行”。

要弄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必须先弄懂什么叫做“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要想明白什么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从学术上很难讲明白，可是我们细看阳明先生自己的切身经历，就容易看懂了。

因为王阳明离开贵阳到外县做官的时候，曾经摔过一个“大跟头”，而“摔跟头”的原因正是“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二 知而不行，是为不知

转眼工夫，王阳明已经在龙场驿站待了两年。这两年间发生了太多的事³，到后来，对王阳明来

说龙场已不再是“冈回行渐远，日落鸟群飞”的穷山鬼域，他不再“感此摧肝肺，泪下不可挥”了。可是龙场毕竟太偏远、太荒凉了，在这里，人生的挫折、被困他乡的孤寂、甚至死亡的威胁仍然无处不在。

正德四年秋天，阳明先生在苗族村寨里做客，意外听说隔壁的苗人家里住着一个从京城被贬到当地来的小官员，还有两个年轻人跟他一起。阳明先生已经太久没听到龙场以外的消息了，十分激动，可此时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就想明天一早再去问候，可天亮之后再问，这三个人已经上路了。

刚过午，苗人来对王阳明说：“有个老人死在蜈蚣坡下，两个人围着尸首哭呢。”阳明先生立刻猜到，这死的准是昨晚住在隔壁的京城小官，
174正在伤心，黄昏时又有苗人来说：“蜈蚣坡下死

了两个人，一个人坐着叹气。”第二天又有苗人来说：“蜈蚣坡下死了三个人……”

三个人，从京城远道而来，却顷刻之间就把命送在了这无边的深山里。阳明先生所能做的只是搭一把手，将这三位死者掩埋了。可追随他的两个仆人却不愿意去埋葬死人，毕竟这是一件令人不快的“脏活儿”。

看着两个仆人对死者表示出的冷漠，王阳明更觉得伤感，叹道：“今天是他们死，明天就是咱们死。”

是啊，龙场就是这样的地方，没有医药，没有亲戚，没有前途，什么都没有。平时阳明先生尽量用务农和讲学充实生活，强迫自己不往这方面想，可现实就这么冷冰冰地摆在面前，稍稍一想，不论是谁都会感到绝望。

好在这时候阳明先生已经度过此劫。正德四年，以前保护过王阳明的贵州按察副使毛科与那位对“知行合一”学说大为叹服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邀请阳明先生到贵阳城的文明书院讲学，在这里阳明先生开始大讲“知行合一”，强调学习要有“着力处”。他对弟子们讲道：“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着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这段话，可以视为心学修习中的一个规范。

在这里，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名词：着力处。所谓“着力处”，就是“立志”，即以良知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在龙场生活的艰难磨砺中，王阳明找到了人生的“着力处”，立下救国救民之志，但在现实中，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又谈何容易。

社会上去试验自己这套刚研究出来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时，才发现知也难知，行也难行，情急之下只好硬来，结果差点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在贵阳文明书院教了一年书之后，正德五年（1510）三月，王阳明的贬谪期满，被任命为江西庐陵县县令，终于离开贵州的深山老林，重新回到官场了。这一年阳明先生三十九岁。

庐陵县是江西吉安府下辖的一个大县，又是江西省内的一处水陆码头，相对而言算是个富裕地方。可王阳明到任的这一年，庐陵县却是刚遭大旱，又遭大疫，再遇苛税盘剥，百姓困苦异常，无以为生。

说到灾荒，正德皇帝上台这五年来，天灾几乎年年不断，而人祸更是比天灾凶恶十倍，江西省内旱了又旱，朝廷的捐税加了又加，把这个原

本还算过得去的地方弄成了一片赤贫。王阳明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贴出告示，让县里的百姓们来告状，因为在他来上任的路上，已经有很多百姓拦路喊冤，“号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于是阳明先生打开大门，请百姓们都到县衙来申冤诉苦。哪想这个告示一发布，却在庐陵县里引发了轰动效应，第二天一早，竟有上千名百姓涌进县衙，每个人都要告状。

告状的乡民如此之多，可审案官员却只有一个人。没办法，王阳明只得硬着头皮坐上公堂，按先后顺序接待了几个告状者，结果发现这些人所告的内容五花八门，情节特别复杂，而且全都比较琐碎，难以处理。

这一下让阳明先生彻底乱了方寸，被弄得头比斗大，手足无措，₁₇₈穷于应付，勉强打起精神问了几个案子，却根本没有一个能审得明白，手忙

脚乱之余，只得退回后堂再思考，最后拿定主意：重贴一张告示，说自己不再接受民众的状纸了，请大家不要再来县衙“骚扰”。

在庐陵县审理民事案件，还是王阳明第一次以自己的一颗良知之心直接面对最普通的民众百姓，这种心态和作为都很难得。至于手忙脚乱，倒不奇怪。可王阳明面对百姓时的态度很奇怪，一开始热情似火，急着为民伸冤，现在遇到挫折，立刻就反悔了，而且公开贴出告示，宣布自己以后“不复放告”，不再接受百姓的诉讼了。在这张奇怪的告示中，王阳明说的一些话听起来也是比较生硬的，甚至可以说完全不近人情，比如告示上有这样的句子：“昨见尔民号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尔民之来讼者以千数，披阅其词，类虚妄，取其₁₇₉近似者穷治之，亦多凭空架捏，曾无实事”，像这样的说法就很不合适。

老百姓“号呼道路”，是因为他们有冤情，可王阳明却认为他们所告之事“多凭空架捏，曾无实事”，这绝不说明上千名来告状的百姓都是在胡攀乱告，只能说阳明先生把这些民间冤苦全都看成“小事”了。

在告示里王阳明还用厉害的话恐吓百姓：“吾非无严刑峻罚以惩尔民之诞，顾吾为政之日浅，尔民未吾信，未有德泽及尔，而先概法以治，是虽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意思是说阳明先生也是个厉害的官员，有很多办法可以收拾百姓，只是刚到任，还没办什么实事，不好意思就此处罚百姓，所以现在先发告示劝说，让百姓们听话。可百姓们要是不听话，“则吾亦不复贷尔矣”，即就要对百姓不客气了。

第一天还热情如火，¹⁸⁰第二天就不胜“骚扰”，声称“自今吾不复放告”，王阳明之所以做出如

此自相矛盾的事，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王阳明初次担任地方公职，对这些地方上的事务太不熟悉，犯了一厢情愿的幼稚病。

确实，初次担任地方官的王阳明真的太幼稚了，只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却没想到他现在迎面遭遇的，竟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社会两千年的致命难题，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困局，王阳明根本解决不了。

历史上的中国虽然算是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老百姓的日子依旧很难过，加之明朝又是个挺糟糕的朝代，气候异常，两百多年间天灾不断，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一针一线、一点粮食、一头牲畜，对他们来说都是极重要的财产，所以告状打官司的百姓很多，告状的内容也非常琐碎。

却少得可怜。明朝一共下设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主事的官员仅有一两名，这一千多位县官名义上要管理六千万百姓！一个县的民众动辄数以十万计，这些百姓分布在广大的乡村，绝大多数不识字，终生没有离开过村庄田地，不和外界打交道，也不准外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脾气执拗，眼界狭窄，和他们说理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同时，当地的村庄也是相对封闭的，外人难以进入，即使是官差，也不能随便进入村庄办公，这么一来，村里发生的事件的真相自然也难为外人所知，因此地方官员处理民事案件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最麻烦的是，在县城里仅有的这一位县官，他真正重要的工作也并不在于治理百姓，因为他实际上要分管全县的政务、经济、工程、治安……方方面面所有的事务，¹⁸²最惨的是这个官员可能在哪方面都算不上专业人士，就已经被多如牛毛的

杂事缠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了，如果再加上案件审理这方面任务，任何一个地方官都将无法履行他的日常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地方官们只好抓大放小，重点审理造反、杀人、宣传邪教之类的大案，其他包括偷盗、械斗、财产纠纷、借高利贷、侵夺田产，甚至买卖人口等，在今天看来属于恶性案件，在当时却被官府视为“琐碎”小事，不能有效地加以审判和处罚。加上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不重视契约精神，借贷、合资、田地房屋买卖、家庭遗产分配往往没有明确有效的契约合同来保证，刑事案件同样头绪繁杂，比如偷盗，究竟是谁犯案？争斗最初是谁引发？有什么证据？要弄清这一切复杂的情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刑事机构去实地调查取证，是根本做不到的，于是原告、被告到了官府之后各自都说自己有理，官员也实

在无法明确判断。

作为县城里唯一的官员，县令们每天在百忙之中大约只能抽出一两个小时来处理一个乱糟糟的民事或刑事案件。因为时间太紧，证据又不充分，官员审案时只能听取涉案人员的陈述，看状纸上写的内容，然后凭自己的经验做出判决。有些官员为了尽快获得供词，干脆在武断的基础上直接对当事人动刑，这么一来，“屈打成招”就成了一种常态，审案的公正性就更受到质疑了。而审案官员因为本就是“凭直觉断案”，没有明确的证据取信于人，无法对输了官司的一方做出合理的解释，结果是每一案审罢，百姓们总是不能满意，堂上“泣诉嚣扰”久而不绝。

这样的案子审多了，不但官员的自信心濒于崩溃，百姓的怨怒也越来越大。于是对簿公堂成了百姓最害怕、最痛恨，而官员最头疼的一件事。

在这方面，王阳明比其他官员多一些优势。他早年曾在刑部任过主事，参与过审决囚犯，在审案方面有一些经验，但真正面对具体而琐碎的日常工作时，王阳明和其他地方官一样，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经费，无处下手。虽有“知行合一”的高明理论，但面对复杂的案情、琐碎的细节，阳明胸中的“良知”根本无法“发动”，结果弄成了知也无从知，行也无处行的境地。

面对如此困局，王阳明只好放弃早先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找一套比较实际的办法来治理庐陵。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后，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用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办法来处理民间纠纷。

在古代社会，民间案件难以审结，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痼疾。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条路

可走。第一条路是实行法家专制，订立严刑酷法，事无巨细一一列入，稍涉违法，立刻给予最严厉的制裁。但这一套办法实际上剥夺了民众的自由，对整个社会是可怕的禁锢，对百姓的奴役和压榨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下场就是很快引发民变，导致一个王朝的覆没。短命的秦朝就是这样的例子，严刑酷法逼得天下老百姓不顾一切来和皇帝拼命，大秦王朝转眼就灭亡了。后来的王朝再也不敢做这样的尝试了。

第二条路是孔子提出的，叫作“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孔子认为：如果儿子偷了一只羊，父亲应该替他隐瞒；如果父亲偷了一只羊，儿子也应该为父亲隐瞒。一个家庭尽可能保持内部的团结，有什么事，尽量内部解决，而不诉之于外。

孔子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最佳的解决之道，而是一个在战乱和动荡年代的无奈之举。可是自春

秋战国以后，封建王朝越来越独裁，越来越强化对儒生的洗脑，导致中国的哲学思想出现了严重的断层。随着哲学的停滞，政治制度的进步也变得异常迟缓。直到孔子去世两千年后的大明王朝，乡村百姓们奉行的乡规民约，仍然是以孔子提出的那套理论为基础。

在大明朝广阔的农村里，家庭的事务，在家庭中解决；家族的事务，在宗祠里解决。再往上一层，则是各乡村依据《大明律》的原则所自行订立的一套乡规民约，要求村民们遵守，村里设一处“申明亭”，一旦遇到纠纷，村里的“老人”——不是那些年龄大的老先生，而是由朝廷认定为德高望重而颁以“老人”这个称号的人，就出来排解纠纷。由于这些“老人”熟悉民情，又有足够的时间处理乡村中的日常事务，大多数村里的治安案件和各种纠纷都由他们私下处理了，只有人

命大案才会上报官府，这样一来，官府就可以集中时间、人力和资源对人命官司展开比较严密和尽责的调查了。

但如果村里的“老人”自己行为恶劣，欺压乡民怎么办？

按当时的规矩，每个乡民家里都收藏着一本朱元璋亲订的《御制大诰》，算是一个普法宣传的小册子，虽然这些农民可能根本不识字，完全不知道《御制大诰》里说了些什么，但这不重要，因为这本《御制大诰》还有另一个用途，那就是当乡民受到“老人”欺压的时候，他们可以头顶《御制大诰》到宫府鸣冤。

“顶诰上诉”，是明朝六千万百姓与朝廷之间的唯一联系，出于对祖制的尊重，地方官员必须对这类案件格外重视，展开一次专门调查，但判决的结果，村民败诉的可能性极大。

针对这种情况，有些正直官员出于对百姓利益的维护，以封建礼教中的“纲常伦理”观念为依托，自己制订了一套“护民”原则。比如著名的正直官员海瑞说过：“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海青天”的这段话，在明代说出来可能是万民称颂，可今天看来却完全不能成立。

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以及依此思想而建立的一整套乡规民约制度，如果以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会认为它是完全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乡规民约本身根本谈不上公正，严重冲淡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在今天的人看来，其

弊远大于利，所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近现代人对孔子思想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可在古代，这却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统治者根本不会为百姓做主，他们只会虐害百姓。与其遭受官府的虐害，不如把事情隐瞒下来，在家族内部自行解决算了。

王阳明刷出告示，声明自己不再接受百姓的诉状，就是出于这般实际的考虑，将民间的案件重新交还给“家族”去处理了。对阳明先生来说，这真正是一个无奈之举。这不是王阳明的错，而是因为大明朝的这套政治制度本身存在严重问题，太粗放，太蛮横，效率太低了。至于怎么改良这套腐朽蛮横的独裁体制？王阳明这么一个小县城里的低级官员，根本就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做县令的王阳明不能有效地替百姓审案辨冤，
190
也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名言：“知而不行，只是‘不

知’。”

三 无路可走的倔强

王阳明担任庐陵县令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但王阳明毕竟是个一心为百姓着想而又很有头脑的人，眼看在审理案件这个问题上真的没有办法，就决定从另一方面下手，尽力约束县里的公务人员，只要这些人不到地方上作威作福，对百姓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王阳明到任县令这一年，庐陵县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可是上级官府对县里征收的粮税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老百姓的负担极重。加之上级的官差在庐陵县征粮时又借机骚扰乡里，多贪多

占，又有县里的差役为了完成税额到乡下去“借办银两”，讹诈百姓，闹得百姓怨声载道。

审理案件实在办不到，可官差骚扰百姓的问题，阳明先生是有能力解决的。于是阳明先生出了告示，催促正在县里收缴粮税的上级官差赶紧把收齐的粮食运走，不要再赖在乡下讹诈骚扰百姓。同时告诉百姓们，对所有公差“其无关文，及虽有关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也就是跑到乡下讹诈百姓的政府官员们，“先将装载船户擒拿，送县取供，即与搜盘行李，上驿封贮，仍将本人绑拿送县，以凭参究惩治”。

在各乡村发布告示，直接让百姓们“绑拿”上头派来的公差，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措施，在明朝，如此行事尤其难得。

至于曾有县里的官差到地方上强征粮食财物的事，大概是发生在阳明先生到任之前，如今他

新官上任，对县里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也不好说得太过，就和了一回稀泥，先安慰百姓道：“借办银两，本非正法”，县里的差役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上面这些人也是一时没办法了，“出于无聊也”，才会到村里去要无赖，跟你们要钱。至于村里的老百姓，牢骚也发了，骂也骂过了，就算了。但“今急难已过，本府决无复行追求之理，此必奸伪之徒，假府为名，私行需索，自后但有下乡征取者，尔等第与俱来，吾有以处之”，再有人下乡讹诈百姓，就让百姓把这些官差扭送县衙。

在这方面，阳明先生态度鲜明，手段也够硬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县仅几个月，就基本制止住了县里公差在乡村胡作非为。

除了在审理案件这个问题上被闹得手忙脚乱之外，¹⁹³阳明先生在庐陵县遇到的困难还有很多。

这些年庐陵县境天灾人祸不断，盗贼很多，面对这些毛贼，官府无力处置。王阳明就想了个办法，决定在自己的治下强化“保甲法”，把每个村庄编为一“保”，村里每十户编成一“甲”，以保甲为核心，村民们抱成一团互相照应，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盗，同时征粮收税、摊丁派役的时候也很方便。这套保甲法推行下去之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王阳明对此比较满意。在后来任职南赣期间，阳明先生把这一招当成了治理地方的法宝，并进一步完善了这套制度，使之发展成为“十家牌法”，走到哪里就用到哪里，大体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上文已说，庐陵县在王阳明到任不久便发生大规模瘟疫，而体弱的百姓们个个病倒在床，情况十分凄惨。面对这种局面，王阳明赶紧找来郎中研究病情，¹⁹⁴制定药方，尽力向百姓派发药物医治。

但王阳明已经当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对手下差役们的办事能力和态度有了相当的了解，心中已经不再抱任何幼稚的幻想了。他很清楚，县衙下属那些差人和乡村里的“老人”——那些官府指派的保长们未必是什么好东西，这些人平时总要钻法律的空子，想方设法坑害百姓，捞取不义之财，现在让他们发放药物，只怕“官给之药，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被这些家伙从中贪污，根本发不到百姓手里，于是嘱咐百姓们“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意思是如果病人亲属请求帮助，而这些保长们不管的，百姓可以到县衙来向阳明先生告状。

其实王阳明自己也知道这是废话。因为百姓之间的诉讼他都处理不了，百姓告保长，那更是不好处理。这种事官府很难抓到真凭实据，就算有了凭据，往往也因为事情不大，不能把保长们

怎样，弄个不了了之，反而那些来告状的百姓可能会遭到保长的报复，所以百姓们受了欺负也不敢来告。

在这种情况下，阳明先生只能用道德去感化百姓，请百姓们尽量“兴行孝悌”，家人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不要抛弃那些卧病在床的亲人，使之病饿而死。

想不到这一年真是庐陵多灾，阳明多难，这场瘟疫还没过去，县城里又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一下烧毁了上千间房屋！把小半个县城都毁了。阳明先生亲自指挥大家救火，整整忙碌一夜，火虽然被扑灭了，可是大灾已成，县衙又没有一两银子的闲钱，根本无力救济，王阳明只能要求百姓在重建房屋时各自后退一些，隔开一条防火道，希望能防灾减灾于未然。

在火灾中倒是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火灾发生的时候，庐陵当地的驻军“吉安守御千户所”的士兵和百姓之间互相争抢火巷，其中一个叫石洪的军户和百姓吴魁吴两家发生了争执，事后吴魁昊到县衙来告状，说军户欺负了他，请求王阳明逮捕石洪治罪。

石洪、吴魁昊两家谁曲谁直，暂时还没有定论。但这件事本身却有蹊跷：石洪是个“军户”，于是阳明先生身边的差人们就借机提出“军强民弱已久”，军人欺压百姓的事时有发生，建议阳明先生趁这个机会当众惩罚一下军户，在老百姓面前赚一个好名声。

军户，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一种制度，军户家庭的男子世代当兵，生活贫困，又经常面对战事，朝不保夕，社会地位比普通的百姓更低，日子也更难过。现在百姓来告军户，县衙里的人

也劝王阳明做个样子给百姓看，要是换了别的官员，也许真就打击军户来取悦百姓了，可王阳明却不肯这么做，而是特意指出军户生活困难，差役繁重，吉安千户所已经半年领不到月粮，这些军人比老百姓还要穷。加之这个军户石洪全家都在庐陵居住，如果因为这个过失处罚他，判他的罪，石洪立刻就会被送到边关去服役。为一点小事害得军户抛家舍业，实在有些过分。

最后，阳明先生在发布的相关告示中公开斥责了那些劝他惩罚军户以邀民心的人，认为他们居然想请求县令徇私枉法，假装“护民”以博取名声，这种欺诈的手段违背了阳明先生的良知，王阳明简直把它视为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何尔民视吾之小也？”

从上面这些事例来看，王阳明担任庐陵县令后，在处理问题时尽可能以公平为原则，表现得

非常理智，虽然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可是凡能做到的，他都尽心去办。但很快，王阳明又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这个小小的县令仍然是“知而不行，只是不知”，根本解决不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阳明先生刚到庐陵就职不久，从顶头上司江西吉安府的知府衙门来了一位“上差”，要抓庐陵县的一个小吏陈江，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庐陵县的“葛布捐”征不上来，这个陈江是征收的责任人，吉安府想拿他开刀，警告其他收不齐捐税的官差。

葛布，又称夏布，是一种轻薄的布料，广东、江浙都有出产，尤以广东出的最好，可是庐陵县境内却不出产这种东西。想不到正德皇帝上台之后，从朝廷里派下来一帮太监，这些人个个蛮不讲理，公然向这个不产葛布的穷县征收葛布，县里当然拿不出布，上头就命令地方上用银子来抵，
199

就此给庐陵县定了一个“葛布捐”。一开始订的额度是每年征收白银一百零五两，可是县衙里的人却不知道该怎么跟老百姓张这个嘴，这些差人倒也有些良心，干脆一连几年的“葛布捐”都由这些人自己来凑，其中主管“葛布捐”的陈江每年都垫了些银子。

可捐税这东西年年要征，真正是个无底洞！到了正德五年，上级又派人来征收这笔钱，县衙的人已经先后垫进去几十两银子，这些人也是靠着俸禄吃饭的，穷得很，实在凑不出来了，吉安府就派人下来捉拿陈江。

这分明就是官府巧立名目乱摊滥派，强行掠夺百姓的财物。像陈江这样的小吏稍有良知，不肯向百姓摊派，知府衙门就派人来捉他，简直毫无人性，王阳明₂₀₀赶紧阻拦他们。可这件事还没解决好，上面又开始征收杉木、楠木、木

炭、牲口各项杂税，征收额度也从原来的每年三千四百九十八两增加到了一万余两！

早在正德皇帝上台之前，这种巧取豪夺的苛捐杂税百姓们就已经无法负担了，可正德皇帝登极的这几年，朝廷的征税额度居然连年上涨，地方上的捐税也恶性增长，五年之内竟然涨了三倍不止！其实说穿了，朝廷在财政上早就已经捉襟见肘，正德登极之后，这个疯子皇帝的所作所为每每不合常理，贪占勒索，自坏法度，财政亏空日甚一日，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

正德皇帝登极之时，大明朝一共养着亲王三十人，郡王二百余，文官两万多名，武官十多万名，另有小吏五万五千名，由国家提供生活费的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名，而全国税粮总共只有两千六百六十万石，²⁰¹ 分给这么一帮米虫子，根

本不够吃。

没有足够的钱粮发放，朝廷就只能拖欠官员俸禄，拖欠军队的粮饷，连一些宗室贵族的月粮也赖着不发。这些人连工资都领不到，自然就仗着手中的权力到老百姓头上去想“办法”，文官搜刮百姓，武将掠害军户。至于老百姓会不会被逼死，军户们会不会饿死，朝廷不管，地方官更不管。

朝廷已经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地方上更甚，偏巧又赶上正德这样的皇帝，刘瑾这样的权阉。正德皇帝居然公开命令派到各地的太监给他进贡“孝敬钱”，规定南京每年征收十五万两，两广十三万两，湖广十一万两，四川九万两，河南八万两，陕西七万两，其他山东、山西、福建、浙江、江西各省都有。²⁰²刘瑾比皇帝更厉害，干脆公开在朝廷里买卖官职，不但向那些求他办事的

官员索要贿赂，甚至那些只是进京来述职的官员也必须向刘瑾进贡银两，就连派到外地的官员回京，也必须给刘瑾送一笔银子，那些不给钱的官员，就要遭到打击报复。

到后来，刘瑾觉得这样一笔一笔的索贿已经不够，干脆又向获罪的官员罚起款来，而且他处罚的多是那些得罪了他而被打击的正直官员，其中正德三年九月一次就对五十六人罚米，多的三百石，少的二百石，规定这些官员必须在一个月内把米送到指定的官仓，否则治罪。因此被他整垮、害死的人多得难以计数。

有皇帝、刘瑾做榜样，朝廷里的坏人哪里还会闲着？那些藩王、贵戚、太监、奸党们一个个借着皇帝的名义拼命搜刮百姓，横征暴敛，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²⁰³有良知的官员和穷苦的百姓们则被逼到无以为生的地步，现在庐陵县的杂

税一增就是三倍，正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了。

庐陵，一年之间经历了旱灾、瘟疫、火灾，到现在还要上缴三倍于往年的杂税，百姓们哪里还受得了。于是上千百姓又一次拥进县衙，跪在地上请求县太爷帮他们想个办法，救全县百姓的命。但“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王阳明，面对朝廷，面对政局，仍然是想不出任何好办法来。

孔夫子曾说过，“仁者爱人”，可怎么才叫“爱人”呢？孔夫子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眼下王阳明任庐陵县令，要是一心巴结朝廷，奉承长官，那就昧了良知，成了恶棍了。可要是护着百姓去和朝廷斗一场，王阳明就必须做好被罢官、入狱、流放的准备。这正是考验一个人“良知”的时候。

好在阳明先生也真不负“心学宗师”之名，下定决心为百姓着想，于是当众做出了保证：这一万多两滥征的捐税全部免除！为了百姓的利益，王阳明这个小小的县令把性命豁上了。他在给上级吉安知府的公文里赫然写着这样的话：“俯念时势之难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这是真正的“为民请命”。但王阳明的勇敢会有人响应吗？

没有。

王阳明完全是在孤军奋战，虽然他在为百姓谋利益，却根本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是百姓们不肯支持他，而是封建专制、王法条例都是捆綁百姓的绳索，处在封建专制之下的百姓们麻木、愚昧、胆小如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支持这位好

心的县令。所以这个小小的庐陵县令眼下非常脆弱，也非常危险，送出公文之后，他只能坐等着上级部门来逮捕他，治他的罪。

阳明先生原本也确实是要被治罪的，因为他的上级是个严厉的官员，连一个征不齐“葛布捐”的小吏都不放过，又怎么会放过这个公然免除税银的县令呢？可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瑾倒台了！

刘瑾倒台，是自正德皇帝发动政变迫害朝臣以来，北京城里发生的最大的政治事件。这一政治事件使得朝廷的权力天平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很多东西在一瞬间被颠倒了过来，王阳明这个待罪的县令也立刻被视为早年与刘瑾斗争并遭到陷害的忠臣之一，昭雪冤案，奉命调回京城等候任命。

这种时候“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政治的巨大惯性使得所有人都不再提起阳明先生“抗命罢

捐”的事了。于是原本犯了重罪的王阳明忽然被洗脱出来，顺顺当当离开庐陵，回京城做官去了。

但庐陵县的“葛布捐”是否还在摊派？上万两的巨额捐税是否仍在征收？明年这个时候，谁来为庐陵百姓请命？我们不知道，甚至不敢去设想……

四 陷害奸臣

正德五年八月十一日，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突然倒台了，其倒下的速度比上台的速度还要快得多。这个权阉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倒台，原因只有一个：他是被皇帝和预先安排下的政治同谋们陷害至死的。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基本上没有“突

然发生”这一说，刘瑾的倒台也是经过长时间蓄谋准备的，只是蓄谋的时候很隐蔽，所以发作的时候让人觉得很突然。

早在刘瑾倒台之前，内宫里发生了几件看似不相关联的事：一是刘瑾秉承皇帝的旨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宣布了一个由五十六位大臣组成的“奸党集团”名单；二是正德皇帝离开乾清宫，搬进了“豹房公廨”；三是“八虎党”之中权力仅次于刘瑾的另一个太监张永忽然和刘瑾闹翻了。

在掌握大权的五年时间里，刘瑾干了不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蠢事。如正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以正德皇帝的名义颁行圣旨，命群臣跪在金水桥侧，自己当众公布了一个“奸党”名单，共列出“奸党”五十六人，其中有司礼监太监三人：王岳、范亨、徐智；²⁰⁸大学士两人：刘健、谢迁；尚书四人：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郎中一人：

李梦阳；主事四人：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检讨一人：刘瑞；给事中十六人：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邵、艾洪、吕狮、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二十五人：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朱廷声、刘玉。

两位阁老，四位尚书，三位内廷中职司最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外加几个郎中、主事，几十位言官，这些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部门，地位相差悬殊，平时没有过多的交往，很多言官甚至远在南京任职，这五十六人根本不可能结党，他们只是集中起来反抗了皇帝，想要诛杀刘瑾。如果这些正直的臣子被认为是“结”了党，那正德皇帝

和刘瑾这几个控制特务部门的太监也可以被视为结党，他们结成了一个和被打击的文臣们对立的邪恶之党。

其实这次公布“奸党”名单并不是刘瑾的主意，而是正德皇帝在暗中授意。因为公布这个名单既是恫吓朝臣，同时又等于变相地宣布：反对皇帝的“奸党”已被消灭，皇帝对文臣的迫害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发动政变，罢黜阁臣，这本来就是正德皇帝的主意，只不过借刘瑾的手来实施罢了。所以刘瑾残酷迫害朝臣的时候，正德皇帝一次面也没露过，刘瑾迫害宫里掌权的太监，正德皇帝也从没发过话。可是清洗司礼监，夺取东厂，重设西厂，罢黜阁臣和几位尚书，公布“奸党”名单，这一件件大事背后，皇帝的影子始终若隐若现。尤其是刘瑾又设置了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行厂”，

专门用来监督和清算宫里掌权的太监，在这件事上，正德皇帝的暗中授意就更明显了。

现在正德皇帝又通过“公布奸党名单”的办法暗示朝臣：“奸党”已被连根拔除，只要臣子们不再自找苦吃，皇帝就可以认为朝中已无奸党，当然，也就不需要大规模地抓捕、责罚、贬谪大臣了。而此时的朝臣们早已无力再闹，于是正德皇帝也就停止迫害大臣，紧绷了两年的朝局就此“缓和”了。

在宣布迫害结束、朝局缓和之后，正德皇帝就离开乾清宫，搬进了豹房。

豹房在皇城西内太液池的西南岸，原本是皇宫里饲养猛兽的地方。正德二年，皇帝看中了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喜欢“豹房”这个听起来相当邪恶的名字，就擅自花费白银共计二十四万两，
211

添造房屋两百多间。此时朝中大臣刚刚遭到清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控制皇帝的私欲，正德皇帝给这个新的建筑群取名“豹房公廨”，并于正德二年八月从乾清宫搬到豹房，在这里安了家。

正德皇帝这样做，目的是要摆脱母亲张太后对他的监护，摆脱与妻子夏皇后之间的婚姻纽带，也摆脱与朝廷大臣的直接联系，彻底成为一个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的独裁者。

掌握大权，缓和朝局，搬出乾清宫，这些事办完之后，正德皇帝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布局，从此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了。而刘瑾在掌权的几年间打击朝臣，广布冤狱，得罪的人太多，又收贿索贿，买官鬻爵，聚敛金银，名声太坏，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只能给正德皇帝脸上抹黑。于是正德皇帝决定布局，清除刘瑾，既把这个权力过度膨胀而被外界称为“立地皇帝”的太监消

灭掉，免去政治上的威胁；又为自己早年的邪恶行为寻找借口，恢复自己的名誉。

于是正德皇帝开始在刘瑾身边培植另外两股势力：正直精干却与刘瑾有仇的朝臣杨廷和、杨一清以及与刘瑾齐名的大太监张永。这几位臣子不负皇帝之托，很快就借着安化王谋反一事搜罗各种证据，证明刘瑾想要“谋反”，于是皇帝勃然大怒，翻掌之间，就把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关进了死牢。

后来特务们抄刘瑾的家时，居然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零五万七千八百两，总共约合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百万锭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总计约合银五千万两；另有宝石两斗，金甲两副，金钩三千副，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₂₁₃狮蛮带两束，金汤盒五百套，龙衣袞袍八件。除了这些吓人的财宝外，还

有用于“造反”的工具：穿宫牙牌五百余面，盔甲一千余副，弩机五百余副，外加一颗“伪玺”。除此之外，又在刘瑾随身的折扇里发现两柄尖刀……

在大明王朝的官场上，一个权臣的生死荣辱全看皇帝的喜怒和政治的需要。所以明朝的官员们根本没有人会天真到去讲究证据，追求什么“真实数字”，从皇帝、辅臣、特务头子到朝廷里的刑部官员，所有人一致认为刘瑾犯了如此大罪，那是一定要严惩的，而大明朝最残酷的刑法就是凌迟。

于是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刘瑾被凌迟处死。那天，很多人到法场来争着向刽子手买刘瑾的肉，当场生吃下去。刘瑾死后，愤怒的百姓冲上刑台，把他的尸骨拆散，骨头都砸得粉碎。

杀了刘瑾，吃了他的肉，拆了他的骨，天下

官员百姓无不欢呼雀跃。这时候大家似乎已经忘了：刘瑾虽死，当年那个“八虎党”还在，尤其正德皇帝还盘踞在豹房里，正在为所欲为，大明朝的政局并未有丝毫改变。

陷害，是传统官场哲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在中国历史上，被陷害而死的奸臣，恐怕不比被陷害而死的忠臣少。而读史书的时候，我们通常只记住了李斯，却忽略了秦始皇；只记住了张汤和郅都，却忽略了汉武帝；只记住了李辅国，却忽略了唐肃宗；只记住了秦桧，却忽略了宋高宗；只记住了刘瑾，却忽略了明武宗；只记住了和坤，却忽略了清高宗……就好像在这些恶劣的皇帝身上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奸臣保护膜”，一切邪恶都是“奸臣的邪恶”，²¹⁵躲在奸臣背后的皇帝却永远冰清玉洁，完美无瑕。

奇怪，为什么我们总是只关注舞台上的小丑，而忽略了幕后真正的邪恶？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透过表象去看问题的本质？究其原因，只是因为中国人没能理解孔夫子提出的“克己复礼”。

早在春秋时代孔夫子就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但如此明确如此简单的四个字，两千年也未能实现，到现代，更是被中国人质疑，因为大家都在纠结于两个问题：克己复礼，是要“克”谁？要“复”什么？

克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而私欲，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克己”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但实际上，孔子一生从没有致力于克制老百姓的私欲，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来“克制”国君和贵族们的私欲了。虽然孔子到处讲学，²¹⁶教出弟子三千，但他教育这些弟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些弟子和他一

起去“克制君王”。

孔子思想的本意，是只“克”君王而不“克”百姓的，因为光是克制君王的私欲就已经让这位老先生忙不过来了，他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管百姓的私欲了。对此，孔子留下这么一句话：“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政治，就是“正直”，君王们正直了，其他人（百姓们）谁敢不正直？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统治者的德行像风，老百姓的心像草，仁德之风吹过来，草自然就伏了。)

老百姓的私欲怎么去克？且不必管，先把君王“克”住，把统治者“克”住，把执政者“克”住，这是首要的，这一条没做到，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才是“克己”的本意！²¹⁷如果我们理解了“克己”的真正含义，并像孔子一样，把“克制君王的私

“欲”当成头等大事，就能击穿那层“奸臣保护膜”，直击问题的核心。

什么是“复礼”呢？就是恢复社会秩序。恢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恢复“对当时来说最好的”社会秩序。孔子生活在周朝，对他来说，已知的最好的社会秩序就是“周礼”。对此孔子做过总结：“周监于二代，郁郁而文乎，吾从周。”意思是说，周礼总结了夏朝和商朝礼法的精华，丰富多彩，所以我才把周礼当成最好的社会秩序加以维护。

孔子生在周朝，于是他维护较为先进的“周礼”，而不维护比较落后的“夏礼”或“商礼”，这是孔子做出的明智选择。我们这些后人要“复礼”，要恢复社会秩序，该怎么做呢？当然是寻找我们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来恢复一种最好的社会秩序。

刘瑾倒台后，王阳明调回京城担任了吏部验封司主事，这是时隔五年之后再次做回他的六品京官。可这五年的磨砺已经使王阳明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一位心学宗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王阳明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志向，那就是：广收弟子，开馆讲学，把心学思想传播于世，发扬光大。

在庐陵县做县令的几个月时间，是阳明先生这一辈子和百姓贴得最近的时候，也是他最感束手无策的时期。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他既不能治理县境、解民疾苦，也无力与上司抗争救民于水火，任职期间感觉到的，是空前的软弱和无能。

正是这份失败的挫折迫使阳明先生重新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北京城里又有刘瑾这个“活样本”²¹⁹让他分析，在京城赋闲的时候，又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去思考。最终王阳明逐渐明白，要想成为一个对时代有所贡献的人，光靠良知指引方向还不够，他还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打破皇权的独裁，化解朝廷施加在百姓身上的毒咒。

苦思冥想之后，王阳明做了一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讲学，像孔子那样全力讲学，讲“良知”之学，讲“知行合一”的道理，尽可能培养出一群既正直又有才华的学生，教会他们“用良知指引人性”。

当年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以后，就开始讲学，教化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他的目的就是要集众人之力与邪恶的统治者抗争。以前王阳明在京城、龙场、贵阳城里都讲过学，但那时的他意识还不清晰，只知道应该讲学，却不知道为何讲学。可经过对“刘瑾事件”的反思，²²⁰他才真正明白了“克己复礼”的指向性问题，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要

讲学”，由此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讲学，像当年的孔子教书育人一样，培养出一群敢于向恶势力挑战的勇士。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说过这样的话：“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正‘皇帝’也”，但“皇帝”两个字是看得出来的。

而《传习录》里的另一段话说得更清楚：“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表面看是在讨论学问，其实却是在强调“大臣格君心”这几个字，而这正是孔子“克己”之本意。

力行，打出一个心学

一 作恶多端的忠臣

自从正德五年被调回京城担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以来，王阳明和两个老朋友湛若水、黄绾在京城的大兴隆寺开馆讲学，很快就在京城收下了几十个弟子，大讲良知，大谈知行合一，开始悄悄实践他那救国救民的理想，渐渐讲出几分名堂来了。

在京师讲学两年之后的正德七年，王阳明又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小小一个五品官。此时阳明先生早已志不在官场，一心只想研究圣学，²²²

多收弟子。这期间王阳明无意之中收下了一个弟子——广东南海人方献夫。

方献夫很机灵，人很正派，极善变通，却是个性格上挺矛盾的人。早年正德皇帝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梦见自己戴着一顶白头巾，觉得不吉利，心情不好，方献夫得知此事后就说：“太子现在是‘王’，上面再加一个‘白’字，正好是个‘皇’字了，这是说太子将来会做皇帝。”一句话把正德哄得很高兴，后来正德真的做了皇帝，就把方献夫调到京城担任吏部员外郎，准备重用。这时候方献夫在京城结识了王阳明，听了几堂课，被王阳明的学识所折服，就拜在阳明先生门下。方献夫学了“心学”之后，却灰了做官的心，辞职归隐于西樵山，读书十年，直到嘉靖登极后才复出。

223

后来，方献夫成了嘉靖一朝炙手可热的权臣，

阳明先生的晚年被这个学生捧得热闹非常，也搅得天翻地覆。

和方献夫一样，王阳明也厌倦了正德朝的官场，早有了归隐之意，可有意思的是，王阳明越不在乎官场，他的官运反而越旺，这年十二月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这是个给朝廷养军马的差事，治所在滁州，离南京不远，是个山水清幽的偏僻地方。阳明先生不会养马，也无需亲自去养，自然寄情山水，访幽探密，流连忘返，又收了大批弟子。

在滁州的时候，王阳明开创了一种有趣的“无课堂教学法”，时常带着学生们走出课堂，登山临水，游览名胜，行止之间随口交谈，处处都是学问。阳明先生的这一套教学方法让今人感到好奇，而仔细想来，²²⁴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到处讲学，

山野溪边，村头树下，幕天席地，无处不可讲论，阳明先生在滁州讲学的办法，似乎与孔子一脉相承。

其实要说神奇，倒也不奇。孔子和王阳明可以做到“随处讲论学问”，只是因为他们参透了“学”字的真意。学，是思考的意思。正因为“学”是思考，才能在山水丛林间随时体验，行止坐卧间处处深思，一有所得即刻讲论。如果错把“学”字理解成模仿，理解成老师一字一句地灌输，学生们照猫画虎地接受，就是把学生们给误了。

在滁州当了一阵子养马的闲官，阳明先生也实在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半年工夫却又升了职，调任南京鸿胪寺卿。

鸿胪寺卿是一个负责朝会、接待外宾、主持各项典礼的差事，凡是有什么国家大典、祭祀、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

各项杂事都归鸿胪寺操办，看起来似乎责任重大，事务繁忙。但王阳明担任的是个超级闲职，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几乎无事可做，因为明朝的首都搬到北京去了，这些朝会典礼当然也都在北京举行，贡使外宾之类也都到京师去了，南京鸿胪寺卿只是摆设罢了。

不管职位闲与不闲，反正鸿胪寺卿已经是个四品官职了，从这天起，阳明先生也有机会脱了一身蓝袍，换上大红官服，胸前的补子上照例绣上了两只金灿灿的云雁，所谓平沙落雁，倒也稳当安逸。在王阳明想来，他这个早就无心仕途的人，至此已经算是把官做到头了，因此他也拿定主意：一有机会就辞官归隐，回家乡全心全力去讲学传道。

自到南京之后，阳明先生更是讲学成癖，弟子更多，良知之学也越发精熟，正在究贤论圣、

乐不思蜀的时候，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吏部忽然来了公文，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九府。

都察院是大明朝廷里一个要害部门，设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下面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明史》称其“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期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简言之，就是朝廷里的闲事都能管，什么人都可以参，权力很大。

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一跃而成为北京城里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虽然官职仍是四品，可是

从原来的“超级冷板凳”跳到现在这个肥缺要职，真算是一个了不得的升迁。更何况又立刻委任他巡抚南赣九府，这又是一个统领军政的地方实权要职，所谓“凡政令之布、赏罚之施，皆在此。诸帅出兵、受律、献首级，亦在此。郡县百司政有弛张，亦必至此白之，而后敢罢行焉”，封疆大吏，实权在手，要功有功，要名有名，真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好差事。

但这些功名、好处在此刻的王阳明看来真如粪土一样，他立刻给皇帝写奏折拒绝上任，不但不做这个南赣巡抚、金都御史，而且请求“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

金都御史，不做；南赣巡抚，不当，甚而自称无能，外加身体有病，而且祖母时年九十七岁，需要奉养，以此三端为借口，阳明先生要求立刻
228退休。而且奏章送出后，他就直接离开南京回了

山阴老家。

王阳明不接受任命，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看透了朝廷，认为教书育人比在正德皇帝手下任职更有意义，一心想回家乡去讲学，做孔夫子当年做的事，尽自己的力量培养一批“文化精英”，为这个社会真正出一把力。

二是阳明先生知道朝廷任命他担任南赣巡抚是要去剿匪的。南赣治下的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湖广郴州九个府正处四省交界，山高林密，盗贼横生，其中很多都是横行十几年的巨寇，结寨于绝险，聚集亡命之徒，根子扎得非常深。加之这几年来正德皇帝一直在横征暴敛，祸国殃民，把全国的老百姓都逼得活不下去，明朝六千万百姓中，已经有近六百万人做了流民，平均每十个百姓就有₂₂₉一个流浪汉！这些人不想瞪着两眼饿死，

只得纷纷落草，以至于十几年间南赣一带的盗匪数量翻了几倍，每年更有数不清的百姓沦为盗匪，正是官逼民反，剿不胜剿。他一个白面书生被派到这样的地方剿匪，恐怕难以胜任。

三是明朝的官军是出了名的训练极差，军纪败坏，勾结盗匪，杀良冒功，什么缺德事都干，率领这样的军队去剿匪，不知要杀害多少百姓，欠下多少血债！王阳明这个有良知的正人君子，绝不肯做杀人放火、戕害百姓给自己邀功请赏的下流事情。

有此三端，王阳明自然辞官不做，一心只想回乡讲学了。

南赣巡抚是个要紧职位，可王阳明却不肯接受任命，坚决要求退休，这个决定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那个昏庸的正德皇帝拿住阳明先生不放，无论如何不肯让他退休，十月二十四日圣

旨来催，逼着王阳明立刻去南赣上任，而且“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意思是把人事、经济大权也放给了他，算是格外恩遇了。

眼看正德皇帝对王阳明似乎越来越信任，交给他的权柄越来越重，可王阳明心里是有准主意的，他从心底里不愿意帮着正德打仗，杀害穷苦百姓。他接了圣旨后立刻再上奏章请求退休，这次提的还是“有病、无能”这几个旧借口，只想着这么一个肥缺，自己不去，朝廷里不知多少人来抢，推辞两遍之后，皇帝就不会用他了。却想不到正德皇帝在十一月十四日又下了第三道圣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同时兵部也来了咨文，说有个都御史文森因为耽误公事已经挨了皇帝的收拾，希望王阳明不要学文森的坏榜样，给自己找这路麻烦。
231

虽然兵部咨文拿“文森被皇帝收拾”的事吓他，王阳明倒并不怕吓唬，接了这道旨意后仍待在老家不肯动身。这一方面是阳明先生到这一刻仍不认为皇帝非要派他去当这个巡抚不可，而他自己实在不想去办这件杀人的差事；再说王阳明是个文官，没打过仗、带过兵，对地方政务也不熟悉，就算真要去办这件大事，事前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到兵部衙门的全力支持才行。

当然，阳明先生和兵部之间具体的商讨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阳明先生最终等来的是皇帝的第四道圣旨，这道圣旨是十二月初二下发的：“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道圣旨不同以前：一是明说“不准休致”，绝了王阳明退休的念头；二是“着上紧前去”，232语气生硬。王阳明也知道实在躲不过了，只好在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初三匆匆上路，第二年正月十六到江西赣州的巡抚衙门上任。

不过阳明先生毕竟是被人逼着上任的，心里有气，忍不住要冲皇帝发几句牢骚，就借着给皇帝写“谢恩疏”的时候在奏章里夹带了几句“顾兵粮耗竭之余，加之以师旅；而盗贼残破之后，方苦于疮痍，尚尔一筹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观？”的硬话。大概在阳明先生想来，在正德手下当官这些年，除了委曲就是别扭，现在皇帝硬逼着他出去当官，临上任前不甩几句硬话，对不起当年那一顿板子。

用硬话责备皇帝，这倒不稀奇，阳明先生是个“狂者胸次”，见了坏人坏事一定要骂，所以他后半辈子给皇帝上的奏章，²³³动不动就把皇帝骂上几句，有时候骂得太激烈，让后人看了都替他

捏把汗。可王阳明此番上的这道奏章，最后一句非常有趣：“稍俟狐鼬巢穴之平，终遂靡鹿山林之请，臣不胜受恩感激。”意思是说等消灭了山贼之后，请皇帝一定答应让臣归隐山林，臣这里先谢过皇上了。

一个没带过兵、没打过仗的文官，忽然被派到南赣的深山老林里去剿灭积年惯匪，这实在是千难万难的一项工作，可朝廷对王阳明异常信任，阳明先生自己的把握似乎也很大，还没出发就知道此战必胜，他怎么这么有信心呢？

从后来作战的情况看，王阳明在南赣剿匪得到了兵部衙门的大力支持，总结起来主要有几点：一是在兵部的压力之下，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军队都对王阳明这个从闲职提拔上来的文官俯首帖耳，任其调动，基本不敢拖延生事；二是王阳明尚未去南赣赴任之前，²³⁴兵部就对南赣一带的“贼

情”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做好了细致的情报工作，并及时把全部情报通报给王阳明，使他能做到知己知彼，首战建功；三是在必要的时候，兵部尚书王琼亲自请示皇帝，发给王阳明八面王命旗牌，以便有效地节制军队；四是王阳明搞的一些新政策——包括十家牌法，增设县治，疏通盐法，操练官军，编练民兵等，兵部方面都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有了兵部的全力支持，王阳明才能信心十足地奔赴战场。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怪事：王阳明自从做官以来，担任的不是小官就是闲职，根本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在正德皇帝脑子里，阳明先生除了正德元年上奏请求释放言官，惹皇帝生气之外，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为什么在决定南赣巡抚这么重要的人选任命时，正德皇帝会想起来任

用王阳明呢？

说到和兵部的“关系”，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阳明先生确实在兵部担任过武选清吏司主事，可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何况当年他在兵部担任的只是个小小的六品主事，任职时间又很短，兵部衙门对阳明先生的全力支持，难道就因为他担任“武选清吏司主事”这么一段微不足道的渊源吗？

显然，不是正德皇帝想要重用王阳明，也不是兵部衙门特别看重阳明先生，而是阳明先生的一位知交好友想让他到南赣领兵。这位知交好友，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

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山西太原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臣子，历任户部、²³⁶兵部和吏部尚书，历进“三孤”（少保、少傅、少师）“三辅”（太子太保、

太子太傅、太子太师），是一位著名的能臣，早年担任工部都水郎中，治理过漕运，三年下来漕运畅通，杜绝贪腐，卓有功绩，其后担任河南右布政使，正德三年担任吏部右侍郎，当时正是刘瑾专权时期。王琼为人正直，从不巴结刘瑾，结果遭到阉党迫害，被夺了官职赶出京城。一直到刘瑾死后，王琼才得到平反，于正德七年回京任职，第二年授户部尚书，正德十年出任兵部尚书，上任之后针对明军在内地征剿流民之时以杀人多寡和首级数量报功的旧例提出：“此嬴秦弊政，行之边防犹可，未有内地而用首（级）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论而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从此明朝那支腐败无能的军队不能再随便杀害百姓，用草民的头颅来冒领军功了。²³⁷单就是这一项举措，兵部王尚书就值得后人敬重。

王琼精明能干，也很务实。在正德这个昏君面前，他不惜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混入豹房，成为正德皇帝身边的宠臣，以保证兵部的运作能够保持正常，不被破坏，但也因为挤进豹房去当“宠臣”，在正德皇帝死后的大清洗中王琼获罪下狱，几乎丢了性命。

正是这位兵部尚书王琼在正德皇帝面前屡次举荐王阳明，催着皇帝连下四道圣旨，才逼使阳明先生出山接任了南赣巡抚。随着剿匪战斗的深入，阳明先生为了统筹兵力，请求朝廷发给王命旗帜，于是王琼说服了正德皇帝，发给阳明先生八面王命旗帜。这些王命旗帜不但在剿匪时派了大用场，在后来歼灭宁王的战斗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后王阳明能在南赣立下奇功，王琼作为举荐和力挺之人，功不可没。

238

说到王命旗帜，我们又要画一个问号了：王

阳明在南赣剿匪真的如此艰难，以至非要请下“王命旗帜”不可吗？

并非如此。

在剿匪战斗前期，王阳明主要指挥官军作战，虽然战斗过程不是很顺利，但官军对他的指挥还是服从的。而在后来的几场战斗中，王阳明使用的是地方上组织的民兵，这些部队王阳明调动起来很方便，所以在这几场战斗中，王命旗帜并没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兵部为王阳明请得八面王命旗帜，使王阳明获得节制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马的重要兵权，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剿匪。

把这些因素连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去担任南赣巡抚，并不是为了在南赣剿匪，而是为了监视在南昌的宁王。²³⁹而王阳明从一开始的拒绝上任到后来的出山赴任，

也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一次身担重任，不能推脱。

宁王朱宸濠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弟弟宁王朱权的四世孙，论辈分，他是正德皇帝的爷爷辈，但年龄却比正德皇帝大不了多少。

早年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各地，帮着他守御疆土，其中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被封在大宁，手里掌握着一支精锐的边军。后来四皇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江山的时候，用计从朱权手里夺取了这支精锐的部队。事成之后，朱棣把朱权改封在江西南昌，从此宁王府成了朱姓王公之中第一等的藩王。

弘治十年（1497），宁王朱宸濠嗣位，成了南昌宁王府的第四代藩王。²⁴⁰朱宸濠这个人很聪明，有文才，也有野心，眼看正德皇帝昏庸邪恶，已

经失尽了天下民心，朱宸濠不由得生了谋反之心。这些年他盘踞南昌一府，广纳谋士，贿赂官员，经营多年，势力很大。他身边有致仕还乡的右都御史李士实，江西省内著名的才子、安福举人刘养正为谋士，鄱阳湖盗匪凌十一、吴十三、阙廿四等人为羽翼，在朝廷里又和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吏部尚书陆完等人勾结，用银子贿赂朝中的重要人物，收取南昌左卫军马作为王府护卫，手中控制的胡匪、山贼、卫所兵和江西官军加起来，总数已近十万人，江西省的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等重要官员大半被他招揽过来，已经做好了起兵的准备，只等时机一到就要动手。

按理说，像这样一个反心毕露的藩王应该引起正德皇帝的注意才对。可当年正德皇帝登极之时，为了自己的私欲曾搞过一场大清洗，对弘治朝留下的旧臣进行了无情打击，这个狠招使得整

个朝廷元气大伤，前朝苦心培养出来的文臣班子几乎震掉。其后正德消灭了大太监刘瑾，却又起用了边军将领江彬、许泰作为新宠，而江彬等人的奸邪丝毫不输于刘瑾。

眼下的大明朝君昏臣奸，一团漆黑，朝廷中有识之士实在不多。而兵部尚书王琼就是这么一位聪明人，他早已感觉到了宁王的野心，并尽自己的力量加以防范。

这次王琼极力推荐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就是因为这位兵部尚书感觉到宁王反相渐露，这个藩王盘踞江西多年，势力庞大，羽翼丰满，很难对付，要想找到一位正直能臣去对付宁王，并不容易。加之奸贼当道，朝政日非，正直的臣子在朝堂上站不住脚，而正直能干的人几乎挑不出几个来。南昌的宁王此刻已经成了气候，他又最擅长贿赂结纳，每每以巨额金银、高官厚禄来诱惑

官员，朝野之中有很多人都被他拉下水，明里暗里替宁王说话。所以派往南赣统兵的官员必须是既顶得压力，绝不向宁王的淫威屈服，又正派可信，绝不会被宁王用金钱收买的人。

经过一番仔细权衡，王琼认为朝臣中只有王阳明才干出众、品德高尚，真正是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能臣。所以他才费尽周折一定要把王阳明派去坐镇南赣，居于赣江上游，掌握赣州卫官军，同时有权辖制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马，在兵员数量和战略态势上都占据着优势，对南昌的宁王势力加以监视。一旦宁藩有异动，王阳明就可以调集南赣属下各路兵马沿赣江而下，直接对南昌用兵。

虽然后来因时局所限，宁王叛乱之时，王阳明没能调集四省兵马，但阳明先生仍然凭着大智大勇，以手中劣势兵马击败了叛军，不负王尚书

所托。

对于举荐王阳明的功劳，王琼也很得意。宁王造反的时候，王琼就对惊慌失措的朝臣们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阳明）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

王琼对阳明先生极为信任，交给他如此重要的任务，又再四举荐，继而尽一切力量配合王阳明的工作，可以说没有王琼，就没有阳明先生的盖世奇功。同样，当王琼遇到危机的时候，王阳明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

嘉靖元年（1522），嘉靖皇帝封王阳明为新建伯，正月初十，王阳明上奏请求辞去封爵，在奏章里他先说宁王谋逆十余载，起兵之时却旬日而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却是“上天之意，₂₄₄厌乱思治，将启陛下之神圣，以中兴太平之业，

故蹶其谋而夺之魄，斯固上天之为之也”，用这一番瞎掰取悦了嘉靖皇帝之后，这才说到正题：“当时帷幄谋议之臣，则有若大学士杨廷和等，该部调度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等。”

在奏章里，王阳明提到了两位重臣的名字。第一个是大学士杨廷和，此人其实完全没有参与平定宁王的战事——甚至有传言说杨廷和长期以来一直在暗中袒护宁王，所以杨廷和本人与这场大功毫无关系，王阳明在这里提他的名字，只因为杨廷和眼下担任着首辅大学士的要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阳明的奏章里不捧他一下不行；第二个是兵部尚书王琼，他专门提到王琼和杨廷和一样，“皆有先事御备之谋，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今诸臣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

益，不惜厚着脸皮钻进正德皇帝身边的奸臣圈子，成了“豹房宠幸”中的一员。到正德驾崩，嘉靖登极，大治奸党，一时间泥沙俱下，像王琼这样的人难免遭人误解，有口难辩，再加上他又一直与首辅杨廷和不睦，此时已经遭到清算，被当成前朝奸党下了大狱，而且因“交结近侍律”被判死刑。而阳明先生在这个时候冒着天大的风险上奏，不惜拿自己刚刚得到的“新建伯”的爵位和嘉靖皇帝讨价还价，竟是在为一个判了死刑的人鸣冤。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王阳明在奏章里专门指出王琼和杨廷和“皆先事御备之谋”，显然他是生拉硬扯，非要把兵部尚书王琼和首辅大学士杨廷和拉在一起。可杨廷和是首辅，王琼却是下狱论死的罪人，王阳明在奏章中竟然把地位悬殊的这么两个人物硬扯在一起，这是要得罪杨廷和的。

事实上，把王琼打倒批臭、下狱论死的人正

是杨廷和。杨廷和厌恶王琼，首先因为王琼对豹房奸臣江彬、许泰等人巴结逢迎，这一做法让杨廷和很看不惯；其次是杨廷和虽为内阁首辅，可正德皇帝任性胡为，凡事多不与内阁商量，王琼为了维持兵部的正常运作而巴结皇帝，也就时常从皇帝那里直接取得圣旨，这么一来很多事都绕过了内阁，身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对此当然不满，可他不敢责备皇帝，就只能怨恨王琼了；最后是正德皇帝驾崩后，为了立储的事，杨廷和与王琼曾发生过争执，两人看法不一致，便成了政敌。

阳明先生能平南赣、破宁王，多亏王琼的举荐和协助，现在王琼获罪下狱，王阳明又上奏来救王琼，甚至冒着被内阁首辅当成政敌攻击的危险，在奏章中硬把杨廷和跟王琼扯到一起，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杨廷和从此把王阳明也视为政敌，对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使王阳明

赋闲多年不被重用，直到杨廷和被嘉靖皇帝罢免，情况才有所改善。

王阳明舍弃功劳爵禄，一心救护忠臣，这样の大勇气实在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诚意。

二 只是一个诚意

虽然有兵部的全力支持，王阳明终于下决心接手南赣巡抚一职，可他毕竟是个文官，从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这样一个文人被派到深山里去剿匪，实在是进退维谷，无从下手。然而王阳明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而且做得很好，很成功，究其原因，全在一个“诚”字上。

诚，是儒家极推崇的一个理念。《中庸》提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把“诚”视为天道和“成圣”之路，王阳明也十分认同。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告诫弟子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又反复强调说：“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在《赠郑德夫归省序》里，王阳明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与易牙同；目之于妍媸也，与离妻同；心之于是非也，与圣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诚切也，然后私得而蔽之，子务立其诚而已。”认为是非之心——也就是“良知”的确立，无非是“立其诚而已”。

为了强调“诚”的重要，阳明先生甚至说出了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来：“仆近时与朋友论学，²⁴⁹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

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这两句话听起来有点吓人，可当王阳明千里迢迢前往南赣剿匪时，他所要做的诚意功夫，真就是“咽喉上着刀。心髓入微处用力”了。

一个“诚意”，看起来简单明白，其实就如“良知”一样，诚意的指向也是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例如王阳明认为古人所重视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真言，是“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用如此肯定的语气将古人解释得驳杂不堪的概念简单化，把“十六字真言”归纳为一个“仁”，这也是诚意的表现。

仁，是孔子学说的精髓，王阳明把“仁”字看得极重，认为“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
250

便是仁”。在《大学问》里他提出：“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

由此推之，则“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天地万物为一体”。

阳明先生这一段话说得激情洋溢，而其中“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的内涵，正是取自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名言，是一条非常明确的“成圣路线图”，“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圣人境界了。

由这样一个“成圣”的诚意境界再推之，则是“无我”。

无我，这也是古人推崇的境界。孔孟两位哲人在这上面说出的话略有些粗率，以至于一眼看

过去会让人糊涂。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乍一看似乎是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现代人学习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这和孔子一向拿古人说事来讽刺“今人”的说法相悖。对此，王阳明倒是把孔子的思想看透了，想通了，在《书王嘉秀请益卷》里专门为孔子的话进行阐释：“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

王阳明认为，“古之学者为己”是指古人学习的目的是学习仁义良知，用来克制自己心中的私欲，而“今之学者为人”则指“今天”的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会伎俩去“陷害别人”，所谓“为人”是针对别人、算计别人的意思。王阳明对孔子学说的解释是极为精准的。

种大反思、大改过的愿望和勇气，这“改过”之勇，是阳明心学中一个非常要緊的大命题。

王阳明是有这样的大勇气的。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告诫学生：“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在《寄诸弟》一文中又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

确实，天下人没有不犯错的，大圣大贤也会犯错。为什么犯了错的圣贤仍然被世人敬仰？因为他们能知错，愿改错。能知，是大智；肯改，是大勇；大智大勇，才能成大圣大贤。身居高位，有错不改，讳疾忌医，那就不圣不贤，惹人厌恶了。正如孔夫子所说：“²⁵³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发现有错，却不改，一个错就变成了两个错。而

且后面的错比前面那个性质更严重，危害更大。

至于怎么改过？王阳明强调的是自我反省，自觉反思，以良知为明镜，自省自察。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如此告诫学生：“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王阳明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有力，但更有力度的还是他对“知错”和“改错”两个概念的区分。

王阳明认为有错不改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知有错”，另一类是“知错不改”。对于“不知有错”的人解决办法比较简单，“悔悟是去病之药”，肯悔悟，就有办法。²⁵⁴但麻烦的是那些“知错不改”的人。其中最鲜明的一个活样板就是正

德皇帝。正德皇帝知道自己有错，也知道是什么错，但他抱定主意，坚决不改！这个昏君可以把大臣们送上的奏章全部押下，不予回复，急了眼又可以一顿乱棍把臣子打死，或者一句话罢了人家的官，面对这么一个愚顽至极又独操权柄的大独裁者，怎么办呢？

在《悔斋说》中，王阳明这样讲：“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然君子之过，悔而弗改焉，又从而文（过饰非）焉，过将日入于恶。小人之恶，悔而益深巧焉，益愤谲焉，则恶极而不可解矣。”君子有错，虽然知错却不肯改，反而文过饰非，时间一长，恶习就浸入骨髓了。小人的恶行如果不肯改，还不听劝，那这种恶习将终身不得解脱……

正德皇帝是后者，其恶习终身未得解脱，以至于毁了自己，早早就死掉了。

对正德皇帝，王阳明是劝不动的，所以他下面的话不是说给正德皇帝听，而是说给其他人听的：“故悔者，善恶之分也，诚伪之关也，吉凶之机也。君子不可以频悔，小人则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也就是君子知错肯改（知错肯改才叫君子），所以用不着经常后悔。

对于那些勇于改错的人，王阳明是非常赞赏，而且大加鼓励的。他说：“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仅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这句话，正是他在南赣剿匪时行事的依据。

虽昔日为“寇盗”，²⁵⁶今日（能痛改前非）不害（百姓），为君子。王阳明正是依此把数以万计被官

府逼成盗匪的百姓感化成了“新民”，而王阳明对“新民”全部划村拨地，送给耕牛种子，让他们好好生活，真的是一视同仁，毫无歧视，更谈不到“秋后算账”，在这方面，王阳明是个好官。至于“甘心于污浊终焉”的人，也有。大盗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就是此类，对他们，王阳明“亦绝望尔”。

在王阳明的精神世界里，成仁、无我、改错，最终都以一个“诚”字来实现。于是王阳明怀着一颗诚心，抱着一腔“悔过”的诚意来到南赣九府上任。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日，王阳明到达南赣巡抚驻地江西赣州，立刻开府办公。首先做的就是拿出自己的诚意，给南赣九府的老百姓还债。

是个真正的烂摊子。这里地域广阔，山深林密，大帽山、大庾岭、九连山、八面山纵横勾连，很多地方还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由于明朝政令昏暗，土地兼并异常严重，被夺走土地的流民总数估计已达六百万！这些人到处流浪，希望寻找一块脱离官府控制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而四省交界的南赣地区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于是大量流民涌入南赣，有的就地垦荒，结寨自保，成了强人；有的窜伏深山杀人越货，成了盗匪。

到底明朝的土地兼并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一切恶果又是谁造成的？只要往紫禁城里那把龙椅上看一眼，一切就都明白了。

在弘治十六年（1503），正德皇帝登极刚满一个月，就建了七座皇庄，到他死的时候，共建了三十一座皇庄。连皇帝都公然兼并抢夺老百姓的土地，²⁵⁸其他权贵们就更不要说了。那些有势力

的藩王、贵戚们手底下养着成群的豪奴恶仆，仗着权势，纵容恶奴到处抢掠土地，明抢明夺，百姓根本无力抗拒，官府也无人敢问。

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恶性兼并，导致全国土地大量“流失”。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曾做过一次普查，当时全国官民田地共有八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可是到正德年间却只剩下四百二十三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全国在册的耕地面积一百多年间整整减少了一半！可知共有四百多万顷土地被各类权贵豪强以各种方式侵夺去了。

在中国，耕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在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被强势贵族集团霸占去了，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老百姓断了命根子。这些人有的成了贵族庄田里的佃农，有的干脆成了流民。
259
佃农“租种”贵族庄田的土地，要交租完税，而

且是人家让交多少就得交多少，稍有抗辩，不用官府的衙役军士来抓打，单是庄田里的“管庄”和他手下的无赖恶棍就能把农民关进庄田私设的牢房，或囚或打，甚至杀害。流民更惨，无房无地，无衣无食，除了儿女，无物可卖。胆小的饿死路边，胆大的落草为寇。

南赣地区地处蛮荒，四个省的流民都逃亡至此，结果荒凉的山区反而人口兴旺，到处都是刚形成的村落和新开垦的荒地。流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土地，再也不肯让人夺走，就算拼了性命也要保护它，于是到处都有强人结寨自保，对抗官府，以至南赣地区大小山寨数百成千，难以计算。其中规模最大的几股山贼有福建漳州芦溪一带的詹师富、温火烧，江西南安府境内的横水贼首谢志珊、桶冈贼首蓝天凤，²⁶⁰广东惠州府浰头一带的贼首池仲容。这几路山贼都占据绝险，经营多年，

凶悍敢战，每支山贼都有数千之众，加之互相勾结，一处被攻，处处策应，群起牵制官军，十几年间把当地搅得天翻地覆，闹得民不聊生。

王阳明一介书生，到这么一块“四不管”的穷山恶水来剿匪，实在是很难为他了。可为什么阳明先生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平定南赣九府十几年难平的“匪患”？他靠的就是诚意。

若说王阳明本人对于南赣百姓似乎并无亏欠，可通过“诚意无我”的大反思，王阳明知道自己身为一名官员，是整个官僚机构中的一份子，官僚机构犯的错他也有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推托。他认为地方治理不善，是整个朝廷的责任，是所有官员的过失。一个官员推卸责任，硬说地方恶政是“前任造成的恶果”，与他无关，然后厚着脸皮假装青天大老爷，糊弄老百姓，这就成了“过

而不改，是为过矣”，有违孔夫子的遗训了。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王阳明便怀着一颗谦卑之心来做南赣巡抚，上任伊始就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还债，也正是这份良知诚意，让王阳明透过事件的表象，看到问题的核心。

就说这南赣九府的流民吧，他们是哪里来的？都是被朝廷迫害才沦落到此的！做官的看到这些流民，应该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应该给流民下跪道歉才是，哪有脸去“剿杀”这些可怜的百姓呢？

王阳明是个有良知的官员，他知道官府欠了百姓的债，这笔债应当由他来偿还。所以他一到南赣立刻诚心实意地为百姓办起事来，首先把所有愿意接受招抚的“山贼”全部称为“新民”，用这个称呼洗去他们身上的“罪名”，然后划定村落给他们居住，划出土地给他们耕作，还发给他们耕牛、农具、种子，使他们在当地安居乐业。

由于王阳明对百姓诚心实意，安置措施又很完善到位，起到了进一步感化安抚的作用，于是更多人走出山林，接受了招抚，一座座山寨变成了村庄，成千的“山贼”扔下J1枪，拿起锄头，重新变成了老百姓。同时王阳明又成功推行了另两套措施：一是选练民兵；二是推行“十家牌法”。

“十家牌法”不是阳明先生首创的，早在宋代王安石就提出了“保甲法”，主要内容是：在乡村里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人为保正，一人为副保正。后来又让相邻农户二三十家排成一‘甲’，选一个甲头，再依托保甲制度建立一支民兵制度，对官府权力难以深入的乡村实行权力管制和暴力控制的“双轨制”，用这样的办法约束百姓，²⁶³收缴捐税，抵御盗贼。而王阳明在南赣所用的办法比王安石早先创立的

制度更完备、更妥善，最重要的是：要更人性化一些。

为了推销自己的“十家牌法”，阳明先生专门出了一个告示，其中有两段话特别有趣，即一开始提出“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摆出一副和百姓“商量”的架势，但紧接着说，“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也就是说“十家牌法”并不是和百姓们商量，而是强制推行的。

显然，在阳明先生看来，他要保护的首先是“诗书礼义之家”，然后是“良民”，即以“乡绅”为核心、以“良民”为基础组成一个民间团队，联合大多数人去打击“暴民”这个极少数群体，这和当时的社会状态、阳明先生对百姓的态度以

及“十家牌法”实际推行时所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

从细节来看，王阳明推出“十家牌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盗，而从他并未增招民兵，反而让各县三分之一的“机快打手”回乡务农这一项来看，可知阳明先生推出“十家牌法”的初衷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所以阳明先生创立的“十家牌法”和编练民兵的制度，以及他在南赣地区的剿匪工作，后来都成功了。

但阳明先生个人取得成功，并不能说明他这套制度也是成功的。

王阳明利用“十家牌法”把百姓硬性分成“良民”和“暴民”，以“良民”对抗“暴民”。当太平年景，社会矛盾被掩盖的时候，这样的状态或许还能维持得住，可一旦社会矛盾激化，“良民”²⁶⁵受到迫害，失去土地之后，就会迅速向“暴民”靠拢，

而整个社会照样会被“官逼民反”的不幸现实撕裂。

最早创立这一套制度的宋代，到宋神宗年间“保甲法”已经破产，农民们被官府盘剥得活不下去，保长们自己领头带着农民造反，“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起了个反作用。

王阳明订立“十家牌法”的时代，社会矛盾还没到彻底激化的程度，加之阳明先生才智过人，又是本着良知诚意，真心为百姓着想，所以他这套“十家牌法”成功了。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李白成、张献忠动辄聚众数十万，大败之后只剩几十人，可一旦得到喘息之机，一两年工夫又能招纳大批流民，转眼汇集成几万、几十万大军，这种时候，“十家牌法”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清朝也推行过保甲制度，但到清末就失效了；
蒋介石也曾学习王阳明的经验采用这套“保甲”

办法，但也失败了。

“十家牌法”也罢，“保甲法”也罢，它们勉强可用，但仅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三 三场败仗

虽然王阳明是来安抚百姓的，是来给南赣的百姓还债的，可安抚百姓只是一方面，当地的几股悍匪，阳明先生却是不得不剿。

王阳明是带着满心良知、一腔诚意来到南赣的，安抚百姓的工作也很到位，加之有兵部的支持，在调动广东、福建各省兵马这方面极有权威，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以及贼情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连情报工作也已经做好，²⁶⁷所以王阳明有信心打几

个胜仗。但在打仗方面他是个新手，虽然准备充分，但战斗打响之后，仍然很不顺利。

在开战之前，阳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事先获取的情报秘密逮捕了山贼安插在巡抚衙门里的眼线，一名“奸猾老吏”，并利用这个眼线破获了山贼在赣州城里的联络网，又用反间计向山贼递出假消息，声称阳明先生调集福建、广东两省的部队并不是为了剿匪，而是让他们到赣州来参加检阅，使对手毫无准备。

哄住山贼之后，王阳明立刻调集福建、广东两省官兵，命令所有人务必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也就是阳明先生开府办公的两天之后，对驻扎在长富村一带的山贼詹师富所部进行突袭。

詹师富是福建漳州芦溪人，他平时活动的重点地区就在芦溪、大伞、莲花石一带，而遇到官军进剿时，退守的巢穴则是天险象湖山、可塘洞

等地，另有箭灌的贼首温火烧与之勾结，互为倚仗。在王阳明到南赣之前，由于官军软弱无能，詹师富这一支山贼的势力大涨，从芦溪一带出来，一直深入到距漳州仅几十里的长富村一带，控制官道，逼近府城，给当地人民和过往商旅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也正因为这份骄横凶狂，詹师富这路人马成了王阳明的首选打击目标。

王阳明早已获得了关于詹师富的一切情报，又利用反问计稳住了对手，使其对官军动向毫无察觉，随即王阳明调动福建官军五千余人“各分哨路，从长富村至阔竹洋、新洋、大丰、五雷、大小峰等处与贼交锋”，展开了突然袭击。同时广东军马趁着詹师富主力前出、后方空虚的机会对他的老家芦溪、大伞、莲花石等地展开突袭，前后夹击，打算把詹师富这一路山贼阻截在长富村一带，一举消灭。

可惜王阳明也好，兵部也罢，虽然对这场首战做了充分的准备，却没有料到参战官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样。在激战中，广东官兵畏敌不前，竟被山贼从大伞方向撕开了口子突围而去，致使福建官军折损了县丞纪镛、指挥覃桓两名统兵官。

眼看山贼突围而去，广东官军追之不及，福建官军也因为损兵折将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勇气，两省官军眼睁睁看着詹师富逃进了象湖山。

王阳明身系重任，本打算一战扬威，想不到首战竟以失利告终，而且打草惊蛇，把山贼吓得退回深山绝谷死守不出，使后面的仗都变得很难打了。

最糟的是，王阳明打这场硬仗靠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福建、广东两省官军也都是趁着突袭的锋芒才敢与山贼正面较量，现在打了败仗，官军的锐气立刻泄了，先是互相推卸责任，继而又

提出象湖山是一处天险，单靠眼下的兵力无法进攻，请王阳明设法调动湖广的“土兵”来协助进剿。

所谓湖广土兵，是特指湖广省的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两处土司的兵马。这两个土司都是彭姓，同出一家，他们祖上自五代时就占据当地，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到明朝建立之初，彭姓土司受封为宣慰使，世有其地。永顺、保靖两地都在深山之中，偏僻穷苦，人多地少，当地人习武善射，凶悍好斗，只要给钱，他们很愿意担当雇佣兵的角色。湖广方面的封疆大吏就看中了他们这个特点，时常从当地招集兵马到各处作战，每有胜仗，赏赐优厚，若是战死，官府不理，当地人为了银子，也真就肯出来卖命。因为永顺、保靖两地的土司兵凶悍敢斗，杀人不眨眼，又最贪钱，只要有银子就肯拼命，南方各省的官府都看中了他们这股子蛮劲，每有什么强贼恶战，官

府往往征招土兵前往，甚至跨省征调，这些征调出来的兵员也真是厉害，什么样的恶仗都敢打，临阵勇猛，手段凶残，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平时祸害起老百姓也是出了名的，像这样军纪败坏的雇佣兵，王阳明是不肯随便调动他们的。

另外，永顺、保靖两个宣慰司都在湖广和贵州交界之处，要把永顺、保靖土兵调到福建，必须先让这两路土司兵横穿整个湖广、江西两省，这样才能转道进入福建。但这么一来要浪费半年的时间，花费大笔军饷，然而这帮土兵又是出了名的军纪败坏，让他们穿越三省千里行军，沿途一定会打家劫舍扰害百姓，所以请调湖广土兵对南赣巡抚来说是个天大的麻烦，得不偿失。

既然得不偿失，福建、广东两省将领为什么还要让王阳明去调动土兵？并不是因为两省官军兵员不足，而是官军无能，军官无耻，不敢跟山

贼面对面地打硬仗，只能跟这位新到任的南赣巡抚要赖，想拖延时间，把眼前这一仗混过去。

作为一名刚到任的巡抚，王阳明肩上的责任很重，可官军一滩烂泥，无法使用，王阳明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将计就计，借着官军避战的势头，故意放出风声，说巡抚衙门已经决定去调请湖广土兵，但因路途遥远，这些土兵估计要到秋后才能赶到，到那时候再来进攻山贼。其实阳明先生只是在麻痹对手，养精蓄锐，寻找战机，准备对象湖山的詹师富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可意外的是，他等来的不是机会，而是官军的又一场惨败。

二月初七，也就是长富村作战失利大约十天之后，一支山贼忽然从广东惠州府远道奔袭而来，无声无息地横过广东、江西两省边界，从江西全南、
273龙南、定南、安远四县之间穿过，突进江西赣州

府地界，一直开进到信丰县城附近。信丰县距离王阳明所在的赣州府有一百五十余里，其间有信丰江相连，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王阳明如果分兵来救信丰，则对于象湖山一带的围剿立刻瓦解；如果不救信丰，这座县城一旦被山贼攻破，遭到杀掠，王阳明就真是无法向上面交代了。

突袭信丰这招棋下得十分刁钻突兀，正是个“围魏救赵”的妙计，这般山贼是从广东惠州府龙川县的浰头大寨杀过来的，指挥偷袭信丰的就是广东浰头山贼的首领池仲容。

池仲容是广东惠州府浰头乡曲潭村人，匪号池大胡子，这人和他的两个兄弟池仲宁、池仲安一起占据了龙川县的上浰、中浰、下浰一带，聚集几千精兵，自号“金龙霸王”，又把自己的手下封为元帅、提督、₂₇₄总兵，以浰头为根据地攻州掠府，打家劫舍，又和詹师富、温火烧、谢志珊、

蓝天凤等人结盟，共同进退，对抗官兵。而池仲容因为头脑灵活、胆大心狠，先后带兵攻打过广东惠州府的龙川、韶州府的翁源、雄州府的始兴，最远甚至打到江西赣州府的会昌县城，纵横无忌，俨然成了各路山贼的总头领。王阳明对他的评价是：“狡诈凶悍，非比他贼，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谋，人不能测。”

为了应对池仲容的奇袭，王阳明派赣州卫的四千官兵去解信丰之围，却想不到江西军马比福建兵马素质更差，在信丰又打了一场败仗，眼看不是池仲容的对手，就瞒着王阳明暗中和山贼接触，用金银收买池仲容，请他退兵。

此时池仲容也得到消息，知道詹师富已经突围而去，自己偷袭信丰、牵制官军的计划已经实现，虽然没有攻克县城，在乡下也抢到不少财物，²⁷⁵又收了官军的一笔贿赂，心满意足，这才撤兵回

广东去了。

池仲容就这么带着手下在广东、江西两省之间轻轻松松打了个来回，两省官军不是畏敌避战，就是大败亏输，最后不得不用银子买了一个“平安”。

江西、广东、福建三省的军马就是这样的素质、这样的战力、这样的品行，王阳明这个文官出身的南赣巡抚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一连串的失败促使王阳明下定决心，编练民兵，改编官军，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眼下身背皇帝的四道圣旨和兵部衙门的几道咨文，肩负重托，可长富村首战失利，信丰一战又败，王阳明已经不能再有任何闪失，没有任何退路了。

276
经过一番思考，他觉得之前进攻长富村的

战役虽然失利，毕竟这场突袭还是达成了突然性，在长富村一共斩首四百三十二级，俘获一百四十六人，算是有一些成绩。眼前的三省官军是个真正的烂摊子，没有一支官军能打硬仗，要想把这些烂泥糊上墙，看来也只有“突袭”这个办法可用了。

既然准备突袭，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王阳明就尽一切力量掩饰自己的真实动向，以待时机。早在长富村作战失利后，王阳明就假称要请调土兵，秋后再展开攻势，以麻痹对手。现在江西官军又吃了池仲容的大亏，士气更加低落，王阳明也就趁势进一步做出“避战”的姿态，在其后的日子里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整顿民生，只是闷在巡抚衙门里不露面，故意给人造成一种昏庸无能的假象，其实王阳明一直在留心寻找战机，
277准备对詹师富展开另一次更大规模的突袭。结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阳明先生终于等来了一个天赐的好机会：新任广东布政使邵蕡上任，路过江西。

布政使是一省的总宪，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邵蕡从京城走京杭运河到杭州，再转到广东赴任，必须穿过江西省，而且一定会路经赣州、南安才能进入广东，正好从王阳明的眼皮底下经过。于是王阳明顺势把邵蕡请来，表面上是因为广东官军在长富村作战中打了败仗，拖累了福建友军，面子上不好看，想请这位新上任的布政使到军营里看看，鼓舞一下士气，其实王阳明早已设下了几重妙计。

首先，广东官军确实士气低落，新到任的广东布政使能到军营里来看望士卒，确实能鼓舞士气。但这并不是阳明先生邀请广东布政使来做客的主要目的，等邵蕡到赣州视察了军马之后，王阳明就顺水推舟，非常殷勤地提出：现在正是剿

匪的非常时期，南赣地面上局面混乱，盗匪猖獗，为了保证布政使大人的安全，王阳明决定点起一支精兵亲自护送邵蕡去广东上任，一直把他送出南赣辖区，进入广东地界为止，同时大张旗鼓地放出风声，把“官军护送广东布政使上任”的消息传得尽人皆知。

官军护送邵蕡去广东赴任，而詹师富匪帮却在福建漳州一带活动，这两个事件从表面看似乎毫无关系。但打开地图就会发现，江西赣州府、广东潮州府、福建漳州府，在地理上是连在一起的……

当然，护送广东布政使上任只是个假象，王阳明趁此机会挑选了一支精兵，从赣州出发，表面是去广东，实际上把邵蕡送出省境之后，这支军马并没返回赣州，而是立刻原地九十度转向，
279
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广东省境插入福建，直奔漳州

府，对象湖山的詹师富发起了第二轮突袭。

这一次王阳明已经知道詹师富这股山贼十分凶悍善战，而自己手下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官军都是些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提高胜算，他专门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抽调精兵一千五百人为先锋，四千二百人继后，作为攻打山寨的突击力量；同时又不惜兵力，尽力而为，命自己治下各处官军卫所、千户所、守御千户所、守备千户所……能抽调的官军一窝蜂都调了上来，从各个方面、各条道路同时对象湖山展开围攻。这么一来，象湖山一战就变成了先以精锐撕开缺口，再以人海战术淹没山贼。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阳明抽调的精兵分成三路乘夜衔枚急进，于二月十九日赶到象湖山，
280立刻连夜登山，一举夺占了象湖山的险峻隘口。

一直战到三月二十日，又集中兵力对另一处山寨箭灌发起总攻，前后大战十余次，攻破箭灌，生擒贼首温火烧。

至此，这一场突袭战终于彻底打赢了。但总结战果之后，王阳明才发现，攻破象湖山和箭灌，竟是他到南赣以来打得最大的一场“败仗”！因为王阳明来南赣以前，兵部衙门已经把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以王阳明知道官军现在消灭掉的这支土匪总人数不过四千左右，可整场战斗中，官军却砍下了七千六百多颗首级，这多出来的三千六百颗人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官军无耻！他们军纪败坏，杀人如麻，横行抢掠，杀良冒功，而且一杀就是几千人！仗打成这样，实在不能打下去了。王阳明下定决心编练民兵，抛弃已经腐烂了的官军，用当地的民兵来剿匪吧。

也在此时，王阳明请示朝廷发给他王命旗牌。

王命旗牌，是王阳明到南赣后一直想得到的一件宝贝。

所谓王命旗牌，是朝廷发给地方总督、巡抚、钦差官员的调兵信物，有时候在戏曲舞台上能看到这个东西，而实物与戏台上的道具非常相似，一般有旗四面，牌四面，旗是蓝绸子制成，牌是椴木涂以金漆，上面写着一个“令”字，平时有专门的“旗牌官”掌管。封疆大吏一旦持有王命旗牌，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马，或赏或罚，便宜行事。

前文已经说过，王阳明未必真的需要王命旗牌。但他被派到南赣的最终目的是监视宁王，而宁王手中掌握着一支精锐的大军，所以王阳明请皇帝发放王命旗牌，主要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调动几省官兵对付宁王。但南赣官军的战斗力之差出

人意料，以至于王阳明假戏真做，干脆把“王命旗帜”当成一个重要事项奏上去了。

不过在朝廷里有兵部尚书王琼替阳明先生说话，有他帮忙，请下王命旗帜，按说应该不难。

可实际上，弄到王命旗帜却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奏章送上去之后，正德皇帝只赏给王阳明二十两银子，以表彰他剿灭象湖山匪帮的功劳，职位也从巡抚南赣升为“提督南赣漳汀各处军马”，王命旗帜却没有下文。

而此时的王阳明，受到了一股邪恶力量的掣肘，那就是江西南昌府的宁王朱宸濠。

阳明先生到南赣，是来监视南昌城里宁王的动向。这一点宁王自然清楚，也感觉到了王阳明对他的威胁，所以对王阳明十分警惕。现在阳明先生上奏朝廷，想得到“王命旗帜”，²⁸³宁王在京

城的党羽就纷纷出来制造阻力，拖延时间，结果这八面王命旗帜，迟迟发不下来。

也巧，就在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二十三日，正德皇帝忽然离开京城跑到宣府巡游去了，而且走的时候特别匆忙——是带了几个亲信，背着朝廷和内阁悄悄溜出京城的，这么一来倒给兵部尚书王琼留了个机会，趁着忙乱劲儿想办法弄了一道圣旨，把王阳明申请的王命旗帜发了下来。

有了王命旗帜，阳明先生便开始准备剿灭横水、左溪、桶冈等地的山贼。就在王阳明抓紧时间练兵备战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浙江镇守太监毕真通过在京城的关系企图说动正德皇帝，把自己调到南赣来担任镇守太监，和王阳明一起工作。

浙江镇守太监住在杭州，那里山明水秀，有吃有玩，更有许多发财的机会。可调到赣州来，

肯定要吃苦受罪，打仗劳神。加之浙江是一个大省，而南赣只有九府，地盘又小，地方又穷，浙江镇守太监自愿调到南赣来工作，倒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对这件事王阳明并没有太多察觉。因为他已经得到王命旗牌，有了“便宜行事”的权力，就算朝廷派来一个监军太监，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同时，两人是真正的素不相识，加之他只是一名地方官员，镇守太监则是皇帝的亲信耳目，只对皇帝本人负责，所以皇帝要任命什么人来当镇守太监，他也管不着。当然，监军太监在作战时帮不上忙，平时却给统兵官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人不来更好。所以毕真最好不来，如果真来了，王阳明也不在意。

想不到兵部尚书王琼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立刻出来阻止，认为“兵法最忌遥制，若南

赣用兵必待谋于省城镇守，断乎不可”，动用自己在京城的势力，硬是把这个镇守太监毕真挡了回去。

此时王阳明正准备对横水、桶冈用兵，对毕真之事也没留意。直到后来宁王事败，朝廷制裁宁王党羽，在朝廷、地方上抓了很多人，这时候王阳明才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浙江镇守太监毕真竟是宁王暗中交结的一个死党！这时候所有人才明白，为什么毕真放着杭州的美差不当，非要到南赣来“跟阳明先生一起工作”，原来这竟是宁王所下的一步暗棋，想利用镇守太监的势力控制南赣兵马，将来一旦宁王造反，王阳明肯定要从南赣起兵平叛，这时毕太监就可以从旁对王阳明掣肘，甚至对他进行暗算。

幸亏这招棋被兵部尚书王琼识破，把这个宁府的爪牙挡了回去。

王命旗帜的掣肘与镇守太监毕真的“毛遂自荐”，表面看来没有丝毫联系，内中却是一场阴险的暗战。王阳明虽然精干，毕竟只是地方官员，对这件事的内情无法尽知，如果没有兵部尚书王琼的暗中协助，若真让毕太监潜伏到阳明身边来，那么当王阳明率领兵马与宁王作战时，毕真将成为埋在阳明先生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在谈起阳明先生的赫赫战功时，不能不提及兵部尚书王琼。

四 破山中贼易

横水、左溪一带的山贼谢志珊所部，桶冈山贼蓝天凤所部，是继象湖山詹师富之后在南赣地区的另两股大贼，其巢穴在江西南安府的大庚、

南康、上犹三县之间。其中左溪最为前出，横水紧接其后。

横水、左溪一带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正面有长龙、十八面隘天险，盘踞此地的谢志珊凶狠敢战，是江西群盗的总首领，占据横水已有十多年，苦心经营，共建起大小山寨几十处，占据了所有险隘要道，临山凭水，互为毗连，处处有险，寨寨有恃，互相依托，实在难以攻打。

而桶冈山寨却与左溪、横水不同。这座大寨偏处江西一角，背倚湖广省界，地势奇险，飞鸟难通，蓝天凤凶狠敢战，是个出名的亡命之徒。早前湖广方面曾经出动著名的“土兵”部队围困桶冈，攻打多次，毫无建树，各路官兵公认这桶冈是一座“铁桶”，最难攻克。

从态势上看，横水、左溪、桶冈三寨互为依托，所处之地又在江西、湖广、广东三省交界处，

就地固守足以抗击江西官军的进攻；前进，又可以突破南康县，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南雄府，或者横穿赣州府龙南县的一个狭长三角地带进入广东龙川县，和盘踞在浰头山寨的池仲容所部会合，要是这几路人马搅在一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这三路山贼占山为王时还好些，一旦流动起来，祸害更大。

横水大寨虽然难以攻打，但距离南康县城仅三十多里，王阳明对横水用兵比较容易，但桶冈却隐在深山之中，背靠湖广，偏远险固，单凭江西官军的力量恐怕难以攻克。为了攻克桶冈，王阳明只好和湖广巡抚陈金商量，请他出兵，和江西官军前后夹攻拿下桶冈，约定日期为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初一。

王阳明向湖广方面求援，想不到湖广方面故意刁难，不肯给予有效的配合。面对困境，王阳

明毫不退缩，很快就做出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把进攻横水的作战时间提前到十月二十日，先由江西军马单独对横水、左溪发起进攻，待攻克这两处山寨之后再赶到桶冈，和湖广官兵一起攻打桶冈。鉴于江西官军战斗力低下，王阳明又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此次对横水、左溪的作战以民兵为主。

在进攻横水山寨之前，为了稳住广东的池仲容，王阳明先后发布了两个告示：一是针对被安抚的“新民”下的安民告示；二是专门针对池仲容下的《告谕浰头巢贼》告示。在新民告示中，阳明先生提出“尔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训子弟，头目人等抚缉下人，俱要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无有为善而不蒙福，无有为恶而不受殃，勿以众暴寡，勿以强凌弱，尔等务兴礼义之习，永为良

善之民”，真的把这些归顺的人看作“良民”，和普通百姓平等对待，一视同仁。这一做法不但使这些人安了心，而且感化了更多的人，起到了很好的安民效果。

在给池仲容的告示中，王阳明怀着歉意说：“漳寇即平，纪验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

作为指挥作战的南赣巡抚，王阳明坦然承认官军在象湖山作战中滥杀无辜，也表达了自己心中的哀伤之情，这是很难得的。这位心学宗师真的不想害人，可战场上的事又由不得他，现在他派人来招抚池仲容，因为“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认为池仲容和他手下的山贼虽然打家劫舍，可心里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而

且愿意悔改。

这倒是阳明心学中一个著名理论：人人心中有良知。

阳明先生曾对弟子说过：“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还半开玩笑地说：“虽盗贼亦自当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这句话说得平直朴实，却非常有用。

“良知”是我们心里的定盘星、试金石，我们要经常在心里想着，嘴里念叨的。因为这两个字真的有一股强大的魔力，不管是谁，每一想起、每一念起都会心里震动，会不由自主地进行反思。

人人都有良知，再奸诈、再邪恶、再庸俗、再市侩的人，他心里都有良知。那些已经抛弃了正直，麻木了人性，在社会混成了油条的人，一万人围着他说道理也没有用，帮不了他，只有他自己心里能想起“良知”，嘴里能念叨“良知”，

这才能救自己。

人生在世，嘴里常念良知，心中常想良知，很有必要。

稳住池仲容之后，王阳明开始集中精力对付横水大贼谢志珊。在这次战斗中，不但作战主力全部改用民兵，就连统兵官也多是各府县的文职官员，在王阳明指定的十位统兵官之中，文官有七人，武官只占了三员。

文人？武夫？我们根本没必要这样去划分。一个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学业深造和自身努力成为政治家、军人、商人、科学家、艺术家……故意把文人、武夫做一个切割，人为地在文臣和武将之间划定鸿沟，制造矛盾，这只是帝王们的一种治国之术罢了。

王阳明看透了这些社会问题的症结，读懂了皇帝的权术，293当然也就不再去理会什么“文人不

能治军”的谎言，只管让文职官员领兵上阵，结果这场文官加民兵的剿匪战役如同摧枯拉朽，一口气先后打破山寨五十余处，到十五日，横水、左溪各处山寨全被攻破，被打懵了的谢志珊带着一千多人逃出横水，一路蹿进了桶冈天险。王阳明立刻亲率军马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桶冈，不顾山势奇险、土匪凶顽，于十一月初一冒着大雨发起突袭，一举攻克桶冈，匪首谢志珊被俘，蓝天凤被杀。

至此，王阳明靠着一群文职官员和一支民兵队伍，在短时间里连续打了两场不可思议的胜仗，一共攻破山寨八十余处，擒斩首领八十六名，斩获首级三千一百六十八颗，俘获则多达六千余人。从战绩来看，横水、桶冈一战攻克三处主要贼巢，一共打破八十多个寨子，²⁹⁴斩首却只有三千多，比象湖山一战的“斩获七千六百有余”少了一多半，

俘获却有六千余人，是象湖山一战（俘获两千人）的三倍。这样的战果是比较让王阳明满意的，也说明用文职官员指挥民兵作战，确实比使用那些官军要好得多。

当横水、桶冈两处山寨被消灭之后，广东山贼池仲容觉得大势已去，可他仍在迟疑观望，王阳明也知道池仲容已陷入绝境，走投无路。作为一名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他本来可以立刻布置对浰头的进攻，以获取更大的军功，可这位心学宗师一心只想着替百姓们还债，在他眼里，池仲容的人马也同样是“流民”，杀害这些人，阳明先生心里不忍，一心想把他们请下山来，让他们做个“新民”。

这又是良知。事事依凭良知的阳明先生一向就不在乎什么“军功政绩”，而是把保护百姓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虽然池仲容是个山贼，但在王

阳明看来，被逼上山的池仲容完全有可能重新变成一个好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王阳明不会抛弃池仲容。

所以王阳明没有立刻开战，反而又派人来和池仲容联系，再次劝他接受招抚；又叫已经接受了招抚并被重新安置了的山寨首领黄金巢给池仲容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阳明先生的招抚是有诚意的，希望池仲容不要再怀疑。

面对王阳明的诚意，池仲容也觉得拖不过去了，这才派自己的弟弟池仲安带了两百人下山投诚，意在试探虚实。同时池仲容又命令手下在涮头山寨修墙筑垒，加固防御，准备抵抗官军。这套两面派的手法很快被王阳明识破，但他还是决定再给池仲容一个机会，进一步向他表明招抚的诚意。于是不动声色，忽然派出官员带着酒肉去₂₉₆“慰劳”池仲容，送礼的人上了门，池仲容想阻

拦也找不到借口，这个官员就这么大模大样地走进山寨，当场拆穿了池仲容“表面归顺，暗中固防”的把戏。

把戏被揭穿了，池仲容无法可想，只好又编了一个瞎话，指责另一个已经被招抚的山寨头领卢珂与自己有仇，现在听说自己要投诚，就集中兵马，准备从背后袭击浰头山寨。

其实卢珂早已退出山寨，下山做了新民，池仲容的说法根本没有道理。可这个狡猾的山贼却很有主意，对王阳明撒谎之后，他派手下潜到卢珂居住的村子，散布谣言，说官军即将对卢珂和他的手下发起清剿。卢珂是个莽撞人，刚刚下山投诚，心里不踏实，忽然听了谣言，也没细想，就带着自己的人马离开村庄，横穿和平、龙川两县，逃回原来的山寨去了。²⁹⁷这一下把当地搅得大乱，官府、百姓惊疑不定，纷纷要求王阳明立刻发兵

去消灭卢珂。

池仲容的计谋果然厉害！可王阳明也不是傻子，没有发兵去打卢珂，而是派人去查问原因，说明情况，结果阳明的诚意感动了卢珂，带着手下又回到村子里去了。

于是王阳明和卢珂商定：请卢珂连夜悄悄出城，明天再重新进城来拜见，王阳明则当着池仲安的面“责打”卢珂，其实只是做个样子，以此向池仲容表示官府招抚的诚意。

第二天卢珂重新进赣州城来拜见，王阳明就把池仲容的弟弟池仲安请来，当着池仲安的面责打了卢珂，把他下到狱中，然后让池仲安带着手下回澜头去通知池仲容，让他不必有顾虑，尽快到赣州投诚。为了进一步打消池仲容的顾虑，王阳明甚至下令官军各回卫所，民兵各回府县，又

公开宣布：池仲容已经投降，南赣九府没有山贼了，就此把集结赣州的军马全都遣散了。

王阳明对池仲容摆出了十足的诚意，就连和卢珂一起定下计谋，也是真心实意想帮助池仲容。面对王阳明如此诚意，池仲容再也拖不过去了，就带了四十多个强悍的手下到了赣州，却又不敢进城，而是派几个人进城打探消息，亲眼看到城中兵马已全部遣散，又贿赂公差悄悄溜进大牢，果然见卢珂被关在牢里，这才放心大胆地进了城。王阳明对池仲容以礼相待，给他置办了新衣新鞋，亲自陪他在赣州城里游玩，让他看看百姓悠闲的生活，给他讲道理。可是一段时间接触下来，王阳明觉得情况还是不对。

池仲容太“精明”了，直到最后关头，他仍然不肯表示出诚意，还在拖延时间，这就使得王阳明对池仲容无法信任。加之王阳明自己也受到

了外部的压力，主要是百姓们对池仲容非常愤恨，民怨沸腾，认为王阳明一心要招抚池仲容这个出了名的山贼头目，是在“养寇”，这也使王阳明感到紧张。

群众，除非自己把眼睛闭上，否则他们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当所有老百姓都出来指责同一个人，说同样的话时，一般来说这个指责不会有错。加之王阳明到南赣任职，主要目的是防备江西的宁王造反，而宁王在江西已经招纳了华林山的山贼、鄱阳湖的水寇，加在一起有好几万人。池仲容是个凶悍的山贼，地盘就在广东、江西两省交界之处，手下众多，战斗力最强，名气又大，现在他又如此滑头，毫无诚意，王阳明不能不多想一想：池仲容一直拖延时间不肯投诚，是不是已经暗中勾结了宁王？又或者此人假装接受招抚，³⁰⁰以后又被宁王收买，在关键时刻带着人马配合宁

王一起谋反，那就糟了。

三思之后，阳明先生最终不得不下定决心，抓捕池仲容，对浰头山寨进行清剿。

但在这个时候王阳明也不由得产生了“妇人之仁”，从心里不忍对池仲容下手，就借口快过年了，一拖再拖，让池仲容过完了这个年，一直到了正月初二，才下令对池仲容动手，把他抓起来杀了，同时命令官军对浰头山寨展开围剿。此时浰头山寨没了首领，自然无法抵挡官军，一千多死硬的山贼只能且战且退，连吃败仗，一直逃进九连山，终于彻底被官军击败，剩下的人请求投降，王阳明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把他们作为“新民”安置了。

自从出兵攻打横水、³⁰¹桶冈，短短时间内，王阳明消灭了南赣地区盘踞多年的几股悍匪，赢得

百姓爱戴。史称“班师之时，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刚时拜祝”。王阳明自己对于战功却视如草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牧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阳明的这句名言，既可用来形容儒家特别推崇的“克己”，又可视为其以学说救天下的决心。

为南赣百姓破“山中贼”，还不是阳明先生最关注的；为天下人破“心中贼”，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与追求。于是在王阳明回赣州讲学之后，一场心学与理学之间的论战，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五 心学与理学的论争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到正德十三年春天，南赣剿匪任务全部完成，王阳明本想退休，从此一心讲学，可正德皇帝却仍然不肯让阳明先生退休，而是把他升任右副都御史。同时兵部尚书王琼也来了密信，指出宁王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请阳明先生仍然留在南赣执掌兵权，以免江西省内发生意外。

王琼出来阻拦，说的道理又很充分，阳明先生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留在赣州。好在讲学这件事在哪里都能办，阳明先生就凑了几个钱，忙里偷闲把赣州城里的濂溪书院随便整修了一下，在这里讲起学来，一时弟子云集，盛况空前。

这一年，阳明先生在³⁰赣州做了两件大事：刻

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同年八月，弟子薛侃刻印了阳明先生的讲课笔记《传习录》。

《朱子晚年定论》被刻印出版，标志着阳明先生已经打通朱陆，直追孔孟，把理学、心学融为一炉，自成一家，完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传习录》的问世，则标志着“阳明心学”正式诞生了。

《传习录》这本书是由阳明先生的弟子们记录他平时的课堂讲义和书信摘录，可称为传世名著。书名的“传习”两个字取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但有趣的是，截取曾子这段话为书名，却意外地凸显出了“忠”字的本意。因为“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其中提到的“忠”字只能解释成“敬业”。³⁰⁴而敬业，也正是“忠”的本意。

以“传习”为书名，表面看来是“老师传授的东西我学习了吗”，与《传习录》的内容倒很相配，可深层的意思似乎就是为了引人关注这个“忠”字，而对“忠”字的释义，又与阳明心学强调“自我价值”的学术特点暗合。至于是有意为之，还是仅为巧合，这倒不好下断言了。

《大学》是四书之首，也是阳明先生最推崇的儒学经典，所以王阳明刻印《大学》毫不奇怪。阳明先生讲学多年，成绩斐然，他的弟子们推出《传习录》这么一本课堂笔记，也不奇怪。可《朱子晚年定论》是一本什么书？阳明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奇怪的书，又把它刻印出来让天下人都看到呢？

《朱子晚年定论》确实是一本怪书，表面看似是阳明先生收集了朱熹和友人的部分信件或谈话资料编辑而成的一本小册子，在书的开篇就写

着“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薮，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已误人”，借着朱熹的嘴批朱熹，说他“误已误人”。后面“答陆象山”一节又有“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的话，借朱熹的嘴批理学，认为理学有“支离”的缺陷。

阳明先生把朱熹的话断章取义拿出来解释，牵强附会，难以服众，后人对《朱子晚年定论》也不接受，清朝大儒顾炎武就骂阳明先生“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枉朱子，诳误后学之深”，虽然这样责备是过分了些，但“矫枉朱子”这四个字说得倒对。

其实《朱子晚年定论》是一本穷凑合的书，勉强写成，内容并不怎么精彩，但内里却是阳明先生的一番苦心。他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这样说：“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然，中间年岁早

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自己也承认这本书的内容多是拼凑出来的。而对于后世人因为《朱子晚年定论》这本书而骂阳明先生，说他滑头，在学术上搞宗派，说他诋毁别人抬高自己……阳明先生已先料到此结果，特意引《诗经》中的名句送给这些后生们：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意思也就是懂我的人知道我是心忧天下，不懂我的人，会说我是阴谋诡计、个人目的、学术宗派，而我王阳明无话可辩，只是任他们说去。

王阳明硬编出一本《朱子晚年定论》，其目的是要打破理学的学术垄断，希望引发一场争论，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如他所说：“夫道，307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

也！”

道理，不在天子的嘴里，而是公道，是人民的意志。思想，不是“朱子之学”、“孔子之学”、“阳明子之学”或者其他“某某之学”，而是公学。这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资格来参加这场哲学大辩论。只要我们还活着，还在思考，每一个公民都应强化良知，投身公道，参与“公学”，千万不要置身事外。因为置身事外者，必被别人愚弄。

到底“理学”错在何处，以至于王阳明要以一部《朱子晚年定论》向理学宣战呢？这里就要说一说朱熹老夫子了。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又称考亭先生，是南宋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尤其以《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最出名。³⁰⁸而所谓“四书”，即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

部儒学经典。其中《大学》一篇被朱熹格外重视，认为它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大学》里有这么一段话：“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对这段话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古人为学次第”，把古人“成圣”的过程比喻成一个台阶，必须依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次序一级级攀登上去，才能达到成功。

为了印证自己的思想，朱熹又专门作了一篇《格致补传》，其中有一句名言：“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309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朱熹这段话被后世学子们引为教典，而其中“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一句，则可谓触目惊心。朱熹竟是要求学子们要让读书人把全天下所有的“理”都弄明白，达到“至乎其极”，到这时就能“豁然贯通”，从而达成“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

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朱熹又对“知”和“行”这一对概念做了与众不同的阐述。

知与行，这是古代学子特别重视的一对概念。在《尚书》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认为“知行”并举，而行比知更艰难些。之后子乙子、墨子、荀子诸家都对“知行”问题做了探讨，大抵认为知行并重。

310

可朱熹却偏偏另辟蹊径，提出了“知先行后”

的新理论，使“知”与“行”的关系有了明确的先后、高下之分：“知”高于“行”：“知”重于“行”。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天下的事物多到无穷，道理也多到无穷，这世上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如此一来，朱熹实际上用他的学说，堵塞了天下读书人的“成圣”之路。

因为儒家学说出来了一对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儒生们眼里看着“圣人”，耳朵听着“圣人”，嘴里读着“圣人”，心里想着“圣人”，似乎圣人境界就在不远处。可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使他们永远不可能接近圣人境界，更不要说达成这一境界了。

有没有圣人？有！读书人做不做得到？做不到！

于是“圣人”成了幌子，成了“彼岸世界”，

而儒家学说也就此变成了一种宗教，我们可以称之为“儒教”。好端端一个儒学被后人搞成“儒教”，圣人也一变而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佛”，岂不可悲？

这就是王阳明对朱子理学的指责：支离。

正是针对理学这种“支离”的毛病，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并说出了一段极有魄力的话：“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

“惟务求仁”，这是阳明心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四个字使得儒学绕过了“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学术悬崖，重新回到了孔孟时代，也回到了儒家学说的本源。

对于圣人境界，孔子说得很清楚：圣人境界

是人人都可以达成的，只要做到“仁者，爱人”。在《论语·雍也》里，他也明确说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话，而且按孔子的说法，这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能做到这个境界就已经达成“圣人”境界了，连尧、舜、禹这些传说中的“圣王”都不在话下。

孔子对圣人境界早已给出了如此清晰的界定，循着他的话头儿，回过头来再看《大学》里这段被朱熹称为“为学次第”的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说来说去，无非是在说“爱人”、“立人”、“达人”而已。

对孔子的思想王阳明理解得最透彻，在《答季明德书》一篇中，他说：“若仁（即王阳明）³¹³之不肖，亦常陷溺于其间者几年，伥伥然自以为

是矣。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他毫不客气地指责那套“理学洗脑术”是“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王阳明指责理学这套“为学次第”的骗人把戏，是因为他自己就曾深受其害。

王阳明从小就是个心怀大志的人，十二岁时就对私塾里的老师说，读书考科举不是第一等事，只有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虽然这只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孩子话，可这话也真是难得。

十七岁这一年，王阳明到南昌迎娶夫人，回程中拜访了江西大儒娄谅。交谈中，娄谅的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大大地刺激了王阳明，于是回家后不久，很快就闹出了一桩荒唐的公案：“与友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格去看，友格了三日，便劳神致疾，某说他精力不足，314

因自生穷格，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流传很广，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因为“格竹”的结果是王阳明和小伙伴“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

“圣贤是做不得的”，这正是统治者借着“朱子理学”给天下读书人挖下的陷阱。年轻的王阳明也曾深陷其中。

《大学》中“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一句，按朱熹的解释是：要想意志坚定，就必须知识丰富，这个解释显然不通。可按王阳明的解读，“欲诚其意先致其知”的“知”就是良知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要想意志坚定，必先肯定自己的做法合于良知”，这个解释非常通顺，毫无争议。

既然已经看出理学“包藏祸机”，王阳明当然要将学术引向正路，于是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来与理学对抗。但当时的学子们已经被旧的学说洗脑，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抱怀疑的态度，包括王阳明的弟子徐爱都曾提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的，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的疑问。

对此，王阳明的回答非常有力，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并进一步对徐爱解释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回答了徐爱的问题还不够，王阳明又举出更明确的例子：“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几句话说服了徐爱，并被记录在《传习录》

里。

徐爱虽然对“知行合一”有疑问，毕竟容易说服。可在当时，拿“知行分明是两件事”来质问王阳明的又岂止一个徐爱？各种各样的质疑、解释，一问一答，在《王阳明全集》里随处可见，其所提的问题在现代人看来真是荒唐可笑，甚而无聊。可在当时向王阳明提问甚至发难的，无一不是大学者，这些大学者都被理学的“格物穷理”思路紧紧缠住不能脱身，无法理解“知行合一”，无法明白“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真是让人既惊讶又伤感。由此可知在王阳明的时代，这位心学宗师想要用“良知”唤醒世人，是多么迫切，又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在与理学的辩论中，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始终没有占到上风。不是因为他的学说论据不足，而是因为质疑的人太多，力量太大，太强横了。到

最后，皇权发威，干脆把阳明心学禁止了，涂改了，又把它歪曲成了“禅”，解读成了“归寂”，成了“主静”，剖析成了“现成良知”、“知解良知”、“本体良知”、“发用良知”、“本然良知”……种种样样，却没有一个是阳明的原貌。

也不稀奇，当年孔子的思想也曾被后世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成了一道骗人的幌子。王阳明的遭遇，不过是孔子遭遇的重演罢了。

王阳明是个像孔子、孟子一样的勇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路向前突进。在提出“知行合一”之后，他用了十多年时间苦苦探索，又提出了更高级的“致良知”理念，既而说出了那句“满街都是圣人”的大道理。³¹⁸至此，王阳明这位心学宗师已经突破了统治者设下的思想樊笼，

打开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哲学大道。

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道理明白，未必就站得住脚。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阳明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荆棘路。当他的思想突破“愚忠”之时，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将遭到来自朝廷的摧残。

王阳明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刻，也由此开始了。

破心中贼，和皇权搏斗

一 宸濠之乱

正德十四年（1519），南昌的宁王朱宸濠造反了。

宁王朱宸濠是大明朝头等的藩王，世镇南昌，手里掌握着王府卫队，这是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部队，另外朱宸濠在江西经营多年，招纳了大批山贼胡匪，其中尤以凌十一、吴十三、闵甘四所率的鄱阳湖水贼最为凶悍。在朝廷中，宁王靠着无法计数的巨额贿赂了大批重臣；在地方上，他控制了江西布政使、按察使³²⁰、兵马都司、镇守太监，

又拿出大笔金钱，在全国各地拉拢了无数地方官员，培植了庞大的势力，万事俱备，只等造反。

对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强敌，正德皇帝居然毫无察觉，直到正德十四年，监察御史萧淮上奏告发宁王谋反，正德皇帝才起了疑心，派大臣到南昌斥责宁王，收缴王府卫队。可这一下正捅在马蜂窝上，宁王立即趁势起兵，借着过生日的机会遍请江西各级官员，连南赣巡抚治下的知府、将领也在被宴请之列。

当然，宁王还顺便“邀请”了王阳明。

王阳明被派到南赣来督兵，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来监视宁王，对这个野心勃勃的藩王他早有警觉。可他无法猜出宁王到底何时造反，尤其是朝廷派官员来收缴宁府护卫的事，王阳明事先并不知情。而宁王是江西省内最尊贵的藩王，只要他一天不造反，王阳明必须对他表示出特别的尊敬。

很不巧的是，就在宁王准备起兵的同时，福建军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哗变，朝廷派阳明先生去镇压。阳明先生正要出发的时候，接到了宁王生日宴会的邀请。

本来王阳明从赣州进福建就不需要走南昌，但宁王势力太大，他的面子王阳明不得不给，只好坐了条船顺赣江而下，绕个大弯子到南昌来给宁王贺寿，却因为江上有大风耽搁了几天，等王阳明的官船快到南昌的时候被丰城县令拦住，告诉他：宁王已经杀害了江西巡抚孙燧和按察副使许逵，起兵谋反了！

王阳明听后大吃一惊，连忙乘船返回赣州，准备调集兵马起兵平叛，可赣州在赣江上游，去南昌是顺风顺水，回程却是逆风顶水，而宁王也已经派出快船从后面追赶上来了，情势异常危急，
322王阳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安然回抵赣州了，只好

提前下船进入临江府躲避，这么一来情况就更糟了。

阳明先生此时担任的职务是“提督南赣兵马”，他的指挥部设在赣州城里，可现在阳明先生却在紧邻南昌府的临江府下了船，离自己的指挥部太远了，赣州方面因为接不到有效的指令，无法以最快速度招集兵马，尤其是广东、福建两省都与赣州府地界相连，原本王阳明靠着手中的王命旗牌是可以调集这两省官军的，但现在他人在临江府——江西省的中心地带，距广东、福建、湖广都太远，阳明想调广东、福建兵马，也就显得鞭长莫及了。

在后面的平叛战斗中，曾经在南赣剿匪时和阳明先生并肩战斗的广东、福建两省官军、民兵都没能参战，甚至连江西南安府的民兵也因为距离远，³²³没能调集。可以说阳明先生在临江府上岸

这个决定实属无奈，严重影响了他调配兵马的能力，结果在后来的作战中，王阳明招集的部队仅有三万左右，面对宁王的十万大军处于绝对劣势，在兵力和装备方面远不能和宁王的人马相比。

比这更可怕的是，宁王这次起兵非常突然，他的战略意图是以最快速度沿江东进攻克南京，然后建都称帝，和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由于宁王造反初期王阳明被阻在临江，导致了南赣九府兵马不能迅速集结，整个江西省内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支成建制的军队开上来阻击宁王，这就给宁王腾出了长达半个月的空子，他完全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放手向南京方面发起攻势，如果宁王利用这个空当不顾一切全力东进，很快就会突破长江下游的九江、南康、安庆诸处防线。

最糟糕的是，宁王经营多年，爪牙遍布各地，
324
现在南京城里就有镇守太监刘娘，都指挥廖鹏、

齐佐、王准，都督同知王献等一千多名亲信，备好J1枪火器，准备做宁王的内应。同时，前文提过的浙江镇守太监毕真也在杭州制造谣言，说宁王大军要攻浙江，弄得浙江一省风声鹤唳，浙江军马不敢出省境一步。

最要命的是，连河南布政使林正茂也已归附了叛军，只等宁王占领南京，建都称帝，林正茂就夺取河南一省的军政大权，响应宁王。

如果宁王真的杀进南京，那整个南直隶（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外加一个上海）以及浙江、河南、江西几个省就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加之正德皇帝昏庸，道德败坏，百姓对他恨之人骨，官员也多对他失去了信心，天下都在盛传正德皇帝其实是个“野种”，根本不是孝宗皇帝所生，而朱宸濠却是太祖高皇帝的嫡传子孙，身份无可怀疑。如果宁王真的攻克南京，建都称帝，振臂一呼，
325

恐怕江南半壁江山都会被他席卷而下！

这样一来，整个中国就分裂成南北两半了，将来不管谁胜谁败，这场叛乱必将旷日持久，给天下百姓造成危害也无法估量。

危机，危机，危难之中一定暗藏机会，只要肯找、会找，就一定能找到。

自我觉醒，良知透彻，使得阳明先生拥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异于常人的思维模式，面对几乎绝望的危局，阳明先生脑子飞快地运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了一系列的奇谋妙计：先派出细作潜入南昌，到处粘贴告示，声称朝廷已经知道了宁王起兵的消息，并且派安边伯许泰率宣府、大同兵马四万，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刘晖、右都督桂勇率京军四万赴江西平叛；又派人到南昌邻近各县发布消息，声称巡抚两广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

杨旦、巡抚湖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金各率本省军马四万即日进入江西省境，沿途设伏，南赣兵马两万人已经完成集结，随时准备向南昌进发；又发下一批假造的“火牌”——由驿站传递的加急军报，假称是广东、湖广两省巡抚发下来的，因为大军将至，命江西各府县急征军粮，接着就派人到乡下大张旗鼓去“征调军粮”，把朝廷大军即将到达的消息传得尽人皆知；再派人潜入南昌放出消息，说宁王手下的谋士、重要官员甚至追随宁王的强盗凌十一、吴十三等人都有密信给王阳明，准备背叛宁王，向官军投诚；随后命人抄写了大量的“免死牌”——也就是现在说的传单，到南昌城里到处散发，告诉叛军士卒，只要持“免死牌”来降，即可免罪。几天之内发放这些传单多达数万份，用尽一切办法扰乱对手的军心。

把这个“疑兵计”用得不亦乐乎，身边的人都有些疑惑，问他：“先生觉得宁王会相信吗？”

王阳明回答：“我不用他信，只要他疑。”

结果阳明先生的“疑兵之计”真的把宁王给唬住了。从六月十四日到六月三十日，半个月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宁王一直困坐南昌，没有向安庆方面派出一兵一卒。

也就是这半个月的拖延，彻底改变了江西省内的战场形式。

扼守长江咽喉的安庆要塞在宁王谋反时几乎毫无准备，可半个月时间里，安庆的守军已经做好了迎敌的准备，朝廷也得到了宁王造反的准确消息，正德皇帝立刻调集京军边军，准备南下平叛。同时，王阳明也利用这段空隙，离开临江去了吉安府，尽一切力量搜集起三万兵马，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各县的民兵。

王阳明有了兵马，可兵力却不到宁王的一半，最糟的是，这些民兵都是被临时召集的，粮草不足，器械也比较简陋，尤其缺少战船和火炮。如果宁王的叛军主力待在南昌，王阳明没有力量对之发起进攻；若叛军沿江东下进攻安庆、南京，王阳明又无力进入章江去阻截或追击叛军。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阳明先生使出第二个妙计：利用宁王急于东进的心态，干脆下令各府县的官军、民兵部队暂时不要到吉安来集结，装出一副无兵可用的样子，让宁王误以为无后顾之忧，“鼓励”叛军放心大胆地全力攻打安庆、南京，把南昌城里的兵马抽调得越单薄越好。等宁王大军沿江而下，王阳明就带着他的三万人马衔尾而进，以最快的速度攻克宁王的老巢南昌，从背后形成压力，迫使宁王回师来救南昌，然后以逸待劳，在城下和宁王决战。

王阳明计谋一出，宁王果然上当，以为阳明先生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于是准备一鼓作气突破安庆，沿江而下直取南京。为了尽快攻克南京，宁王毫不犹豫地把南昌守军抽调一空，仅留下大约一万兵力驻守。七月初一，南昌的叛军以凌十一所部鄱阳湖水盗一万人为先锋，沿江而下向安庆进发；第二天，宁王朱宸濠亲率大军两万随后出发，之后宁王部下的另外三万大军也分批开出南昌，倾巢而出扑向安庆。

这些日子驻扎在吉安府的王阳明一直在监视着南昌方面叛军的动向，现在宁王一出动，王阳明立刻得到了消息，按照预先的部署，立刻命他手下的三万兵马各自出发，赶到临江府和南昌府交界处的樟树镇会合，定于七月二十日对南昌发起突袭。此时王阳明又生奇计，派大批人手潜入南昌，³³⁰到处张贴告示，投放“免死牌”，声称朝

廷“二十万大军”已经逼近南昌，借此在叛军中制造混乱。

王阳明的计策十分巧妙，由于前段时间他一直派人到南昌城里张贴告示，投放“免死牌”，而告示上的内容已经被证实都是假的，所以现在他再派人来搞这一套，叛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了。可是当王阳明率领三万兵马在清晨大雾之中突然攻城的时候，叛军摸不清对手的虚实，惊恐之下，立刻就会想起告示上写的“二十万大军”，结果防守南昌的一万叛军军心大乱，面对仅有三万人的攻城部队，他们甚至连一个时辰都没有守住，王阳明在转眼之间就攻克了叛军重兵布防的南昌城。

南昌被一鼓而克，王阳明也很喜悦，但这几年剿匪生涯他看到了太多残忍的事，所以眼下阳明先生异常清醒，既没有庆祝，也不肯纵容，而

是立刻带着人手进了南昌城，布置官员四城盘查，督促官兵百姓救火，严厉捉拿趁火打劫的官军，很快就抓了几百人，情节最恶劣的当场斩杀，其他的则当众责打了一顿军棍，这才控制住了进城的官军和民兵，把官兵破城后对城中百姓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在古代有个“惯例”，每次攻破城池之后，杀进城的一方会到处抢劫，而得胜一方的将领往往对此不加约束，有时候，这种抢劫会恶化到“屠城”的程度，比如清朝的名臣曾国藩，他的湘军就以抢劫出名。但阳明先生是一位以“良知”指引自我意识的心学宗师，在他眼里，百姓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攻破南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约束部下，严禁抢掠。为此，阳明先生甚至杀了几个人。

官军、民兵会不会恨他？

不会。

王阳明认为，人心里的良知永远不会失去，这世上每个人都愿意做个好人，连那些最坏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做坏事，只是因为忽略了良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一边做着坏事，一边却又哀叹“社会风气变坏了”……似乎不知道自己就是社会风气变坏的源头，让人觉得挺奇怪。其实这就是人心里的良知一闪一灭造成的奇怪现象。

良知一闪光，这个人就会哀叹“社会风气坏了，照这样发展下去，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可良知一泯灭，他自己却又无所顾忌地做起恶来。良知闪光，是因为良知永远在人心里，而良知泯灭，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堆积的尘土太厚了，把良知遮住了。

阳明先生说过，良知，是人心里的一面镜子，能照出人的本来面目，让做坏事的人感到羞耻。有些人以为自己渐渐失去良知，其实良知不会失去，只是他们的心镜蒙上了尘土，只要把尘土擦去，镜子便明亮如初了。

阳明先生对良知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就说现在杀进南昌城的这些军人，不管他们是官军也好，民兵也罢，本来都是百姓，这些人虽然粗野，虽然趁火打劫，那只是因为身边的军丁将领都在做坏事，没有人给他们做出正确的表率，他们心里的镜子脏了，看不到丑恶了，就都学着别人做起坏事来。

现在阳明先生亲自出来整顿军纪，用自己的良知给部下做了表率，擦亮了他们的心镜，指出抢掠行为的恶劣，334这些兵士们立刻明白过来，自动停止了抢劫。为此，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埋怨，

反而更加拥戴阳明先生，在后面的作战中表现得更出色了。

在阳明先生眼中，世上最重要的不是皇帝，而是百姓；治军最要紧的不是战功，而是军纪，这是他身上真正的过人之处。后世的名臣曾国藩也是儒生带兵，从保甲法、练民兵、用儒生统兵以至军旅的编制训练，处处学习王阳明，偏就在这“不重军功重军纪”上，曾国藩没学到阳明先生的精彩处，结果练出的湘军虽然十分精锐，敢打硬仗，可官兵却毫无良知，邪恶腐败，臭名昭著，难以立足，当战争结束之后，曾国藩只好把亲手练出来的部队解散了事。曾国藩没学到阳明先生带兵的精髓。

二 阳明战术，片面式分析法

阳明先生是一位儒学宗师，用兵打仗本非其所长，但王阳明在南赣剿匪和迎击宁王叛军时却表现出了超人的军事“天才”，以至被后人引为奇谈。其实王阳明的战术战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在分析战局时总是采用一种十分高明的“片面式分析法”，强调把自己一方摆在主动的位置上，一切布置以“我”为主，这种精妙的思维方式就是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绝不被对手牵制，而且以自己的快速节奏驱使对手在不自觉中被调动、被控制、被消灭。在战术上，王阳明特别注重进攻，而不重防守，擅长快速突袭、长途奔袭，胆子大，着眼准，计划从制订到实施的周期极短，效率奇高，永远把自己摆在“攻击者”的位置上，

永远在战局中争取主动。

王阳明总结出的这一套军事理论，与其“心学”思想中“知行合一”的理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知行合一”是一种最注意效率的哲学理念，特别强调思考和行动密不可分，所以王阳明的整体思路异常紧凑，思考中产生了可行的新点子，就会立刻付诸行动，效率极高。这种高效率，使得王阳明的所有对手都跟不上他的节奏，于是莫名其妙地陷于被动，被王阳明所制。

面对王阳明，宁王的叛军不管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实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但王阳明在战术应用上的快节奏彻底打乱了宁王的阵脚，迫使宁王忽略了自己手中的优势，而是一味跟着阳明先生的节奏被动地思考，盲目地调动兵力。

经围攻安庆多日，眼看安庆指日可破，叛军即将顺江而下直趋南京，此时突然接到消息：南昌已失！宁王一下慌了手脚，混乱中来不及深思，就不顾一切从安庆一路退回南昌。如此一来，南京方面的危机缓解了，可对王阳明来说，他所面对的战局变得异常危急。

宁王朱宸濠手下有六万精兵，战船数千艘，兵精器利，训练有素，而且他的战船上还配有先进的佛狼机炮，这些火炮是刚刚从西洋人手里获取图纸制造出来的，说它是炮，不如说是一枝巨型火枪，前有准星，后有照门，可以精确瞄准，而且这种火炮是用“子铳”后膛装填的，在炮尾开了一个槽，正好可以放入一支预先装好火药和弹丸的“子铳”，然后插上堵头，安上引信，立刻就可以施放，射速之快远非普通火炮可比，是一种最适合水战的精锐武器。这样的火器，王阳

明和他的手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相对于宁王的兵精器利，王阳明的部下却多数都是民兵，没有合适的战船，更缺少火器，只能架着打鱼的小船和宁王的艨艟战舰交手，用弓箭、火铳和土制的燃烧瓶同宁王拼命，这场战斗对王阳明来说，真是个难以应付的挑战。所以按常理王阳明应该集中兵力死守南昌，凭他的三万人，对付宁王六万人，守上几个月也不成问题，只要守得住，湖广、福建的兵马很快就会赶到。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求稳，先守住南昌，再伺机而动。可在惯于“以我为主”的阳明先生看来，战场的态势完全不是这样。于是王阳明又使用那套精妙“片面式分析法”，对整个战局做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评估。

如果宁王置南昌于不顾，攻克安庆直扑南京，
339
那他就成了气候。可现在这一回师，等于彻底失

去了宝贵的时间，即使他能收复南昌，也必然无力再攻南京。何况附近湖广、福建各路兵马正在集结，朝廷也已得知了宁王造反的消息，必然派京军来平叛，南京方面得到消息后也会整固城防，宁王再想冲出江西，已经不可能了。不能冲出江西，宁王的反叛还有什么意义？换言之，不论宁王攻南昌能否得手，在从安庆撤军的那一刻，宁王的叛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宁王的军马虽然兵精器利，但其实早已失去了斗志。

相反，王阳明的三万大军刚刚攻克南昌，兵锋正盛，以逸待劳；宁王的六万人马前不能克安庆，后已失根本，战略态势上处于劣势，加之在安庆苦战数日，又仓促回兵，往返奔波，疲惫不堪，这么算起来，战略、³⁴⁰战术两方面的优势都在阳明先生手中，所以根本不必守城，反而应该借劲卒

锐气，击丧胆之师，采取主动攻势，反而胜算更大。

经过一番慎密的分析，阳明先生从战略态势上已经彻底压倒了宁王，下面就是和宁王展开最后的决战了。

七月二十三日，宁王的前锋部队已经沿章江而上，开进到离南昌七十里的樵舍，依他们的行进速度，大约第二天就会对南昌发起进攻。但依王阳明的用兵之道，是不会坐等着宁王率先发起进攻的。为争先手，王阳明命令自己手下的四位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各带五百兵由黄家渡口上船，打算趁夜顺江而下，偷袭樵舍的叛军前锋，打个胜仗，先声夺人。却想不到，这一次宁王方面也做出了完全相同的部署。

宁王身边也有精干的谋士，到达樵舍之后，
341这些人也劝宁王来争先手，于是叛军也派了一支

精兵乘着黑夜摸了过来，从黄家渡登岸，准备偷袭南昌守军。结果两支精兵在黄家渡遭遇，黑夜之中一场混战。宁王兵多，又是先到渡口，已经登岸，伍文定等人本来准备登船去偷袭宁王，却在渡口和叛军遭遇，摸不清对手的虚实，难免心慌，终于被宁王击败，撤回南昌，宁王的部队也因为摸不清情况，不敢深入，登船退回樵舍去了。

黄家渡这一场遭遇战，是王阳明和宁王作战中唯一的失利，损失倒不大，而且两支部队都因为摸不清对方的虚实而退却了，只是王阳明的部队退回了三十里外的南昌，而宁王的人马却退回了七十里外的樵舍，所以对一般的将领来说，黄家渡遭遇战根本算不上失败，可以忽略不计。

可王阳明却非常重视这次失利。

阳明先生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知道己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处于劣势，又准备冲出城池，用劣势

兵力主动向宁王发起进攻，这时候部队的士气特别重要。加上他手下统兵的多是文官，虽然打起仗来并不比专业的武将差，毕竟这些人信心还是不足，现在虽然只是个小败仗，但自己最倚重的这四位知府却都参与了战斗，如果他们因此信心受挫，后面的仗怕是不好打了。

在战场上，军人的士气主要有三种：一是正气，二是锐气，三是怒气。

正气，就是在心里坚定地相信自己是正义之师，在战场上的拼搏是有崇高意义的，是非常值得的，这股气是一支军队最强的士气。现在王阳明的部队在“平叛”，一直占着这股正气；原本攻下南昌后，王阳明的部下锐气正盛，而这次黄家渡小败，挫掉了一点点……

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这在军事上有个专用名词叫“激将法”。现在王阳明准备调动“正气”和“怒气”，重新唤起他手下刚刚失去的锐气。

早在部队退回南昌之前王阳明已经获知战败的消息，并且做好了一番布置，现在四位出战的知府领着部队撤回来了，王阳明没有一句慰问，而是大发脾气，声言要把这四个人推出去杀头。

当然，阳明先生并不是真要杀人，四位知府也罪不至死，没理由杀他们，阳明先生这样说只是刺激他们，然后又对这几个人讲了一番大道理，指出江西平叛的“正义性”，把“忠义”二字着重强调。

其实王阳明自己并不认同“忠义”这个概念，他认同的是“仁义”。但在这几个知府面前，只有说“忠义”他们才能明白，阳明先生只好先这么凑合着了。

果然，被王阳明一通责备，激起了这几个知府的火气，而阳明先生讲的大道理又激发了他们胸中的“正气”，于是以伍文定为首纷纷请战，眼看知府们恢复了勇气，阳明先生也就原谅了他们，仍让这几个人带兵去打头阵。

二十四日一早，宁王亲率大军赶到黄家渡，打头阵的是凌十一的鄱阳湖水盗。这些人精于水战，却比较鲁莽，加之前一晚遭遇战的胜利助长了他们的骄气，果然中了王阳明的诱敌之计，一鼓劲追着做诱饵的小船不放，使得宁王舰队前锋和中军之间出现了几里宽的缺口，随着王阳明一声令下，伏兵齐起，驾着小船冲进宁王战舰的空隙，到处放火，叛军顿时大乱，前后不能相顾，两千余人被斩，落水而死的超过万人。宁王毫无战斗经验，眼看打了败仗急忙回身就跑，带着残部一路退回了樵舍。

黄家渡一场惨败，彻底动摇了叛军的军心。

当天夜里，大批叛军士兵扔下战舰兵器偷偷上岸逃走了，等宁王发现情况不对派人来制止时，已有一万人逃得无影无踪。

白天的战斗损失了上万兵力，现在又有上万人逃走，宁王的六万精锐转眼折损了一小半，连唯一的兵力优势也不复存在了。无奈之下，宁王孤注一掷，放弃了被占领的九江、南康，把能调集的兵力全部调了上来，把自己历年积累的金银全都搬了出来，当场赏给手下士卒，凡追随宁王的每人赏十两，受伤的赏百两，明天决战之时愿做敢死之士的，赏银千两！

这是朱宸濠败亡之前的疯狂，这股力量很危险，但并不可怕。就像一个吹涨了的气球，看起来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只要在要害上轻轻一戳，一切假象就都破灭了。

二十五日一早，困兽一样的叛军冲出樵舍，得了重赏的敢死队冲在最前面，以大船为先锋，用佛狼机炮开路，不惜一切代价向前猛扑，王阳明也率领船队出黄家渡迎战叛军，两军在章江上展开了一场决死的较量。由于宁王战船巨大，火炮威猛，加之风势不顺，王阳明手下的官军接敌之时受了挫折，损失不小，纷纷后退，亲自督战的阳明先生赶紧下令斩杀当先败退的兵士，阻止军卒后退。在黄家渡遭遇战中吃了败仗的伍文定也发起狠来，亲自指挥坐船向前突击，叛军的铳炮把他的坐船打着了火，伍文定脸上的胡子都烧掉了，却仍然死战不退。

正在双方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候，忽然间，王阳明的帅船上挂起了一块白布，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

精于“片面式分析法”的王阳明早就把自己和宁王双方的战略态势分析透了，虽然他不会用“气球”来比喻宁王，可心里却知道，叛军只是表面凶狠，内心里却十分胆怯，只要在他们的要害上一戳，立时就会垮掉。

宁王的要害，就是这支凶猛的敢死队，可“敢死队”是用银子“买”回来的，这些人只为宁王一个人卖命，现在“宁王已擒”，这帮人还给谁卖命呢？这帮亡命徒的信心立刻就崩溃了。加之敢死队的成员都是从各部队临时抽出来的，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原本靠着不要命的疯狂各自拼命，现在阵势一乱，各部之间无法协同，将领们根本约束不了逃跑的部下。再说，这些敢死队员都是收了银子的，所以拼命的时候他们冲在前面，可逃跑的时候，这帮腰里揣着银子的家伙跑起来最快。³⁴⁸叛军那边本来就已经气馁，全靠买回来的一

支敢死队撑着，现在忽然被这么一吓唬，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头一个溃逃而去。叛军顿时大败，几万人马各自逃生，宁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退回樵舍。不等宁王缓过劲来，阳明先生手下的三万精兵已经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奋勇突击，到处放火，宁王所部几乎未作有效抵抗就被彻底击溃了，宁王的妃子、宫女们纷纷跳水自杀，谋士大将或杀或俘，宁王自己扔下部队就跑，很快也被俘虏了。

这最后的决战，王阳明没有参加。

那些惊心动魄的大战恶战，从南赣剿匪深入丛林，到攻打南昌，决战章江，阳明先生都亲自参战了，可最后这一仗是瓜熟蒂落，阳明先生却没参战，而是回到南昌招集学生，给他们讲起“良知之学”来了。

王阳明能打赢这么一场实力悬殊、毫无胜算的恶仗，是因为他不在乎军功，他是在为老百姓

打仗，在保境安民。功劳，名声，官职，爵位，皇帝的恩典，官员的艳羡，百姓的焚香跪拜，建生祠供奉……这些不是他的追求，他也不看重这些。

以前良知告诉他：为了保境安民，必须消灭宁王，于是他就打败了宁王。现在良知告诉他：仗打完了，老百姓没事了，不用你操心了。于是阳明先生就脱了甲胄，收起J1枪，换了一身布袍子，又回书院去讲他的学了。

可王阳明哪里想到，平定宁王叛乱只是一场小战役，真正残酷的战争，此时才刚刚开始。

三 邪恶出笼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的速度快得惊人，从六

月十四日宁王造反到七月二十六日被俘，前后总共四十二天。擒获宁王之后，王阳明赶紧写了奏章送往京城，向皇帝报捷，同时准备押送朱宸濠等人到北京献俘。可南昌这边还没动身，王阳明就接到圣旨，内容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宸濠等不得押解入京，暂寄南昌待命。”

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就在王阳明擒获宁王的同时，正德皇帝已经冲出京城，领着几万大军“御驾亲征”，直奔江南而来。

正德皇帝是个疯狂的人，早在正德十二年他就曾带着几个心腹潜出京师，跑到边关重镇宣府城去玩乐，在当地建了“镇国公府”久住不归。从这一回开始，这位正德皇帝算是玩上了瘾，只要一有空子，正德皇帝就扔下国家和朝廷，往宣府那边跑。

正德十四年二月，正德皇帝刚从宣府回到京城，不知怎么又动了下江南的念头，准备从京城出山东，游泰山，下扬州，到南京、苏杭，如果有机会，江西也不妨转转，然后进湖广，登武当山，把天下名胜都玩够了，再回京师。

眼看皇帝荒唐到这般地步，大臣们忍无可忍，纷纷上奏劝谏，不想惹怒了正德皇帝，立刻采取暴力，把领头上奏的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鳌等人下狱严审，其他参与上奏的一百零七名官员都被皇帝罚跪，每天早上五点出来罚跪，一直跪到晚上七点才算结束，一连跪了五天。

下跪，人类所有行为中最低贱的一种，任何一个下跪的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向什么人跪拜，从理论上说，都是在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正德皇帝天生有一种邪恶的聪明劲儿，清楚

地看出了这一点，找到了侮辱官员人格的最佳手段，并且很好地利用起来。现在他把朝廷官员“罚跪”，就是要彻底羞辱这些人的人格，践踏他们的尊严。一个人的灵魂被别人作践，他的语言和行动也就没有力量了。这些大臣们这么一跪，哪还有力量去劝谏皇帝？

把这些臣子罚跪五天，正德皇帝还没消气，又下令对他们使用廷杖，每人打五十下，让他们尝尝栗木棍子的味道，好好“战栗”一次。结果一顿廷杖，前后打死十一名臣子，所有参与官员或充军，或降级，被狠狠收拾了一遍。这件事刚消停了两个多月，忽然，宁王造反的消息送到了京城。

一听宁王造反，正德皇帝非常高兴，立刻调集军马，³⁵³自任“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以太监张

永为监军，带着他那帮宠臣江彬、许泰、张忠等御驾亲征。这一次大臣们实在没办法阻拦，眼睁睁看着皇帝出了京城。

想不到正德皇帝刚离京两天进至涿州，八月二十六日，阳明先生的《擒获宸濠捷音疏》就送到了皇帝面前。

按说此时皇帝离京刚刚两天，前线已经奏捷，他就应该回京才对，想不到正德皇帝竟然把这么一道重要的奏章扣了下来，带着他的几万大军离开涿州昼夜急行，一口气跑到山东临清才停下脚步。

到了山东，正德就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就算有人想来劝他也追不上了。这时候正德皇帝又想出一个奇妙的主意，以“威武大将军”名义下了一道钧帖发往南昌，命令王阳明把宁王暂押南昌，354不得进京献俘，意思是他还仍然要借机下江南巡幸，

同时宁王既然押在南昌，那皇帝一定会带着大军进入江西，直达南昌。

这一次正德皇帝不下圣旨，却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下钧帖，又是在掩人耳目。在正德皇帝想来，既然没有圣旨，别人就不知道他下过这样的命令，当然也就不会留下话柄给天下人指责。

所谓掩耳盗铃，就是如此。

下发钧帖之后，正德皇帝以为王阳明一定会遵从他的旨意，把宁王留在南昌，等着他“大驾光临”，就带着几万军马沿运河南下，直奔江南而来。

这次追随正德南下的除了江彬、许泰、张忠、张永等一大群豹房宠幸之外，还有大批宫中管事的太监，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好几万骄横的京军，粗野的边军，这些人所到之处祸害之深，令人难

以想象。正德皇帝每到一处就大吃大玩，逼着官员进贡各种食物玩器。江南水乡江河纵横，正德皇帝又喜欢打猎钓鱼，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猎一番，打到猎物就随手赏给陪在身边的官员，却不知道他手下的宠臣们竟以这些猎物作价，向接受“礼物”的官员索贿，一只野兔、一条鱼就可能“卖”到几百两银子。

正德皇帝身边这帮人已经不是受贿了，他们仗着皇帝的势力，公开向地方官员索取贿赂，这些人不是特务头子就是统兵的将军，权力大到可以任意杀人，相互之间又紧紧勾结在一起，向官员索贿稍不如意，就让特务们把当官的抓起来折磨逼迫。官员拿不出来，只好到官库去弄，交上来的银子全落进了奸党的腰包。

连地方官员都被害成这样，而且无处申诉，百姓们就更不用说了，京军、边军的士卒们在市

场上公开抢劫，无人敢惹。

正德皇帝每次出行，总有宦官宠臣给他打前站，这些人所到之处抢劫百姓，讹诈官府，搜掠民女，无恶不作。最恶劣的行为发生在扬州，正德身边受宠的奸臣江彬逼着扬州知府蒋瑶把扬州府里的民宅献给皇帝居住，蒋瑶不肯，江彬拿出皇帝赐的铜锤威胁要杀他，蒋瑶胆子很大，不为所动；提督太监吴经又逼着蒋瑶献上一百名秀女，蒋瑶更是坚决不肯，声称“扬州只有三个秀女，就是扬州知府的三个女儿，皇帝要就拿去，其他的秀女都找不到。”

蒋瑶为了百姓利益冒死抗拒皇命，却想不到吴经竟然干出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邪恶勾当，这个大特务头子密令手下的锦衣卫特务潜进扬州，在有女孩子的人家门外做上记号，然后半夜领着两三千军马冲进城来，强行破门闯进百姓家中，把

人家一家老小都架出来，就这么硬是把女孩子绑架而去。

这是官员，还是畜生？孟子有言：“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予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骂的就是这样的畜生。

关于正德皇帝宠幸女嬖的事，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故事，说正德皇帝到“梅龙镇”游玩，巧遇卖酒女子“李凤姐”，两人一见钟情，很是浪漫。可事实上，正德皇帝和其他皇帝一样，只是仗着皇家的暴力奸污女性罢了。那些被正德皇帝以种种手段弄进豹房的女子除了刘良女（李凤姐的原型）、马氏等少数几个成了皇帝的宠嬖之外，其他人从此再没消息了。但从明朝内廷宫女凄惨的身世，可以推知这些女子后来都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明朝皇宫里的宫女都是出身清白人家的平民女子，年龄大的十四五岁，小的仅九岁，她们被选进宫之后就和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终身成为皇帝身边的女奴。极个别的宫女可能在某个时候意外地被皇帝“临幸”一次，但即使被“临幸”过的宫女，也大多立刻就被皇帝遗忘，甚至连被抛弃都谈不上。结果这些宫女一辈子都只能服杂役和守活寡，年龄大了，就被有点势力的太监霸占，和太监“对食”，沦为这些身体残缺、心理扭曲的怪物手中的玩物；年纪再大些的，就连“对食”的资格都没有了，只好到没人注意的地方去做下等杂役。因为她们是皇帝的女奴，死后连尸体也被皇家占有，不准家人领回，而是由宫里火化之后悄悄埋到没人知道的地方。

参看这些宫女的不幸身世，就可以想象那些
被正德皇帝肆意霸占、奸污之后掠入皇宫不知下

落的民女的不幸下场了。

而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带着一群宠臣、太监、特务和几万大军沿着京杭运河一路南下，沿途骚扰如蝗虫过境，直奔江西而来。江西省内这几年连遭旱灾，又打了一场恶仗，困苦已极，再遭遇这么一群京城来的“蝗虫”，百姓们还怎么活？

然而正德皇帝这次下江南，迎面碰上的是大明朝独一无二的心学宗师阳明先生，这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纯粹用良知指导行为的“圣人”。以良知做准绳，使王阳明有了无穷的勇气，对皇帝他既不畏惧，也不“愚忠”，只是按照儒家道统做事，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皇帝做得不对，就要出来制止他！即使因此获罪、遇害，也在所不惜。现在皇帝想巡幸江南，王阳明出于自己的良知，为江南数千万百姓着想，就要阻止皇帝，
360
不让他到江南来。

有了良知做导引，王阳明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立刻给皇帝上了一道《请止亲征疏》，称自己即将押解宁王进京，向朝廷献俘，请皇帝不必下江南。同时调集官军船只，把宁王等重要犯人押上船后立刻从南昌出发，经安仁、贵溪、弋阳、兴安直奔广信府，打算由此进浙江，走京杭运河，把宁王一路押送到北京去。想不到刚走到广信，却被皇帝派来的使者拦住了去路。

正德皇帝是一心要下江南的，而且此时他的船队已经进了京杭运河，到了山东境内，忽然接到《请止亲征疏》，知道王阳明抗旨不遵，一定要把宁王押进京城，这样一来南巡的计划就破灭了。正德皇帝哪肯答应，立刻命他手下的亲信太监御马监掌印张忠再下一道文书，派锦衣卫到广信来拦截王阳明，不准他到杭州去。

皇帝养马的职司，其实这是一个管理军务的部门，专门与兵部通气，负责管理派驻各地的镇守太监，权力仅次于司礼监，在内廷中排在第二位。同时，御马监还替皇帝管理皇庄、皇店，是皇帝身边的“大管家”；并提督西厂，是仅次于东厂的第二号特务头子。

这个御马监掌印张忠是正德皇帝身边的新宠，因为他管理的御马监与大明帝国的军事机构挂着钩，所以正德皇帝此次“亲征”江南，张忠的权力大得异乎寻常，隐然是江彬、张永之下的第三号人物。现在得了皇帝的命令，张忠立刻以御马监掌印的名义下发了一道文书，阻止阳明先生去杭州。

御马监属下是西厂的特务，在接受皇帝的指派后，这帮特务立刻飞一样赶到广信，在码头上₃₆₂拦住了王阳明的去路，拿出文书给阳明先生看，

并且就在当地监视，等着王阳明率队撤回南昌。

张忠发下的文书内容大概有三条：一是地方战乱刚平，王守仁身为巡抚，应该留在地方巡视，不该亲自押解钦犯上京；二是钦犯中有些女眷是皇室宗亲，由官兵押送多有不便，不合礼数，万一出了事，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三是官兵押解钦犯沿途而上，会给地方百姓增加粮饷负担，正德皇帝颇不忍心。

正德皇帝现在命令王阳明立刻押着宁王退回南昌，用的借口居然是“不忍心增加百姓负担”……

有时候“邪恶”真的是没有底线的，除非把它揭露出来，公之于天下，否则受伤的，只能是那些善良的好人。

王阳明的心只遵循良知的引领，只为江南百姓的利益着想，从来就不畏惧皇权，他也不会服

从这荒唐邪恶的命令。可是阳明也知道，现在一群特务拦住去路，自己要是硬闯，反而走不成，于是假装听话，答应立刻退回南昌，叫船上的官兵都上岸驻扎，埋锅做饭，只说住上一夜，第二天就回南昌。

要说斗智，王阳明更胜一筹。何况这些西厂特务自以为代表着皇帝，王阳明根本不敢和他们斗，所以丝毫没有提防。

哄住特务们之后，王阳明写了一封信，连同收到的御马监的公文一起送往京城的兵部衙门，查询这个“御马监掌印太监”是否真有其人，所下的命令是真是假。

因为不知太监张忠是何人，当然也就不知道御马监的公文是真是假，现在反叛初平，自己押解宁王进京献俘，忽然有人下令让把宁王押回南昌，这个命令不合常理，王阳明不能不担心这是

宁王的余党在搞花样……其实阳明先生心里清楚太监张忠是谁，也知道这份公文其实是皇帝授意下发的。他这样做，只是给自己的抗旨找个借口。

哄住了特务，又给自己的抗旨找了一个借口，王阳明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接着“抗旨”了。当天晚上无人之时，王阳明命令解缆开船，船队连夜离开广信，一路顺风顺水直出江西，过玉山，进浙江衢州，经龙游、严州，飞一样赶往杭州去了。

这是阳明先生第二次直接抗旨，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强行制止皇帝下江南巡游！王阳明的做法又应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忠，就是敬业。敬什么业？敬事业。什么是官员的事业？老百姓才是官员的事业。

王阳明做官，做的是百姓的官，不是皇帝的官！现在阳明先生为了江南百姓的利益，不顾一

切要阻止皇帝南下，率领官船昼夜赶路，一直开到杭州，马上就要进入京杭运河了，想不到这里又有人拦截，这一次阻拦他的是正德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张永。

张永是早年正德皇帝身边的“八虎”之一，正是他在关键时刻见风使舵，迎合正德皇帝的意思整垮了刘瑾。可刘瑾倒台后，张永却又因为“贪污七千两白银”落了个处分，其实这是正德皇帝怕这个太监像刘瑾一样专横，故意整了他一回，之后却仍然重用张永，让他掌管着皇宫里由太监组成的“内操军”。

这次正德皇帝南下，张永是大军的“监军”，位高权重，手边又掌握着军马。现在皇帝眼看王阳明一连两次抗旨，不顾一切要押宁王进京，无法可想，只好命令张永先带着一支军马出京杭运河，到杭州来堵截王阳明。张永势力很大，有他

这么一挡，王阳明就真的过不了杭州了。

王阳明是个官，可面对“王法”，他这个官就变得一文不值了，但心里的良知却命令他一定要和皇帝拼到底。早在第一次抗旨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丢官、入狱，甚至遇害的心理准备，现在面对皇帝身边最有势力的太监，王阳明也是丝毫不惧，于是换上大红官袍愣头愣脑直冲进张永的住处，来和这个太监讲理。一群看门的太监军士当然拼命拦着，王阳明平时身子很弱，骨瘦如柴，可这时候急了眼，竟是力大无比，硬推开这帮“拦路狗”直冲进大门，瞠目喝道：“我是朝廷命官，来和张公公商量大事，你为何不见！”这一声断喝，把张永从后堂里“吼”了出来。

其实来和太监讲理，王阳明也是出于无奈，他本来没想过眼前这个大太监会和他讲道理，只是事到临头，拼命而已。可是和张永一见面，吵

了两句，王阳明却感觉出来，张永这个太监似乎还能听得进道理。

张永和以前的刘瑾完全不一样，这个太监曾经受过培训，识文断字、知书答礼，是个有文化的人。以前他和刘瑾等人一起爬上来，在正德皇帝身边出了不少坏主意，做了很多坏事，之后在皇帝的授意下收拾了刘瑾，手段残酷，毫不留情。可刘瑾倒台之后，张永也挨了皇帝的整治，这倒让他有了一丝清醒。接着正德皇帝又宠信江彬、钱宁这些奸恶小人，任性胡为，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张永每天出入豹房陪伴皇帝，又和江彬、钱宁打了无数交道，眼看着这些人毁坏一个国家，张永的心里渐渐有了感觉，有了良知。这次正德皇帝派张永来拦截王阳明，张永不得不来，可他也不想伤害这个一心只为百姓的好官，反而对王阳明以礼相待。

张永这种温和的态度出乎阳明先生意料，王阳明也就收起脾气，坐下来仔细给张永讲了一番江西省内的局势：百姓连受天灾、兵劫，如今困苦不堪，皇帝再带着大军进江西，百姓们就活不成了。张永听后也动了感情，居然对阳明先生说：

“我这次出来，是因为群小在皇帝身边，必须有人从旁调护，不是来和先生争功的，可我在皇帝身边日子久了，知道他的脾气，要是顺着他的意，事情还好办，若逆了他的意，只会更激化事态。”

张永倒是把正德皇帝的嘴脸看得很透，他这番话王阳明也不得不勉强接受。

眼看劝住了王阳明，张永就提出把宁王留在杭州，由他想办法交给皇帝，王阳明到此算是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南昌去了。

张永说的是不是真话？

369

在王阳明想来，张永说的应该是真话。因为

正德皇帝的意思是要把宁王押回南昌，而张永却答应把宁王留在杭州，从这一点来看，张永也在一定程度上违抗了圣旨，这么一来王阳明对张永也就不得不信，于是把宁王交给他，关押在钱塘县的大狱里，自己就准备回南昌去，却想不到这段时间平叛乱、救灾民、斗皇帝，劳心费力，身体吃不消了，把大事一处理完，心理上略一松懈，立刻就病倒了，只好先不回南昌，在杭州养起病来。

可王阳明没有想到，其实张永还是骗了他。这个太监并没把宁王交给皇帝，只是扣在杭州。而正德皇帝此时已经出了山东，到达扬州，下了江南了。

张永说话不算数，骗了阳明先生，这倒不是恶意，只是张永深知正德那不可理喻的坏脾气，这个太监又没有阳明先生那份不顾一切的勇敢，只好取了个折中的办法：收下宁王，使王阳明不

至于直接和皇帝碰撞，以保护这个好官；同时又暂时不把宁王交出，免得正德皇帝急了眼，冲他这个太监发泄怒气。

结果这场“阻击皇帝”的战役，阳明先生打赢了一半。正德皇帝仍然下了江南，好在最终皇帝没有进江西省，江西的百姓算是躲过一劫。王阳明以自己的胆量、骨气和一颗头颅，保全了江西一省百姓的身家性命。

四 诚意感动京军

王阳明在杭州养病的时候，正德皇帝派出的大军已经开进了南昌。

王阳明三次抗旨，硬性地阻止了正德皇帝进入江西省“平叛”，无疑败了正德的兴致，正德

皇帝恼火起来，立刻换上一副无赖面孔，派出亲信御马监掌印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带领几万兵马开进南昌，来找王阳明的麻烦。

张忠、许泰这些人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宠臣，这次他们到南昌要办三件事：一是寻找证据诬陷王阳明，给正德皇帝出气；二是为正德皇帝下南昌打一个前站；三是这些人早听说宁王富甲一方，现在他们跑到南昌来是想瓜分宁王的财宝，发一笔横财。

抱着这三个邪恶的目的，张忠、许泰等人一到南昌立刻把留在南昌处理政事的吉安知府伍文定扣押起来。这件事发生得非常突然，让人觉得非常意外。

在平叛战役中，吉安知府伍文定几次率军去打头阵，不畏生死，₃₇₂身先士卒，立的功劳最大。由于宁王谋反的时候，江西省的布政司、按察司

全都追随宁王造反了，现在这些人都被抓了起来，闹得江西省内没有管事的官员。大战之后，南昌城里断了粮，百姓生活困苦异常，必须有个官员来处理善后事宜，调配粮食救济百姓，王阳明又要押着宁王进京去见皇帝，就把南昌的政务交给了在平叛中立了大功的伍文定。

听说御马监掌印太监张忠和安边伯许泰领着京军到了南昌，伍文定赶紧出来迎接，想不到莫名其妙地被这些人抓了起来，伍文定气得大骂：“吾不恤九族，为国家平大贼，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义，为逆贼报仇，依法当斩！”结果当众挨了一顿打，被张忠、许泰扣押起来，逼着他交代王阳明到底是如何“私通宁王”的。

王阳明私通宁王？像这种指控简直是千古奇闻！说出来，天下人有哪373一个会信？伍文定追随阳明先生平定叛乱，从头到尾事事参与，眼看着

王阳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集结兵马，一条条计谋使出来，一仗仗打下来，十分不易，现在让伍文定去陷害阳明先生，他哪肯！任凭张忠这些人怎样威逼也无济于事。

伍文定毕竟是吉安知府，又是立了功的官员，他倔强不屈，这些恶人倒不敢把他怎么样。可他们现在急于要找王阳明的麻烦，到了不择手段、毫无廉耻的地步，对付不了伍文定，就带着锦衣卫冲进被火烧掉大半的宁王府去搜索财物，可宁王府里只剩些破桌子、烂椅子，根本算不上“财物”，张忠又命令特务把南昌城里负责账目的官吏抓来拷打，逼他交出“财物”，同时在南昌城里戒严，命令特务们到巡抚衙门、布政衙门、按察司、南昌知府衙门去搜查，甚至连学道衙门、江西贡院都被控制起来，凡是能想到的地方全部搜了一遍，
374仍然找不到银子，又把南昌城里的大小官员都拘

押起来，一个一个地逼问，可是逼来逼去，却一两银子也找不到。

宁王盘踞南昌的时候，确实曾经聚敛过巨额财富，可是他起兵攻打南京时已经把能集中起来的财物尽量带走了。上文已提到，宁王屡战皆败，不得已，搬出大笔白银赏赐士卒，把自己多年积下的银子一次花掉了大半，剩下的也都在战斗中丢失了。宁王府里留下的一点值钱东西被大火烧掉了一半，剩下稍值几个钱的，也都在遣散各路民兵的时候当成奖励发给这帮人了。

王阳明招集的各路“民兵”背景复杂，有些是刚招抚的“新民”，这些人是山贼出身，被官府招集起来打了一场恶仗，立了平叛的大功，到最后真要是一点好处都不给他们，这帮人怕是要闹事。

什么也没剩了。张忠、许泰这些人怎么拷打官员、怎么到处搜掠也没有用。

那王阳明到底有没有贪污宁王的财宝呢？

王阳明七月二十六日活捉宁王，七月三十日上奏向朝廷报捷，其后在江西安抚百姓，九月十一日从南昌起身，押解宁王去杭州，然后病在杭州一直没回来。在这短短时间里他办了多少事，其中还包括顶撞皇帝这样的“大事”，哪有时间和心思去贪污宁王的财宝？何况这么一个为了百姓三次抗旨，不怕罢官、不怕下狱、不怕杀头的官员，锦衣卫勒索礼金的时候只能掏出七两散碎银子的穷官儿，他贪什么“污”呢？

其实早在击破宁王之后不久，曾经有一个锦衣卫千户到南昌来传那道“宸濠等不得押解入京，暂寄南昌待命”的圣旨，传完旨就向阳明先生索取巨额贿赂，结果王阳明这个穷官儿回家凑了半

天，却只凑出七两白银。

锦衣卫千户是个五品官，又是皇帝身边的特务，很厉害的角色，哪能接受这区区七两银子？王阳明又不愿意得罪他，只好亲自来赔礼，对这个千户说：“我以前和锦衣卫的人打过交道，真没见过像您这么忠义廉洁的人，我这个穷官实在没什么钱，只有文字还比较精通，干脆写一幅字送给您，让天下人都知道您的清廉。”用这样的客气话把这个锦衣卫千户哄过去了。由这件事看得出来，阳明先生真的很清廉，也真的很穷。

眼看查不出财物，又没办法让南昌官员出来诬陷，实在整不倒王阳明，张忠、许泰仍不肯罢休，居然派人跑到杭州去审问宁王和他的党羽，非要得到阳明先生“私通宁王”的证据不可，结果宁王的一个手下供出：阳明先生的学生冀元亨曾经和宁王有过交谈。

冀元亨是湖广武陵人，阳明先生的弟子，正德十一年考中了举人，却不肯出来做官，一心追随阳明先生。王阳明在南赣任职的时候，宁王为了拉拢他，想请他到府里讲论学问，王阳明不肯，便叫冀元亨替他去。冀元亨和宁王坐在一起讲论《西铭》，这是大儒程颢的叔叔、关学宗师张载的传世文章，里面主要讲的是忠君的内容，冀元亨故意对宁王宣讲《西铭》，是劝他遵纪守法，宁王当然听不进去，却给了冀元亨一笔钱想拉拢他，冀元亨回来后把这些钱都上交官府了。

现在张忠这些人逼着宁王诬陷王阳明，可宁王实在找不到诬陷的借口，没办法，只好说自己曾和冀元亨打过些交道。张忠、许泰大喜，立刻让特务秘密逮捕冀元亨，使出最残酷的手段狠狠折磨，逼着这个书生给³⁷⁸阳明先生栽赃，想不到阳明先生的弟子真是个硬骨头，任凭这帮人怎么折

磨，却宁死也不肯诬陷先生，张忠等人无奈，就对冀元亨使用了“炮烙之刑”，用烧红的烙铁烫遍他全身，可冀元亨还是死不开口，张忠等人只好把冀元亨押进京城关在锦衣卫狱中。

为了泄愤，这帮无法无天的恶魔又把冀元亨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都秘密逮捕回来，一起关进了狱中。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阳明先生向京城的六部衙门递上公文，请求重审冀元亨一案，可一直到正德皇帝死了，冀元亨才被营救出来。此时冀元亨已经受了一年多的折磨，回家后仅仅五天就病死了。

张忠、许泰在南昌横行的时候，阳明先生一直在杭州养病。在他想来，宁王已经交给皇帝，这位皇帝就不会再下江南了，阳明先生则待在杭州的寺院里，一边养病，一边等着皇帝的报复。

对于正德，王阳明不抱什么幻想，也知道自己得罪了皇帝，正德不会轻易放过他，可王阳明新立军功，又一身干净，问心无愧，估计皇帝对他的陷害最多只能是罢官。而王阳明早不在乎这个官职，正好离了这块污浊的是非地，回家乡办书院，认真讲论他平生悟得的圣贤之学。却想不到忽然得了任命，就任江西巡抚，直到这时候他才听说，皇帝已经到了江南，而“御驾亲征”大军的前锋已在张忠、许泰率领下开进了南昌城。

明知叛乱已平，居然还要亲征！尤其是派几万大军开进刚打过仗的南昌，这是要把江西百姓都逼死，还是逼着百姓一起造反？听到这个消息的王阳明真的愤怒了，立刻从杭州出发直奔南京，要去面见皇帝，跟他说理，走到京口，却被致仕还乡的前吏部尚书杨一清拦住了。

380

杨一清是正德年间的一位名臣，是曾经和杨

廷和、张永一起铲除刘瑾的大功臣，也曾一度被正德皇帝器重。可他脾气很直，眼看刘瑾死后皇帝身边的小人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就上奏指责皇帝重用小人，结果得罪了“小人”们，只好退休。此时杨一清住在镇江，听说阳明先生要去找皇帝争吵，急忙赶来阻止，并告诉他：这个皇帝讲不通，不要去硬碰硬，不然只会吃亏。死拉硬拽，硬是把王阳明拦了下来。

确实，正德皇帝是个谁也拿他没办法的人。后来皇帝抽了个空子跑到镇江，让杨一清陪他喝了两天酒，临走时讹走了杨府珍藏的二百零二册宋版绝品《册府元龟》，杨一清也没办法，任皇帝讹诈罢了。

因为杨一清拦着，急了眼的王阳明终于没去南京找皇帝吵架。既然见皇帝没用，阳明先生只

好先顾着江西百姓，于是日夜兼程赶回南昌。

等阳明先生赶回南昌的时候，这座屡经兵劫的城市又迎来一轮更大的灾祸。南昌城里的官员不少都失了踪，或是被锦衣卫秘捕，或是被罢官赶走，就连伍文定也不知下落，面对一群权势熏天的奸党和几万京军士兵，阳明先生孤掌难鸣。

但王阳明毫不畏惧。自从正德元年受到皇帝的迫害，这十四年间他已经面对过太多危险，磨炼出了一身骨气和胆识，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危险。阳明先生身上的“人性”始终被良知指引，就像他对弟子们说的：“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他也许会受难，会遇害，却不太可能走错路。

王阳明回南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张忠等人请他来商量军情。这帮家伙已经霸占了江西巡抚衙门，³⁸²其他几处官衙或被侵占，或被查封，王阳

明这个新任的江西巡抚只好搬到南昌知府衙门办公。现在张忠等人在巡抚衙门召开会议，把南昌城里的文武官员都叫了来。这次他们又设了个局：大堂上摆着三把椅子，张忠和许泰已经商量好，张忠坐首席，许泰坐次席，给王阳明这个江西巡抚一个末座，让他在南昌官员面前出丑。

当然，出丑还是次要，他们这么做，是要让南昌的官员们看清楚：在这座城里，京师来的几个人才是长官，江西巡抚只是敬陪末座罢了。

这一个心计，被阳明先生识破了，知道这几个人如果得逞，只怕江西省内一些势利的官员会见风使舵去拍他们的马屁。孔子早讲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今巡抚大堂上排座次，阳明先生当仁不让，进了大堂二话不说，径自上前抢占了首席。

“没几个菜”，被推举当了皇帝还要“再三逊谢”才敢坐上龙椅，像王阳明这样上前抢座的不多，可这个座次实在抢得好，把京城来的奸党挤在一旁，这些人却是毫无办法。

之后就是唇枪舌剑了。京城来的奸贼们伸手向南昌的衙门要粮饷，阳明先生说：“没有。兵灾之后哪有钱粮？城里百姓尚且饿死，无钱供养外地军马。”

奸党们在南昌有些日子，情况都知道，他们要的就是这句话，立刻从这里发难，提起宁王的“财宝”，问这巨额钱物哪里去了。张忠、许泰一搭一唱，虽然明知道阳明先生没贪，却故意咬住不放，想给他一个难看，一连声地问：“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想不到阳明先生早有准备，笑着说：“宁王谋反以前把金银都运到京师，贿赂朝中有权有势的人了，我这里缴获了宁王的账册，可以

按着账本一一查证。”一句话，堵住了这帮人的嘴。

斥责别人“贪污”的人，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贪污犯。张忠、许泰这帮人，哪个没受过宁王的重贿？他们这些贪官最怕的就是有人把他们的黑钱公之于世。现在阳明先生拿话吓唬他们，说“有账册”，这帮人立刻一声都不敢吭了。

其实阳明先生手里并没有账册。

击破宁王的时候他确实缴获了大批账册，可是眼看牵涉的人太多，很多人都是被宁王硬拉下水的，这些账册一旦公开，坏人未必惩治得了，反倒把好人连累了，阳明先生一念之仁，便把账册销毁了。

可做贼的心虚，眼前这帮奸贼心是最虚的，生怕王阳明真给他们来个“财产公示”，所以阳明先生不过虚声恫吓，就把他们吓得全都缩了回去。

眼看斗不过王阳明，这几个奸党又想出一条毒计，他们知道这些京军、边军纪律败坏，行为恶劣，就故意命令驻扎城外的几万大军一股脑儿冲进城来，在南昌城里随处驻扎，等着看士兵和城里百姓冲突。因为王阳明眼下担任江西巡抚，军队和百姓一旦闹出什么纠纷来，这些人就会把责任推到阳明先生的头上。

于是张忠、许泰下令军队全部开进城里驻扎，而这些当兵的也真就闹起事来，强行进入民宅占地居住，不值钱的东西抢了就走，值钱的就偷，老百姓都气急了，每天都有人和官兵打架，可他们毕竟是百姓，斗不过当兵的，这一下南昌城里鸡飞狗跳，乱作一团。

从京城来“平叛”的军队，居然比叛军还缺德，
386
冲进城来堵塞街巷，欺压百姓，又偷又抢，这可

上哪说理去！对张忠这几个人来说，挑动军士和百姓争闹，挑起军人和百姓的矛盾，一旦军人和百姓起了冲突，特务们就跳出来“维持治安”，这时候南昌城里就是特务们的天下了。可在满心都是良知的王阳明看来，眼前的事却并非如此。

开进南昌的是一支“京军”，所谓京军，就是专门守御京师的部队，号称劲旅，其兵力最多时有七八十万，平时常备也有四十万以上。这支京军是帝国军队的核心力量，平时只管操练军马，养精蓄锐，保卫京师，一旦前线有大仗，就派他们增援九边九镇。原本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是靠得住的，可是这些年大明朝的皇帝安于享乐，大兴土木，为了节省人工，少花钱多享受，就抽调京军士卒供皇家役使。内府各衙门都让京军士兵来干杂活，一调就是几万人，³⁸⁷修建陵墓、修理宫门、淘挖金水河、到浣衣局做苦工，凡是用人的地方，

都拿京军士卒去顶。张太后的亲戚家盖房子，一次就调来京军八千，白干活不给工钱，连饭都不管；修一座神乐观，又调军士五千；冬天这些权贵们要烧木炭，一万京军出去给他们砍柴；城楼坏了，派三千京军去修……

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无粮无马，无甲无刀；戴的铁盔都是用模子铸出来的，为了省钱，懒得打磨，军士拿到头盔之后自己慢慢收拾，否则戴在头上会磨破皮肤；穿的甲更糟，为了省工省料，做得又短又小，“中不掩心，下不遮脐”，甲叶子都是凑合事的薄铁皮，根本挡不住箭矢。兵器作坊所造的刀又短又小，钢质太烂，没有锋刃，因为当官的贪污马料，导致战马瘦弱、死亡，因为缺少战马，骑兵部队全变成了步兵。军户家里男人女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军饷都让当官的和镇守太监贪了，连战马吃的草料钱都贪光了，

一家老小指什么吃呀？实在活不下去，军户只好举家逃亡，到外地去当流民，也好过在军营里挨饿受气。在正德年间，曾经的四十万京军竟然逃得只剩下八万五千人了。

当兵的穷成这样，穷得急了眼了！结果闹出了一个大丑闻。有一次蒙古鞑靼部落来明朝进贡，这帮军人们可见到带着银子的人了，也不管对方是蒙古人，是来向大明朝进贡的，就赶紧出去迎接，把蒙古人领进军营，要什么给什么，只要蒙古人张嘴，军队里配发的 J1 枪、马具、吃的、用的、箭镞，摸着什么卖什么，连家里的铁锅、铁锹都拿出来卖！有一个钱挣一个钱……

现在南昌城里连偷带抢，跟老百姓争闹的，就是这么一支军队。所以王阳明觉得当兵的可怜，甚至比老百姓更可怜些。³⁸⁹王阳明关心百姓，也同样爱护军人，早在庐陵当县令的时候，阳明先生

审过一个军户和百姓争执的案子，当时他秉公执法，不肯冤枉军户。那时候王阳明说过一句话：“民，吾之民；兵，亦吾之民也。”

这么一想，阳明先生心里就没有了“爱民恨兵”的偏执念头，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王阳明首先在南昌城里发布了一张安民告示。

阳明先生当了半辈子官，写过无数告示，可这张安民告示却和别的不同，这是在两群“穷人”之间调和关系，要让百姓和官兵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所以这份告示写得言辞恳切，非常感人。

告谕军民人等：尔等困苦已极，本院才短知穷，坐视而不能救，徒含羞忍愧，言之实切痛心！今京边官军，驱驰道路，万里远来，皆无非为朝廷之事，³⁹⁰抛父母，弃妻子，被风霜，

冒寒暑，颠顿道路，经年不得一顾其家，其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岂其心之乐居于此哉？况南方潮湿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气渐动，瘴疫将兴，久客思归，情怀益有不堪。

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弃家室之苦，务敦主客之情，勿怀怨恨之意。谅事宁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优恤。今军马塞城，有司供应，日不暇给，一应争斗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尔百姓，其各体悉，勿怨。

在告示里，阳明先生把军人的可怜之处都告诉了百姓，同时也把百姓的可怜之处告诉了军人。最后说了一句让人掉眼泪的话：“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安受尔命，宁奈尔心”³⁹¹，这句话不止是

对南昌百姓们说的，也是对京军士兵们说的。

在大明朝的皇帝、权贵们面前，百姓和士兵都是不幸的人，就不要互相折磨、互相伤害了，大家各自谅解些，共度时艰，把这段苦日子熬过去吧。

安民告示主要是写给百姓看的，下面王阳明就要替当兵的做些实事了。

当兵的没地方住，阳明先生下令把那些没人的空房子借给他们住；当兵的没吃没喝，阳明先生动员南昌的老百姓给他们提供热水；当兵的不熟悉城里情况，喝那些不干净的井水，阳明先生命人把不干净的水井盖起来，可以用的水井做上记号，让当兵的喝净水；当兵的远道而来水土不服生了病，阳明先生到附近各县去找大夫，请到城里来免费给他们看病，发放药物；有当兵的病死了，³⁹²阳明先生让南昌的官府提供棺材，把他们

好好葬了。

“民，吾之民；军，亦吾之民也”，阳明先生是这么说的，也真这么做了。他这一片良知换回来当兵的一句话：“王都堂爱我！”

当兵的有良心，他们粗野一些是真的，可并不是坏人，王阳明爱他们，他们也就知道敬重阳明先生，亲爱南昌的百姓，部队的军纪慢慢好了一些。

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每个人都可以被良知感动。眼看京军士兵们已经渐渐被良知感化，阳明先生又想出一个办法；趁着正德十四年冬至祭祖的日子，叫城里的百姓凡是家里有人过世的家庭，都到当街来祭奠，烧化纸钱。

经过七月间那一场大战，南昌城里不少人家都有亲人去世，这一夜南昌城里白幡飘摇，纸钱乱飞，百姓们哭声动地，看着这个惨景，京军士

卒无不动容。

到这时，张忠、许泰才发现，王阳明不知用了什么法术，竟把京军的军心“笼络”过去了，又惊又怕，觉得在南昌已经有些待不住了。可他们也不肯就此退出，又想出一个计策来：把王阳明请到教军场上，让他当着军士们的面射箭，如果射得好，京军就退出南昌。结果王阳明不慌不忙，连发三箭皆中靶心，每一射中，京军士卒齐声欢呼。

王阳明年轻时练过些武艺，骑射精通，这些年虽然做官、讲学很忙碌，可年轻时练出来的箭法似乎并未扔下。但眼下重要的不是箭法，而是京军士兵们当着将官们的面，群起为这位满心良知的江西巡抚喝彩。一个人心里的良知就像星星烛火，可以把别人的良知一起点燃。到最后，人心向背，得道多寡，就自然看得出来了。

这时候，张忠这伙人真的害怕了，在南昌城

里也真的待不住了，赶紧收拾队伍撤回南京见皇帝去了。

五 但将冷眼观螃蟹

到这时候，正德皇帝对王阳明的迫害也升级了。

皇帝被挡在了江西省外，京军又被赶出了南昌城，正德皇帝和他身边那帮小人哪肯甘心？张忠等人一到南京，马上在皇帝面前给王阳明栽赃，硬说阳明先生要造反！

王阳明是平叛的功臣，说平叛之人要“造反”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无耻才是小人的专长，张忠等人毫不困难地编出了一堆“证据”：

第一，王阳明派冀元³⁹⁵亨去和宁王勾结（冀元

亨到死也没承认）；

第二，王阳明曾经试图去赴宁王的生日宴会；

第三，王阳明本来是想投降的，只是因为伍文定用厉害的话劝了他，这才起兵平叛；

第四，王阳明攻破南昌时曾经纵兵抢掠，杀人太多；

第五，宁王曾私下说过“王阳明这人也不错”，疑似王阳明和宁王有勾结；

第六，王阳明平定宁王的功劳其实不大，因为宁王朱宸濠根本就是个傻子，有一个知县就能收拾他。

这些诬陷阳明先生的话根本没有一条站得住脚，这也正是正德最终没有陷害王阳明的原因。但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在陷害人方面，祖先们留下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绝顶的技巧。比如：没有证据，³⁹⁶可以制造证据，这有一个术语，叫“莫须有”。

于是张忠向皇帝献计：“试召之，必不至”，也就是叫皇帝下圣旨召王阳明到南京来，如果王阳明不来，就是谋反，以此为借口就可以把他抓起来。

可是皇帝传旨让王阳明来南京，阳明先生怎么可能不来呢？

张忠这个主意的厉害之处就在这里，他在暗示皇帝，扣下圣旨不发，拖延时间，把“违旨之罪”硬栽到王阳明头上！

招大臣觐见，却又扣留圣旨，然后以“不奉旨”的罪名治大臣的罪，用这样的手段迫害人，这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正德皇帝是一心想陷害王阳明的，就听了张忠的主意，写了圣旨，命王阳明到南京来见驾，可这道圣旨却没有真的发下去，阳明先生也没收到。

宁王交给他之后，张永对王阳明很欣赏，加之这个太监总的来说是个好人，眼看王阳明将被陷害，就暗中派自己的亲信去密报王阳明，阳明先生得信之后立刻从南昌出发，一路赶到南京来见皇帝。

可王阳明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锦衣卫特务的监视之下。

王阳明从南昌一出发，南京这边的江彬、张忠这伙人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也够“绝”，居然派出特务去拦截。此时王阳明已经昼夜兼程到了南京水西门外的上新河，到了南京城外了，却被锦衣卫特务迎面拦住，硬是把这位江西巡抚扣押起来，不准他进南京去见皇帝。

天下间没有比这更可恶的事了！这是对人格的侮辱，更是对人权的践踏，即使古人对“人权”
398并不了解，也能感觉到那种被剥夺了尊严的愤怒

和痛苦！王阳明忍无可忍，悲愤之下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好在他又劝慰自己：“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舍不得老父亲，舍不得家人，这才没死成。

愤到极点，悲到极点，又不能死，任何人到这个地步，也就灰了心了。几年后，阳明先生对弟子们提起当年旧事，说了一句伤感至极的话：“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要是有一条路，让我带着老父亲一起逃走，不管去哪我都愿意，而且永远不再回来啦。）

听话里这意思，阳明先生竟是动了“移民”的心思？

可惜，王阳明生活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朝，那时候阳明先生无“孔”可入，反而被特务们从南京城外一路劫持送回了芜湖。

再去找那个毫无人性的正德皇帝诉苦辩冤也就显得太下贱了。有老父妻儿在，死又死不得，王阳明只好选择了一个他唯一能找到的“孔”——逃进九华山当道士去了。

王阳明真的当道士了，在道观里一心打坐，不问世事。可正德皇帝和那帮奸贼还在暗中盯着。眼看这个江西巡抚既不骂也不闹，老老实实躲了起来，官也不当了，正德皇帝反倒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就下了旨，让王阳明继续担任江西巡抚。

说到底，王阳明是个一心做大事的人。江西百姓遭了两轮兵祸，全省又在闹旱灾，没有一个好官出来支撑局面实在不行。而江西省内头一位好官就是王阳明，他要是走了，江西百姓依靠谁呢？所以阳明先生虽然一度消沉下去，可在良知的激励下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了出来，继续为江西百姓出力。

正德十五年二月，阳明先生又回到南昌，可他刚回来，迎面遇到的又是一场接一场的天灾。江西大旱已经好几年了，这一轮旱灾更是厉害，从正德十四年三月到次年的三月，一整年没下过透雨，六七月间又打了一场大仗，把粮食都吃光了，土地也撂荒了，到第二年春天，老百姓真是断了活路，维持不住了。哪想老天爷也可恨，到五月间忽然降下大雨，而且一连几个月不停，一夜之间旱灾转成了洪灾！赣江沿线全面涨水，洪水漫过江堤，沿江府县尽成泽国，田地尽毁，淹死牲畜无数，老百姓只有爬到树上去躲避。一场洪水过后，半个江西省彻底垮掉了。

按说此时朝廷本该减免战乱地区的租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想不到上头却下了命令：正德十五年的粮税照收，并且追征正德十四年的粮税！⁴⁰¹大旱之年，不但不免税，反而连去年因为打仗而

拖欠的粮税一起追征！这真是要逼着老百姓造反，和朝廷拼命了。

没办法，王阳明上奏请求减免粮税。这一次王阳明也真是气急了，在奏章里指着鼻子骂了皇帝几句：“荒旱极矣，而因之以变乱；变乱极矣，而又加之以师旅；师旅极矣，而又加之以供奉，益之以诛求，亟之以征敛！当是之时，有目者不忍观，有耳者不忍闻，又从而剥其膏血，有心者尚忍乎？”

正德皇帝有心吗？没有。

“宸濠叛逆，独知优免租税，以邀人心，我辈朝廷赤子，反不少加优恤，又从而追征，将何以自全！”

叛军都知道免除百姓的租税，朝廷官员反而不如叛军，你们到底是官还是贼？

402

“宽抚恤之虚文，不若蠲免之实惠；赈济之

难及，不若免税之易行。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曰宽恤赈济，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剗其腹殿之肉，而曰吾将救汝之死！凡有血气者，皆将不信之矣。”意思是夺百姓口中之食，剗黎民腹殿之肉，然后还假装亲民爱民，弄出一副亲切的嘴脸，骗谁呢！这套骗人的把戏，凡有血气者，皆不信矣！都走到这一步了，真应了老子那句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要说王阳明骂皇帝，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宁王造反的时候，阳明先生上奏通报此事，奏章里就教训皇帝要“痛自克责，改弦更张，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这年八月正德皇帝要“御驾亲征”下江南，阳明先生又上奏指责他荒唐，说“汉武帝有轮台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诏，而士民感泣”，⁴⁰³让正德皇帝赶紧反省，不要胡闹。在《自劾不职

以明圣治事疏》里，王阳明自称犯了“三大罪”：第一，皇帝不视朝，是因为王阳明和臣子们没有把天下人的反感告诉皇帝，使之醒悟；第二，皇帝在禁宫里训练兵卒，没日没夜的折腾，是因为王阳明和臣子们没能劝皇帝好生蓄养精神；第三，皇帝不事经筵，不学习，只知道骑射游玩，是因为王阳明和臣子们没能讲论道德，让皇帝学好……讽刺！

可面对正德皇帝，王阳明说什么也没有用。

古人说得好：“知耻近乎勇。”意思是说一个人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缺点，还算是有一丝改正的勇气。可正德皇帝却不肯“知耻”，他根本不在乎江西的灾情，也不在意王阳明怎么骂他，只管待在南京吃喝玩乐，祸害百姓，闲来没事突发奇想，居然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下一道钩帖，
404

禁止天下百姓养猪食肉，谁敢养猪杀猪，一律流放到极边之地充军！

为什么禁止天下人养猪？原因有三：一是正德皇帝觉得自己姓朱，和“猪”同音；二是正德皇帝正好属猪；三是正德皇帝认为吃猪肉会得“恶疮”，对身体不好。当然，第三条纯属废话。

禁止天下人养猪吃肉的钩帖发下去之后，江南百姓吓坏了，为了不被锦衣卫特务抓捕流放，他们把家里所有猪都杀光了，有些人害怕“杀猪”也犯罪，只得偷着把家里养的猪给埋了，这一下弄得天下动乱，远在北京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知道了这件事，赶紧写了奏章来劝皇帝：“十二支生辰，所属物畜，乃术家推算星命之说，鄙俚不经，不可为据。若曰国姓字音相同，古者嫌名不讳。盖以文字之间虽当讳者，尚且不讳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且讳其物之同者，其可乎？”

大明皇帝姓朱，是“红色”的意思，跟“猪”一点关系都没有，可皇帝自己倒出来找事，硬让老百姓把朱皇帝一家子往“猪”身上联系，出这么个损招儿，逼着天下的老百姓骂你们一家子都是猪，你这皇帝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杨廷和是詹事府出身，正德皇帝做太子时杨廷和就在旁辅佐，所以正德皇帝对杨廷和极器重，也极信任。现在杨廷和的一顿劝说，好歹让正德皇帝收回了“禁止养猪杀猪”的命令。可接下来这位皇帝又想出一个无聊主意，给王阳明下了一道圣旨，命他把正德皇帝征剿宁王的“功劳”添进表功的奏章里去。

阳明先生旬日破宁王，天下人都知道。江西方面的捷报送进京城时，正德皇帝率领军队刚到涿州，这些事，内阁、₄₀₆兵部、朝廷官员、江西官员无人不知。阳明先生押着宁王出江西进浙江，

浙江百姓全看见了。正德皇帝下江南，只到了扬州、南京，根本没去江西，江南百姓也全看见了。到这时候皇帝让阳明先生把正德皇帝和他那帮奸党的名字塞进奏章，硬说这帮人在平定叛乱的时候“立过功”，这不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吗？

可正德皇帝就是喜欢抽自己的嘴巴，王阳明也拿他没办法。现在阳明先生一心只想着让这个皇帝赶紧离开江南，回京城去，只要皇帝肯走，阳明先生愿意把自己的战功全给皇帝。

只是不知道身为皇帝，正德要这么一份“功劳”干什么？

为了把皇帝送回京师，王阳明重新写了一道《江西捷音疏》，把正德皇帝和他手下那几个宠臣的名字加了进去。收到这道奏章，正德皇帝满意了，就命令张永把已经被俘一年有余而且一直被关押在杭州大牢里的宁王押解到南京，自己带

着上万京军在城外列开阵势，把宁王从囚车里拖出来，然后正德皇帝穿上铠甲，拿着宝剑，在上万人包围之下亲自出马去“活捉宁王”，再把宁王塞回囚车，押进南京城。

这种把戏，三岁的小孩玩“过家家”时偶尔会这么干，可时年三十岁的正德皇帝居然带着上万官军一起来玩这套把戏。一个皇帝，当着上万人出这么个大洋相给天下人看，制造话柄给史家往书里写，这么古怪的思路，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正德皇帝的行为王阳明是无比蔑视，于是借着去庐山游玩的机会，悄悄在开先寺里树了一块石碑，把正德皇帝的无耻行径用隐晦的笔法记录下来：“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造反，七月，我领着各府民兵收复南昌，擒了宁王和他的党羽，
408这时皇帝震怒了，亲率大军讨伐，于是‘俘宸濠

以归’。”

在这里，阳明先生故意写明自己“七月擒宁王”，而所有人都知道正德皇帝八月份才率军离开北京，所以“俘宸濠以归”显然是在欺世盗名，他立这块碑，意在给后人提供事件的真相。因为阳明先生知道统治者抹杀历史真相的本事，怕这件事就此湮没了。在碑文后面又有“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之类讽刺人的话，说皇帝带着几万人御驾亲征，却居然“不杀”，兵不血刃。

可是鄙视归鄙视，讽刺归讽刺，王阳明还是要替皇帝着想，因为皇帝代表着国家利益，他要是真被奸臣给谋杀了，国家利益会受损。

眼下正德皇帝住在南京，他身边几个著名的奸党平虏伯江彬、安边伯许泰等人带着几万大军驻扎在皇帝左右，尤其江彬还被任命为提督东厂

兼领锦衣卫，权柄之重、野心之大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正德皇帝又是这么个昏庸至极的人，如果江彬这些人起了反心，很容易就能把正德皇帝干掉，然后割据江南造反，要是这样，天下就大乱了，江南百姓就受苦了。左思右想，王阳明只想出一个办法：亲临赣州，检阅卫所官军，命官军加紧操演，以精锐的兵马威吓江彬等人，保证皇帝在南京的安全。

果然，阳明先生在南赣演练部队，江彬等人听到消息立刻派特务到南赣来窥视动静，身边人害怕这些奸党再来陷害，就劝阳明先生谨慎一些，不要操演军马，免得皇帝疑心，可阳明先生此次操兵目的就是要震慑江彬这些人，使他们不敢在南京作乱生事，所以不怕别人陷害，照样操演兵马。

为了表明心志，王阳明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

西家小儿不识虎，报竿驱虎如驱牛。

意思是说这些奸党心里最虚，胆子最小，全都是些“纸老虎”，对付这些人就是要跟他们正面斗争。这时候的王阳明已经明白了：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首先必须勇敢，这样才能击败邪恶。所谓的“谨慎”，其实是纵虎为患，那些“谨慎”的人，早晚必被猛虎所害。

果然，阳明先生在南赣地区操练军马，对奸党起到了震慑作用，加之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扣着南京城门的钥匙不肯交给江彬，应天府丞寇天叙等正直官员也一直不与奸党合作，想尽办法要让皇帝早日离开南京。北京方面内阁重臣催得又紧，一次一次上奏章请求皇帝回京，关外的蒙古人似乎也感觉到了皇帝不在北京，⁴¹¹开始聚集兵马，准

备趁机发动攻势。同时这帮奸党和几万军马在南京城里横行霸道，已经把当地百姓惹急了眼，经常有商贩不顾性命地冲出来和他们搏斗。乔宇、寇天叙这些官员看到民心可用，就找了一批会武术的当地人，让他们每天在市井间悄悄巡视，看见当兵的抢夺百姓财物，就冲出来和当兵的打斗，揍这帮家伙一顿。

结果江彬在南京主不了事，京军、边军在南京城里也待得不舒服，欺压不了百姓，反而经常挨揍，加之七月间不知什么人把一个猪头涂成绿色，扔进了皇帝的寝殿，把正德皇帝吓得够呛，这说明连朱厚照身边亲信里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用这种装神扮鬼的方法迫使正德皇帝早日回京。

到这时候，正德皇帝在南京待不住了，只好在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十二日押解着宁王离开南京，
412 返回京城。

一个人做多了坏事，真的会遭报应。正德皇帝在回京的路上，曾在淮安清江浦的积水池打鱼，却意外落水，从此染病，而且病情越来越重，眼看起不来床了。为了取个吉利，正德皇帝在到达通州之后下令杀了朱宸濠，把他挫骨扬灰，可是皇帝身上的病痛却一点也不见好转。

回京之后，正德皇帝硬撑着病体在午门外举行了献俘仪式。三天后，正德皇帝在举行祭祖仪式时口吐鲜血摔倒在地，被人扶回宫里，从此再也没在大臣们面前露过面。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正德皇帝病死在豹房，时年仅三十岁。

正德皇帝在位十六年，身后却没有留下子嗣，于是他的皇位拱手让与别人，连他父亲孝宗皇帝朱祐樘也失去了在太庙里的正统地位，被自己的弟弟——嘉靖皇帝的生父朱祐杗取代了，正德皇

帝的舅舅、臭名昭著的寿宁侯张鹤龄被嘉靖皇帝所杀，正德的母亲张太后也气急而死。以正德皇帝为代表的这一帝王族支一个个都不得善终。

正德昏君的凄惨下场，也足以为史鉴了。

六 再遇陷害

正德皇帝死后，内阁首辅杨廷和与阁臣蒋冕、毛纪商量，和司礼监太监讨论，又征得正德的母亲张太后的同意，决定拥立孝宗皇帝的弟弟兴王朱祐杭之次子朱厚熜即位。

此时兴王世子朱厚熜还远在湖广安陆州的王府里，北京城里江彬等奸党控制着锦衣卫和东厂两大特务系统，掌握着精锐的“外四家”军马，随时可能造反作乱。在这个非常时期，首辅杨廷

和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一边稳住江彬等人，同时派国戚、重臣、太监去迎接新君，又运筹谋划，争取到司礼监太监的支持，瓦解了奸党的力量，在新君进京之前和太监张永一起擒了江彬，把正德一朝祸国殃民的“豹房奸党”打倒在地。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兴王世子朱厚熜被迎进京城，随即登极称帝，年号嘉靖。

和正德皇帝相反，嘉靖皇帝是个聪明人，一上台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兴利除弊，短短时间就取得了内阁和天下百姓的信任，坐稳了龙椅。

嘉靖皇帝登极的时候，王阳明还在江西巡抚任上处理政务，安排减灾，同时抽出时间讲学。就在阳明先生忙于讲学的时候，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北京城里来了一道圣旨：“以尔昔能剿灭乱贼，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₄₁₅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钦此！”这道圣

旨让阳明先生觉得意外，因为从口气上看，新上台的嘉靖皇帝似乎是要让王阳明到京城委以重任，甚至可能让他人阁。

嘉靖皇帝刚登极的时候处事英明果断，又肯与内阁和文臣商量，看起来像是个有作为的君主，而阳明先生是个立大志向的人，当然也想趁这机会大展拳脚，做一番事业，接旨后立刻动身进京，哪知刚到杭州，圣旨又来了，取消了“驰驿进京”的命令，把阳明先生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了。

杭州，是阳明先生命里一道过不去的坎：正德二年被贬龙场，在杭州碰上刺客；正德十四年押着宁王进京，在杭州被张永堵住；这次好不容易要得到重用了，又是在杭州接了这道旨，失望而回。

嘉靖皇帝为什么朝令夕改？说穿了，竟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在皇帝耳边说了阳明先生的坏话。

子的正德皇帝，是正德的亲信臣子，于正德二年入阁，正德七年成了首辅，到嘉靖朝仍然是首辅，担任阁臣前后十多年，有能力有政绩，正德皇帝虽然昏庸至极，可大明王朝最终没有走向崩溃，在这上头杨廷和出力不少。正德皇帝死后，杨廷和又挑起重任，稳住局面，迎立新君，除奸斩恶，立下大功。所以这位阁老在正德朝是擎天柱，到嘉靖朝又成了辅国臣，势力之大，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权倾朝野。

可是杨阁老受重用这些年，王阳明不是贬官在外，就是充当闲职，好不容易升了左金都御史，又被外派去当巡抚，连北京城都没进过一次，他和杨廷和实在没打过什么交道，杨廷和有什么理由嫉恨阳明先生呢？

杨廷和嫉恨王阳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阳明和前任兵部尚书王琼关系密切，而杨廷和与

王琼是一对政敌，此时王琼已经被杨廷和打倒，下狱受审，在这个时候王阳明如果进京受到重用，会让杨廷和感到有压力；二是阳明先生传播的心学思想越来越精深透彻，已经一步步摆脱封建统治者加在儒生们身上的思想束缚，进入了自由的人性空间，而且阳明先生这些年一直讲学不辍，他的高足弟子们也纷纷开馆讲学，使阳明心学在大明朝得到广泛传播，影响越来越大，其中那些“离经叛道”的内容，已经引起了杨廷和他们这些死守祖制的“机器官僚”们的注意。

杨廷和是一位挺不错的首辅，可也是一位极为保守的官员。在他心目中，“祖制”第一，“忠孝”第一，谁也不能触动。为了维护皇权祖制，这位首辅居然可以毫不妥协地和嘉靖皇帝硬碰硬，直到自己垮台为止，可见其保守程度之深。

现在，杨廷和感觉到阳明心学正以“良知”

为准绳，以“知行合一”为口号，使得天下学子们都睁开眼睛，自由思考，其结果将是撼动皇权，摧毁祖制，让这个国家面目一新。这个“可怕的后果”是杨廷和这种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赶在王阳明进京之前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传播“邪说”的人到朝廷里来充当要职。

杨廷和是首辅，德高权重，和内阁的三位重臣蒋冕、毛纪、费宏同心同德，又是拥立嘉靖皇帝登极的大功臣，加之新君登极之后，朝廷刚刚进行过一次大清洗，凡与杨廷和意见不和的人大多不是下狱就是充军了，所以杨廷和成了嘉靖初期最有势力的大臣。现在杨廷和出面阻止王阳明进京，嘉靖皇帝无论如何必须给首辅这个面子。于是撤回了前边的圣旨，改任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给了他一条冷板凳坐。

419

说真的，王阳明再怎么是心学宗师，再怎么

看透统治者的邪恶黑暗，毕竟他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人，要食人间烟火，要和天下人打交道，他心里还是有很多想法，愿意为朝廷做一些事，为天下百姓尽一份力。所以嘉靖皇帝招他进京时，阳明先生是真心想来。可刚走到杭州，一盆冷水就迎头泼了过来，把他心里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浇灭了。

由“进京重用”改任南京兵部尚书，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王阳明被皇帝搁置不用了。到这时候王阳明去南京上任也没意思，立刻辞职又成了闹情绪、撂挑子，新君登极不久，一个老臣就出来撂挑子，给皇帝甩脸，也不妥当，想来想去，只好长叹一声，写了奏章请求回乡省亲，嘉靖皇帝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阳明先生脱掉官服，打起包袱回了老家。

420

这一年阳明先生五十岁了。

七 逼出来的致良知

辞去官职回乡讲学，一直是王阳明最想做的事。

此时的王阳明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心中的良知越发精纯，对“知行合一”的领悟越加深邃。就像阳明弟子钱德洪所说：“辛巳之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人，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自是指发道要，不必假途傍引，无不曲畅旁通。”

宁藩之变，王阳明以三万民兵击败十万叛军，不可谓不神奇。但相对于其后的阻击正德皇帝，与皇权和特务较量，护江西一省百姓，与叛军的战斗竟显得微不足道了。钱德洪在此所说的“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所指也并不是“征宁藩”

一事，而是平叛之后的那些事情。只是面对凶猛的皇权，钱德洪肚里有话，不敢说破罢了。

就是在这“独信良知，单头直人”的境界中，王阳明忽然灵机一动，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加高明、更加出色的口号，叫做“致良知”。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起点”；而致良知，才是阳明心学真正的核心所在。

如同“知行合一”一样，“致良知”观点是逼出来的学问，其提出也有明确的时间点，就是正德十六年。

在此之前，阳明对于“知行合一”的更高境界有所体悟，却不能尽得，对这种情况 he 说道：“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然而在正德皇帝下江南祸害百姓，特务们用种种卑鄙手段栽赃陷害，逼得王阳明不得不遁人道观，

受尽煎熬苦痛；当王阳明复出，重新担任江西巡抚的时候，面对的又是非人力所能救的天灾人祸：水灾横行，皇权横行，邪恶横行！整个江南山河失色，民不聊生，王阳明只能用他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整个江西省，虽然他拼尽全力救下了半个南昌，却救不了江南百姓，更救不了天下人。

就是这样的困苦折磨，使王阳明的思想大大提升了一步，其心中良知如火中烧丹，一时烁然，那多年来“津津含于口”的大道理忽然喷薄而出，正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最终提出了“致良知”的口号。

“致良知”一经提出，王阳明自己觉得非常满意，对弟子钱德洪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字（致良知）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423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喜悦之余，他

更对友人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在《与陆元静书》里，他又说“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只要把阳明先生这句话略做一个“提纯”，则“致良知”三字跃然而出。

王阳明的“致良知”功夫是给天下最凶的邪恶逼出来的，如同千百度的高温里烧炼出来的真金，纯度极高，于是阳明先生也借“致良知”三个字提请学子们多下工夫，切实努力，于“是非”二字上痛下决心。

《传习录》中讲道：“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愈）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这里说的“千思万虑，愈思愈精”都是极深的功夫，极大的努力。

地扩充自己的良知。这一思想来自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称为“四端”，并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他认为人心中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态是最重要的，是与良知相通的，当这几种情绪产生的时候，就是良知体现出来的时候，此时“扩而充之”，其效果就像星火燎原一样。

对孟子的观点王阳明是认同的，在《传习录》里他对弟子们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是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又说：“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⁴²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能到得欲到之地。”用这样简明的

比喻告诉我们，“致良知”其实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修养功夫。

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他又强调说：“正者，正此（良知）也；诚者，诚此（良知）也；致者，致此（良知）也；格者，格此（良知）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用“尽性”这两个字来表示那种把良知扩充到极致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一方面推崇孟子的“扩充良知”理论，反复强调“致良知就是尽可能地扩充良知”，另一方面又把老子的思想拿出来和儒家思想做了比对与融合，这一点是非常高明的。

在《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话：“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这里所说的“只求日减，不求日增”显然是直接引自《道

德经》的名言：“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而王阳明对老子思想所做的阐述，精辟至极。

和孔孟儒家思想一样，老子道家思想也曾遭遇后人的阉割和腰斩，被搞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我们抛弃“道家只会求仙养生”的偏见，直接回头审视“老聃”这个人，用自己的眼睛来读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就会发现老子道家思想和孔孟儒家思想之间在哲理上是相通的。老子说的“道”，孔子说的“仁”，王阳明说的“良知”，其实是一回事。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其中的“圣”是指封建独裁统治者，“智”是指统治者心中的私欲。而王阳明大谈“满街都是圣人”，强调“人民皆是圣人”，正好反衬出“皇帝不是圣人”。王阳明大谈致良知，要“克倒不善”，“克”谁呢？⁴²⁷依着孔子“克己”之本意，这“克”的当然是皇

帝心中的私欲，是封建统治者的私心。

相融，互通，是好事，在这方面，门户之见要不得！老子和孔子两位哲人本来亦师亦友，儒家、道家两种学说究其本源，解其本意，大多相通，绝不是对头。孔夫子说得好，“君子和而不同”，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论语》、《孟子》、《传习录》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就不能公平理智、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现实中的意义呢？

王阳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的博采众长，但凡哲理，尽可拿来互相印证，没有门户之见。而王阳明的勇敢之处则在于敢立言，敢下断语。现在他推出了“致良知”这个法宝，于是以极大的勇气为“致良知”立言，给“致良知”定性：“凡致良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学》谓之致知格物，在《书》谓之精一，在《中庸》谓之

慎独，在《孟子》谓之集义，其功夫一也。”

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把“四书”精髓全部合并，彻底归拢到“致良知”概念底下来了。其实王阳明不是要“归纳”“四书”，说穿了，他是要打破“四书”对读书人头脑的禁锢。王阳明的想法是极有意义的，但想在皇帝的眼皮底下破“四书”的法，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

于是王阳明说出的很多话开始变得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了。在《与陈惟浚》中，他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二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既而又强调：“近时同志，亦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于此实用功者绝少，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得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虽比往时支离之说稍有头绪，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耳。”

王阳明的这段话看似平淡，其实意味深长。

知行合一，是把“良知”与“行动”合而为一，用良知指导行动。良知确定是“善”的，就要马上行动起来，去维护；良知确定是“恶”的，也要马上行动起来，去阻止。可是阳明的“同志们”——他没称这些人为“弟子”或“朋友”，而是直接称为“同志”，这些人虽然懂得了“知行合一”，却并不敢完全去实践它，只在日常小事上表现出“为善去恶”，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仍然不敢吭声。像王阳明这样为了百姓利益敢与皇帝搏斗的，有几人？

很少。

所以王阳明才责备这些“同志们”是“良知未真”，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在这里不得不说，不但王阳明的“同志们”良知未真，很多话不敢说，很多事不敢做，就连王阳明自己有时候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直白。

王阳明曾教过一个叫杨茂的弟子，此人又聋又哑，阳明与他用纸笔交谈，问他：“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还能知是非否？”

杨茂答：“知是非。”

阳明便说：“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心还与人一般。”既而又说：“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

王阳明和杨茂的对话究竟是何意？粗看全是闲话，细读却有滋味。

这世界上的老百姓大多是“杨茂”，虽然生活在社会中，却是耳朵听不见一句真话，嘴巴说不出一句心声，又“聋”又“哑”，着实可怜。如今王阳明教给天下人：但终日听你的心（良知），不消耳里听，但终日行你的心（良知），不消口里说……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谓良知也。”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耳不能听者也知是非，口不能言者也知是非，只要知是非，就有良知，只要依着良知，就有出路。人人皆尧舜，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先生是借这位聋哑人为喻典，给天下人指路呢。只是有些话，终究不能说透，终究差这么一点点……

于是《传习录》里又出现了这样一句：“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真要讲得太明白了，阳明心学就被禁了。（王阳明去世后，心学确实被禁了。）反正“良知本是明白”，同志们“实落用功”去吧。

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高境界。在这个语境里，什么都合一，人生的一切意义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良知。对此，后世大儒黄宗羲总结得好：“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句话把“良知”和“致良知”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了。

在此以前，王阳明谈知行合一，是希望天下人都把“良知”和自己的行动合而为一，但这个说法还略显含混不清，可有了“致良知”这一口号，阳明心学给人们指出的道路就更加清晰了。

什么是知行合一？知，是“知”个良知；行，是“致”个良知。依阳明的语境，这叫做“心（良知）外无物，心外无理”。把自己内心的良知扩充到无限广大，而将人生的一切目标、一切内容、一切意义尽数包容在良知之内，以至于在良知之外再无一物，再无一理，⁴³³将自己内心的良知修炼成一块万镒之重、纯而又纯的真金，此就是精纯

无虚的圣人境界了。

提出如此清晰简明的口号之后，阳明心学的指向完全清晰了，到此，人的“（良）知”与“行”已经完全合一，再也无法分开了。王阳明下面要做的无非是多做总结，开阔学子们的思路和眼界，使他们对“知行合一”做更深的体会，希望大家能够把“知行合一”贯彻得更到位，更精深。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及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要诀，致知的实功。

吾平生讲行，⁴³⁴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

此知如何琢磨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至此，阳明心学达到了一个高峰，人生的一切目标都清楚地指向了“良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有人问阳明：“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阳明回答道：“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天泉证道，圣人必可学而至

一 满街都是圣人

且说王阳明得到皇帝的准许，回到山阴老家是在九月，本以为可以闭门谢客，图个清静，却想不到嘉靖皇帝非常精明，很会做人，知道王阳明是个人才，一直想要用他。虽然有杨廷和拦阻，不能即刻重用，嘉靖却在这上头留了心，十二月下圣旨，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年俸禄米一千石，给予诰券，三代并妻一体追封。

被封为伯爵之后，阳明先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立刻上奏章为自己当年在江西平叛时一起出

生人死的部下请功，为屈死的学生冀元亨请求抚恤：“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诸人之外，又有知府陈槐、曾屿、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关、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似、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复有举人冀元亨者为臣劝说宸濠，反为奸党构陷，竟死狱中，以忠受祸，为贼报仇，抱冤赍恨，实由于臣，虽尽削臣职，移报元亨，亦无以赎此痛，此尤伤心惨目，负之于冥冥之中者。”

阳明先生是个重感情的人，这道奏章写得也很动情。在他写这道辞爵奏章的时候，当年追随他和宁王血战的老部下仅伍文定一人得到了升迁，其他人的功劳都被淹没，甚而一个接一个被悄悄罢官逐走了。

明虽立了盖世奇功，可他却用一腔良知来左右自己的行动，凭着良知做了一系列正直的事，屡次违抗皇帝的命令，把一群奸贼逐出南昌，结果在那个黑暗时代，坚守良知倒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遭到了正德皇帝和他身边那群奸党的打击和迫害，也因此连累了自己的部下。其中吉安知府伍文定在南昌险些被奸党害了，可伍文定也因为这事反而揪住了那些坏人的把柄，这帮家伙不得不升他的官，其他和王阳明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却一个个悄然消失了。现在阳明先生出来为这些人请功，如果不表彰他们，王阳明自己也不要这个伯爵。

结果嘉靖皇帝根本不理睬他。

嘉靖皇帝上台后虽然制裁了江彬、张忠等奸党，但这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统治，而在更多事件上，⁴³⁸他并不愿意为受冤屈的人们翻案昭雪，因

为从根本上说，嘉靖皇帝和正德皇帝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为正德朝的冤案翻案，对嘉靖皇帝没有好处。

嘉靖皇帝并不是什么明君，他是个精明、小气、自私、狠毒、薄情寡恩的人。他争议大礼，责打群臣，杀害夏言，重用严嵩，迷信斋醮，踢死皇后，虐待宫人，忍无可忍之下，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几乎把他勒死……此时嘉靖刚刚当了皇帝，根基不稳，脸上还戴着一副“励精图治”的假面具，他的真实嘴脸还没有暴露出来，不过也快要露出来了。

嘉靖皇帝封爵的圣旨送到山阴的这天，正巧是王阳明的老父亲王华的生日，这位在官场混了一辈子的老先生对做官的门道看得比儿子更通透，当时便说了这样一句：“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⁴³⁹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

一语成谶。

王阳明封伯爵后没多久，老父亲病故！阳明先生哀痛不已，自此闭门谢客，在家丁忧，一年之后开门讲学，但只讲学，做官的事，三年之内不必再提。

也正是这三年间，朝廷政局天翻地覆，以杨廷和为首的那一班重臣一个个被嘉靖皇帝碾成了齑粉，唯独阳明先生因为丁忧，躲在家里守孝，躲过了这场政治风暴，毫发未损。

要说这场政治风暴，倒是从一件小事上来的。嘉靖皇帝是兴王朱桔杭的儿子，朱桔杭此时已经死了，可王妃还在，也跟着嘉靖皇帝一起被迎进京城。这时候内阁提出，让嘉靖皇帝以孝宗皇帝为父亲，以大行皇帝（正德）⁴⁴⁰为兄，而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朱桔杭称为“叔父”。

内阁这样提议，主要是考虑到嘉靖是藩王之后，如果不承继正统，则名不正言不顺，别的朱姓藩王可能会想：“既然嘉靖不是孝宗和正德皇帝一脉，却可以做皇帝，那我们岂不是同样可以做皇帝吗？”不但藩王们心里会有“想法”，官员、百姓们对嘉靖的皇位也会有些不认同，这样容易生事端。

内阁这样做，明显是在维护皇权世系，维护“祖制”，这倒是他们这帮官僚一贯的态度。

想不到在这个涉及“祖制”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嘉靖皇帝却不肯接受内阁的意见，在这位年轻的皇帝看来，自己的亲爹亲妈是最重要的，如果认孝宗朱祐樘为父，把自己的亲爹称为“叔父”，那他这个当皇帝的就吃了亏！

吃亏，不可以！

因为不肯吃这个亏，嘉靖和内阁纠缠起来，
441

一心要把自己的父亲兴王追认为“兴献皇帝”，取代孝宗皇帝的位置，而内阁首辅杨廷和偏偏坚守祖制，铁嘴钢牙咬住不放，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肯让皇帝破坏祖制。几个回合斗下来，嘉靖皇帝竟然感到了一丝慌张，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内阁重臣和朝廷六部九卿官员竟是结为一体，所有人众口一词，自己身为皇帝，反倒孤身一人，朝廷中没有一个亲近的臣子，宫里没有一个亲信太监，孤独得让人有些意外。

身为皇帝，最怕的就是被孤立，嘉靖现在就被大臣们用“祖制”孤立起来了，于是这个精明的人立刻动起脑筋，开始组建自己的亲信班底，第一个被嘉靖皇帝拉上船来的，却是个意想不到的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名叫张璁，浙江温州人，这一年刚刚考中进士，还没做官。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
442

却看出了皇帝和内阁首辅之间的矛盾，而且胆大包天，上了一道《大礼或问》的奏章，跳出来替皇帝说话，公开与“祖制”辩论。

结果是，内阁重臣抱成一团和皇帝抗争，坚决驳斥《大礼或问》，压得皇帝抬不起头来。偏巧这一年清宁宫又发生了火灾，而此处正是朱厚熜的母亲兴献王妃进京之后的居所。于是杨廷和等人一起上奏，认为“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宫里起火，是因为皇帝言行有所不当，用“天兆”逼着嘉靖皇帝妥协。那个迎合皇帝的小人张璁则被杨廷和一脚踢出朝廷，赶到南京担任刑部主事去了。

可是嘉靖皇帝并没认输，被赶走的张璁也没认输。这个人很快在南京找到了桂萼、霍韬、方献夫、席书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人物，其中最著名的⁴⁴³就是同为南京刑部主事的江西人桂萼。张璁、

桂萼是同样的小人，脾气秉性处处合拍，所以两人一拍即合，下定决心要打败内阁，靠着巴结皇帝一口气爬上权力的顶峰。而嘉靖皇帝也真有勇气，仅仅得到这么几个小人物的支持后，就于嘉靖三年二月逐走了内阁首辅杨廷和。

杨廷和为官四十六年，担任阁臣十八年，到嘉靖初年在朝廷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政敌，满朝官员全都是他的人，真可谓权倾朝野，势力熏天，可是嘉靖皇帝一句话，就把这么一个老臣罢黜了。这到底是皇帝的权力太大，还是阁臣的权力太小？

驱逐了杨廷和后，嘉靖皇帝又相继罢免了礼部尚书汪俊，逐走了新上任的内阁首辅蒋冕，马上招张璁、桂萼、席书₄₄₄等人进京委以重用，可此时的朝廷里还有不少大臣反对皇帝“议大礼”，

张璁、桂萼官卑职小，在朝堂上没有立足之地，破格提拔又找不到因头，于是嘉靖皇帝觉得该是传出“谣言”的时候了。

很快，朝廷里传出谣言，说大臣们发了疯，准备在朝堂上公然打死张璁和桂萼，嘉靖皇帝“一气之下”立刻任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又命席书火速进京，要让他担任礼部尚书。

到这时候，朝臣们已经忍无可忍。兵部尚书金献民、詹事府少卿徐文华、吏部尚书何孟春等都出来号召群臣，杨廷和的儿子、翰林修撰杨慎当众大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翰林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辨等人纷纷响应，共有九卿官员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各司郎官十二人、户部官三十六人、礼部官十二人、

兵部官二十人、刑部官二十七人、工部官十五人、大理寺属下十一人，前后共二百二十九名臣子跪伏左顺门，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阙庭。

听到群臣的哭号之声，嘉靖皇帝立刻让司礼监太监出来传旨，命群臣散去。可百官不肯退去，反倒连内阁大学士毛纪和南京吏部尚书朱希周等人也都赶来跪伏请愿。

到这时候，嘉靖皇帝觉得自己无需再掩饰什么了，立刻揭去面具，一声令下，锦衣卫特务蜂拥而来，棍棒皮鞭，捆打捕拿，转眼工夫捉了一百三十四人，一齐下到狱中。

这一次皇帝大打出手，前后共逮捕各司官员二百二十人；对为首的丰熙等八人严刑拷讯，充军边疆；四品以上官员一律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共一百八十多人全部处以廷杖之刑，翰林编修王

思、王相，给事中裴绍宗、毛玉、张原，御史胡琼、张曰韬，郎中胡琏、杨淮，员外郎申良、高平，主事余禎、臧应魁、仵瑜、张澡、殷承叙、安玺、司务李可登等十八人被打死。

嘉靖皇帝一顿鞭打，朝廷顿时万马齐喑。打完了大臣，朱厚熜下旨：尊其生父兴献帝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并上册宝。立刻将兴献皇帝的神位从湖广安陆迎至宫中，奉谒奉先、奉慈二殿。

到这时候，天下再也没人反对嘉靖皇帝了。

天下，真就是皇帝一家之天下吗？真就任由皇帝胡作非为吗？难道统治者立下的魔咒真就破除不掉吗？也不是。就在皇帝捕杀大臣的时候，在山阴老家讲学的阳明先生，已经从哲理上把这个魔咒给破解开了。

艮，原是泰州来的一个盐丁，穷苦出身，靠着做买卖赚了些钱，论出身和学问，他都不及那些举人、进士出身的同窗们，可这个王艮淳朴勇猛，悟性又高，在阳明的学生中反而成了翘楚，阳明先生极喜欢他。

这一天王艮到外面去玩，回来时满脸喜气，告诉先生今天碰到一件稀罕事：“见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先生回了一句：“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有一次讲学时，阳明先生对弟子们说：“人的胸中各自都有一个‘圣人’，只是因为你们的自信心不到，硬是把这‘圣心’埋没了。”然后就对弟子夏良胜说：“子中，你的胸中原是一个‘圣人’！”

一句平常的话，竟把夏良胜吓得跳了起来，

赶紧说：“不敢当不敢当！”

见自己的弟子这么窝囊，阳明先生不高兴了：“这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你推辞什么！”

夏良胜已经被“圣人”二字吓傻了，缩着头只管说：“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王阳明有点恼火了，厉声说：“这是众人都有的，你心中也有，你在这跟我‘谦让’什么！推辞也推不掉呀！”

夏良胜倒也是个聪明人，忽然一下子明白了阳明先生说的“胸中的圣人”，其实就是“良知”的意思，这才笑着接受了。

见夏良胜明白过来，阳明先生也高兴了，就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

夏良胜也有所领悟了：“我们平时忘却良知，
449 只是因为良知被物欲遮蔽，其实良心在我们心里，

永远不会失去。这就像乌云遮住太阳，可太阳并不会消失。”

“满街都是圣人”的话听起来很惊人，其实说穿了，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良知，理解了致良知的道理，明白了“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有了这些基础，再推出“满街都是圣人”的口号，又有什么稀奇呢？

什么是圣人？原来良知就是“我们心中的圣人”，只要我们依着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口号去做，让自己的行为与良知合为一体，我们自己就成了“圣人”。只要我们紧紧握住良知，不畏惧，不退缩，以良知指引人生的道路，那就人人都是圣人，满街都是圣人。

嘉靖皇帝放纵人欲，他当然不是圣人；大臣们只知道维护“祖制”，根本不关注人民的利益，

也不是圣人。皇帝不是圣人，大臣不是圣人，反而社会上“满街都是圣人”，所以天下人都有权监督皇权，指责邪恶。

“道，天下之公道；学，天下之公学。”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不要推脱，不要害怕，不要试图蒙昧自己的良知，把头抬起来，找到自己的良知，然后拍着胸口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圣人”。有了这个勇气，百姓们才能真正拥有做人的尊严。

可在大明朝，像王阳明这样敢于正视良知，坚持原则，敢拍着胸口说“我原是一个圣人”的人，能有几个？

拍一拍胸口，叫一声“良知”，喊一个“我”字，如果你忽然精神一振，似有所感，那就是良知正被唤醒。

人的两条腿。没有火炬，任你有两条腿，也不可能在黑暗中走出一条路来；可光有火把，却不肯抬腿走路，也等于无用。

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天下人个个有良知，也都在渴求良知，呼唤良知。所以阳明心学这个精纯的“良知之学”很快就在大明朝的学子中流传开来，同时，也渐渐引起了统治集团的警觉。

二 成圣只是一瞬间

嘉靖皇帝在朝廷里清算大臣的时候，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黄绾和老朋友席书都在朝廷里做了大官，各自拉帮结派，和刚得宠的张璁、桂萼以及因为重臣缺失而被⁵⁴推举出来补阁臣之缺的

杨一清互争高下，几派势力时进时退，斗得不亦乐乎。为了增加人气，这些阳明弟子们迫切需要拉人人伙，而要想多拉些人，最要紧的就是先把阳明先生拉进来。

弟子们想捧王阳明。可阳明先生功劳大，地位高，有威望，加之人生经历丰富，心思澄澈，头脑冷静，什么计谋都见识过，方献夫、黄绾这些弟子们想利用他没这么容易。虽然这些人一次又一次来找王阳明，向他“请教”议大礼的事，希望他赞成“议礼”，说一句讨好皇帝的话，只要有这么一句话，众弟子们再内外一哄，就能把阳明先生抬进内阁。可王阳明对议大礼之事始终不置一词，又写信给方献夫等人，告诉他们不要再想方设法让他入阁了……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阳明先生一心求静，
可弟子们私底下的活动却一刻也不停。到嘉靖六

年（1527），终于没事里闹出一件事来。

赶走内阁老臣之后，嘉靖皇帝任命杨一清为首辅，而靠着“议大礼”爬上来的两个小人张璁、桂萼此时都已经挤到了内阁门口，就看什么时候入阁了。张璁本以为自己是“议礼派”的头号功臣，嘉靖驾下的第一号宠臣，杨一清上台之后一定会和他结党，两人互相帮衬。想不到杨一清并不理他，而是把孝宗朝的著名阁老、时年已经八十岁的谢迁请了出来，举荐谢迁入阁，硬把张璁丢在一旁。吏部尚书桂萼又是出了名的小人，为了争权，逮谁咬谁，真正是“人嫌狗不理”的货色，还没入阁，就已经在私下和张璁大打出手，内斗不止。

到这个地步，张璁最着急的就是赶紧找一位有分量的重臣拉进内阁和他结党，上斗杨一清，下斗桂萼。张璁和王阳明是同乡，以前张璁不得意的时候曾在家乡办过一个罗峰书院，因为这层

关系，他和心学宗师王阳明有过一点交往。于是张璁决定把王阳明捧起来。

也在此时，广西思恩州土司岑猛和朝廷起了冲突。

广西是个偏远贫穷的省份，省内划分出很多土司，其中以岑氏土司势力最强，思恩州、田州两处土司都是岑姓，却一直不合，互相攻杀。朝廷则一直想在当地改土归流，于是趁思恩州、田州土司火并的机会攻取了思恩、田州两府，顺势撤掉了原来的土司，改派朝廷官员为知府来管理两府。原本田州土司的后人岑猛被朝廷降职为福建平海卫千户，失了土司之位。可岑猛并没离开广西，一心寻找机会恢复祖宗家业。到刘瑾专权的时候，被废掉土司之位的岑猛想办法贿赂了刘瑾，终于重新当上了田州府同知，兼领府事，实际上恢复了田州土司的世袭职位；又靠着给朝廷

当雇佣兵，打仗立功，升了田州府指挥同知。这时候岑猛觉得是该恢复祖宗基业了，在田州治下原来有一块土地叫泗城，田州大乱之时被旁边的土司割走了，岑猛就派兵连番攻打，想把祖宗之地夺回来，想不到这件事惹怒了朝廷，广西都御史姚镆率大军八万攻打田州。

姚镆这个人非同寻常，是出了名的能征擅战，嘉靖元年曾在泾阳大破蒙古骑兵。这一次朝廷借着广西战乱的机会派出姚镆，其实是嘉靖皇帝刚刚驱逐了内阁旧臣，闹得天下物议汹汹，想借一场战事遮丑，显一显自己的文治武功。

田州土司岑猛虽然骄横，却也知道姚镆此次前来征讨，后台极硬，自己无论如何斗不过人家，就赶紧上奏向朝廷解释，求皇帝宽恕。可眼前这一仗已经成了“政治仗”，岑猛早就断了退路。
456
姚镆大军冲进广西，先杀了岑猛的儿子岑邦彦，

岑猛不敢和官军交战，也禁止他的部属出战，只是一味躲避，最后走投无路，只好跑到归顺州投奔了他的岳父岑璋，可岑猛却不知道，自己因为这些年怠慢了妻子，岳父岑璋心里恨他，姚镆又派人来贿赂岑璋，结果岑璋把自己的女婿毒死，首级献给姚镆，姚镆就向朝廷报捷，撤销了岑氏的田州土司世职。

然而岑猛的死并没给当地带来和平，相反，由于嘉靖皇帝妄动刀兵，采取高压政策，反而在当地引起了反弹，思恩府砦马土目卢苏、田州丹良堡土舍王受领兵造反，重新占据了田州，姚镆只得又集结兵马准备征剿。但这一次广西当地百姓是真的造反了，当地民情汹汹，难以控制，面对如此时局，姚镆是既没精神又没办法，广西叛乱陷入了僵局。

来，打算请这位文武全才的大宗师出山平定叛乱，这样王阳明可以借着军功入阁，而张璁也靠“举荐”之功入执内阁，再与王阳明联手，足可以对付桂萼，甚至连杨一清也能扳倒。

张璁的一番鬼心思王阳明心知肚明，如果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王阳明肯定会拒绝去广西赴任，可阳明先生看问题的视角是从百姓利益出发。

王阳明知道，这次广西事件纯粹是官逼民反，这一仗要是由别人来打，一定会调集重兵在广西杀上几个来回，不知要死多少人，只有自己去，也许可以想办法招抚当地百姓，罢兵休战。

是啊，广西这一仗要是别人来打，不管怎么打都会血流成河，只有阳明先生可以抛开“政治”考虑“人民”，透过“战争”看到“和平”，只有他才能真正平息这场战祸。

九月初八，阳明先生接受了两广巡抚的任命，离开山阴老家启程去广西赴任。十月，他的官船到了江西南昌，这是他当年苦心维持过的地方，这里的百姓也还记得他，听说阳明先生到了，百姓们自发地聚到江边守望，拦住王阳明的官船，请阳明先生上岸，进城看看。

此时王阳明公务紧迫，加上身体又不好，本想推辞，可是南昌百姓早已经替他着想，做了准备，专门扎了一个竹轿请王阳明坐上，却没找专门的轿夫来抬轿子，而是百姓们自己用手托着这乘简陋的小轿，走几步就换一拨人，这样一步一步把阳明先生送进了章江门。

进了章江门，王阳明也愣住了。原来南昌城里的百姓都走出家门，却没有锣鼓喧天，也未设香案，没有跪拜，十几万老百姓就这么静静地站在路边上，等着这位用性命拯救了南昌城的前任

巡抚从自家门前经过。阳明先生的轿子到了面前，百姓们就伸一把手，托着轿杆，再传给后面的人，就这么一个一个地往后传递着，直把南昌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个遍。满城的百姓都走了出来，微笑着和阳明先生见了一面，这乘小小的竹轿又从章江门抬出城，回到江边上，百姓们恭送阳明先生登船。

阳明先生在南昌城里转了一圈，这本是一件小事，可因为参与的百姓人数众多，十几万人都出来“抬举”他，倒让这件小事变成了一件大事。就像一首白话小诗里说的：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¹⁶⁰很高，很高。

就在南昌城里受抬举的这一瞬间，王阳明成了“圣人”。

圣人，不是头衔，只是一个“瞬间”。在这之前，此人不是圣人；事件之后，他也不再是“圣人”了。当年孔子为天下人奔走呼号，在郑国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凄凄惶惶地站在城门外，郑国人笑他是个“丧家狗”，这一瞬间，孔子是一位圣人。

战国年间天下大乱，法家兴起，杀人如麻，孟子拼了自己的性命站出来，指着梁惠王的鼻子骂这帮吃人的诸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一瞬间，孟子是一位圣人。

而王阳明被南昌百姓们抬着在城里走了一遭，这一瞬间，阳明先生是一位圣人……

仁，就是“爱人”；义，就是“良知”。能做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听凭良知的

引导，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不惜一切，仁至义尽，就成了“圣人”了。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做起来可真是不容易，要有大勇气，能“破心中贼”才行呀。

三 从心所欲不逾矩

早年孔子曾对自己的一生做过总结，自言“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这“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个非凡境界，意思是说随心所想，随手行事，自然而然，却又处处合于天理良知。

孔子一生从不自称“圣人”，只在去世以前说了一句“哲人萎乎”⁴⁶²，自称哲人，这个称号

孔夫子绝对配得上。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仍被后人视为圣人境界。这年阳明先生五十六岁，精研天理良知二十年，已深得其中三昧，此番临危受命去广西公干，一路所作所为，只有这七个字可以为赞：从心所欲，不逾矩。

十一月二十日，阳明先生到了广西梧州，开府办公，广西布政使林富在此迎接，阳明先生把广西叛乱的情况仔细询问了一遍，果然像他以前分析的那样，广西事件其实就是朝廷在当地强行压制土著，改土归流，官逼民反，至此，王阳明已经下定决心，招抚卢苏、王受，以和平方式解决广西叛乱。

把计划想好之后，王阳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顾朝廷命令，自己做主招抚卢苏、王受，
463
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结束广西乱局。

拿定主意后，王阳明立刻解散了已经调进广西的湖广、江西、福建三省兵马，只有驻扎在南宁附近的湖广永顺、保靖两府土司兵因为路途遥远，暂时留在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同时派人去见卢苏、王受，让他们带着部下出来接受招抚。可卢苏、王受知道王阳明素来多智，怕他使诈，不敢出来受抚，而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请王阳明离开梧州，到紧邻思恩府的南宁来受抚，同时卢苏、王受也准备带齐全部兵马赶到南宁，向阳明先生投诚。

大明朝廷连续几年用残酷手段镇压当地人，卢苏、王受对朝廷的招抚有疑虑，这也是难免的。可王阳明想要招抚他们却是出于一片诚意，毫无欺诈之心，听了对方的要求后，立刻就从梧州赶到南宁。此时卢苏、⁴⁶⁴王受已经带着七万大军开到南宁城外驻扎，声势惊人，王阳明却毫不惊慌，

而是打开城门，请卢苏、王受于七月二十七日进南宁受抚。

到这时候卢苏、王受才相信王阳明的诚意，也知道自己终于有了活路，军营中七万人齐声欢呼。第二天，卢苏、王受带着少量随从进了南宁，王阳明坐在堂上，先瞪起眼来训斥他们：“你们虽然并未谋反，可是你们无故阻兵负险，截断道路，使数万百姓家属离散，已经扰攘了两年之久；又因为你们闹事，烦劳朝廷发下官军，耗费粮饷，三省军民百姓都因此受苦，你们还不知罪吗？”这一套话表面是在斥责，其实倒是在替卢苏、王受开脱责任。接着王阳明又命令杖打两人各一百下，却是下堂去让他们带来的人自己打，也就等于把这两个人都饶恕了。

之后王阳明又答应立岑猛之子岑邦相为土司，
卢苏、王受十分满意，立刻把手下的七万人马遣散，

各自回乡务农去了。

至此，思恩、田州两府历时多年的动乱就这么静悄悄地平定了，未打一仗，未杀一人。卢苏、王受对王阳明尊崇至极，甚至私下提出：王大人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帮忙”的，尽管开口。

两个土官说这种话，其实是暗示他们愿意献给王阳明一大笔金钱，可王阳明从来不是个贪财好利的人，对钱没有兴趣，只是吩咐卢苏、王受准备一支兵马，随时听候调动。

这时王阳明已经下了决心，准备进剿断藤峡、八寨两处贼巢。

在到广西的路上，王阳明曾遇到当地百姓拦路喊冤，问过情况之后，却发现这些人不是来告卢苏、王受，而是请求这位新到任的巡抚帮助剿灭断藤峡和八寨的山贼。⁴⁶⁶到梧州后，王阳明又从

当地官员口中得知，断藤峡、八寨两处山贼作恶多端，为害一方。待招抚了卢苏、王受之后，他又向这两个当地的土官打听断藤峡的消息，结果众口一词，都说断藤峡和八寨一带盘踞着一股凶猛的山贼，从明朝建立之时就已开始为祸，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断藤峡地处黔江下游，在思恩府和浔州府交界处，此处正当广西腹地，峡谷深有百里，山高林密，道路奇险，悬崖耸峙，山路千盘，临江绝壑，万夫莫开。再加上当地交通闭塞，瘴气厉害，大队官军难以进入，而且山贼又凶悍异常，擅使毒弩，中人立死，官军对他们十分畏惧。

断藤峡的匪帮在地势上又与牛肠、六寺、磨刀、花相、仙台等八寨相连，自浔州府大藤江一直延伸到思恩府、柳州府、庆远府，绵延一千多里，周边为祸五六百里，四处劫掠，“岁无虚月，

月无虚旬”，见寨就入，见人就杀，不但百姓深受荼毒，当地的土司也恨透了他们，是广西境内第一大害。

对这样一股凶恶的山贼，朝廷也非常重视，曾经几次召集重兵进剿，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成化年间都御史韩雍率十六万大军进剿，可大军进山之后却根本摸不到山贼的影子，只好撤兵。想不到官军刚走，山贼竟从山里杀了出来，一举攻克浔州府，占据府城大闹一场，广西为之震动。其后当地的岑氏土司也曾率领几万狼兵进山追剿，费了天大的力气，却只斩回两百颗首级，到最后实在熬不住了，只好退兵而去。

就是这样两路山贼，在当地为祸已有百年，谁都无法制伏他们。现在王阳明来到广西，平定了当地的叛乱之后，⁴⁶⁸为百姓们着想，决心利用手中的五千广西狼兵、六千湖广土兵，一鼓作气把

这两股山贼彻底歼灭。

十几万大军屡次攻打都对付不了断藤峡的土匪，王阳明这个初来乍到的官员，仅用极少的兵力，就能消灭这些凶悍的山贼？这个想法看似不可能，实际用起兵来，却摧枯拉朽，顺利异常。

王阳明用兵的特点是不计较兵力，不在乎以多取胜，而特别擅长突袭、奔袭。由于他不注重兵力，所以调动部队的规模都很小，一般不会引起对手的注意，而王阳明也很注意隐藏兵力，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南赣剿灭象湖山土匪时，他以“护送广东布政使”为名，率领精兵远走广东，绕行福建，奇袭象湖山，一举成功，这次阳明先生用的计策，与早年那一仗如出一辙。

早先王阳明遣散湖广、江西、福建三省兵马时，
唯独驻扎在南宁的一支部队被留了下来。这些人

是湖广永顺、保靖两个土司的部下，也是凶悍敢战的土兵，算得上是官军中的精锐。王阳明留下他们，找的借口是南宁府离湖广太远，这些土兵要回湖广必须横穿广西全省，路上不好走。而阳明先生的实际目的就是留这支精兵去攻打断藤峡。同时王阳明又命刚刚归顺的卢苏、王受各领一支兵马赶到宾州屯驻，在不动声色间，兵锋已经指向八寨贼巢。

卢苏、王受手下的土司兵也不同凡响，正是那支和湖广土兵齐名的广西狼兵，丹良堡土舍王受手下的兵马尤其凶猛，有这两支精锐的部队在手里，王阳明很有信心能解决断藤峡的匪患。

一切安排就绪，嘉靖七年（1528）二月底，王阳明一声令下，南宁城下的湖广土兵先动了起来，乘船沿郁江而上，对外声称准备返回湖广，₄₇₀其实却在悄悄向大藤江方向开进。同时王阳明自

己也坐了官船跟在土兵后面，名义上是监督他们，其实是和这些人一起悄悄向断藤峡摸了过来。为了把戏做足，王阳明又专门给沿江各府县传下命令来，命他们严密督促土兵，不准这些人上岸生事。其实不准土兵上岸，主要是为了保密，同时也提高效率，加快土兵的进兵速度。在王阳明的督促下，士兵的行进速度极快，从南宁出发直到攻破断藤峡，其间没有一天休息。而王阳明自己却为这场高效率的战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年王阳明已经五十七岁了，年轻时他的身体就不太好，有肺病的病根子，这次从浙江到广西，路途遥远，饮食不调，水土不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现在为了突袭断藤峡，王阳明和土兵们一起行动，整整在船上住了一个月，这一路走来天气越来越热，⁴⁷¹走到贵县的时候已经三月中旬了，春末夏初，暑热难当，加上潮气熏蒸，他

身上的旧疾逐一发作：先是咳嗽得厉害，整日整夜不停，继而又受了炎毒，身上一片片红肿起来，瘙痒难忍，口干舌燥，头疼身沉，有种说不出的难受。等土兵们终于赶到战场的时候，阳明先生已经病势沉重，步履艰难了。

四月初一，土兵们到了浔州府桂平县，白天靠岸休息，当天夜里悄悄登船驶进了大藤江，四月初二在龙村埠登岸，立刻又分两队向大藤峡疾进。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山崖石径、深谷溪坑，这些土兵们都是山里长大的，惯走山路，一个个走得飞快，可王守仁又瘦又弱，又咳又痒，实在跟不上队伍，只好叫人扎了个轿子抬着，咬着牙往深山里走。眼看山寨就在面前，王阳明又想出一条奇计：命令土兵不要夜袭，而是在下午四五点钟最热的时候对山寨发起攻击。

地势复杂，林木茂盛，在这种地方发动夜袭，山贼遭到打击之后很可能一哄而散，逃进林莽深处，达不到歼敌的效果。而挑选一天里最热的时间进攻山寨，成了真正的“趁热打铁”，山贼做梦也想不到深山里忽然冒出一支官军，而且在大太阳底下突然进攻，一下杀到眼前，此时这些贼人都在屋里避暑，根本没发现对手摸了上来，毫无防范，一战就被杀得大败。经过连番恶战，所有山寨一处接一处都被土兵攻了下来，断藤峡一带的匪患被基本肃清了。

消灭断藤峡山贼之后，王阳明立刻转到宾州，于四月二十二日指挥卢苏、王受的狼兵衔枚急进，“所过村寨，寂然不知有兵”，一直摸进了八寨。

这些狼兵都是本地人，既熟悉地形又适应气候，他们本来又都是朝廷的雇佣兵，常年打仗，能征擅战，加之八寨山贼没有提防，一下被狼兵

突破险隘攻了进来。

随后这一仗打得异常残酷，狼兵们攻山破寨一路追杀，最后把几千山贼全赶到横水江边，人多船小，又赶上风雨大作，山贼为了逃命争着登船，混乱之中，所有小船都倾覆在江中，渡江而逃的山贼大半淹死，留在岸上的大都被狼兵所杀。

八寨这一战打得太凶了，狼兵因为是本地人，和八寨的山贼仇恨更深，对他们毫不留情，几乎是斩尽杀绝，王阳明也阻止不了。眼看很多人逃进了山林，卢苏、王受提议搜山，可此时下起了大雨，而且一连下了十几天，等雨停后进山搜索，发现男女老少几千人都病饿而死，尸体层层叠叠堆满了山洞石谷，惨不忍睹。

断藤峡、八寨之战，⁴⁷⁴王阳明共调用土兵六千，狼兵五千，短时间内就平定了百年难平的

匪患，实在是立下奇功一件。大战结束后，阳明先生正在处理善后事宜，却忽然接到一封从京师来的信，这封信是吏部尚书桂萼写来的，主要内容是请他率领重兵出广西，征讨安南。

明武宗正德年间，安南国大臣莫登庸倚仗强兵挟持了安南的黎朝皇帝，准备篡位。后来黎朝皇帝派使臣来请求纳贡，希望得到大明朝廷的帮助，却因为安南国内大乱，明朝使节未能成行。其后黎朝的黎昭宗又派使者向明朝求救，却被莫登庸半路阻截。

到嘉靖六年，莫登庸废除黎朝皇帝，自立为帝，建立莫朝。嘉靖七年，也就是王阳明在广西征战的时候，莫登庸派使者到北京朝贡，声称黎朝皇室已经绝嗣，莫朝受百姓拥戴，请求朝廷册封莫登庸为安南国王。但此时大明朝廷已经获知莫登庸篡位之事，⁴⁷⁵嘉靖皇帝大为震怒，斥责了安南使者，

威胁要派军队讨伐莫登庸，而桂萼就抓住这个机会派人给正在广西平乱的王阳明通了消息，希望阳明先生率领大军直出广西，杀进安南，解决莫登庸，以立一场大功。

率领大军进攻安南，这是比平定广西之乱更大的军功。桂萼因为和张璁争宠，一直把阳明先生视为政敌，现在忽然把这么一场大功平白送到阳明先生手里，到底是什么用意？

其实桂萼这么做是有两个目的：一是借这场战功把王阳明拉到自己这一伙里，孤立张璁；二是王阳明文才武略，弟子众多，实在是个有分量的角色，桂萼也希望能由自己引荐王阳明入阁，然后与王阳明联手，先整垮张璁，然后再回过头来收拾杨一清，夺首辅之位。

桂萼是个比张璁更卑鄙的小人，这样的人，
王阳明根本不想理睬，如今广西局势刚稳定下来，

百姓们稍稍安定，连乡村的耕作都尚未恢复，忽然调集大军远征安南，真是莫名其妙，所以王阳明立刻拒绝了桂萼的要求。

可这么一来，阳明先生的处境就恶化了。他这个无心做官的人，现在却成了朝廷三派势力较量的焦点。

四 良知失败了？

大明帝国，生长在一块自古就被各种奸诈和谋略浸透的土地上。在这里，皇帝手中握着政权、神权、军权、特务权、人伦权……他是一切权力的核心；是苍天的儿子，活着的神；甚至还是天下所有人的“父亲”。在这个政治就像一片沼泽地的国度里，表面看来好像坚实可靠，其实内里

已经腐烂成了一潭臭水，像良知、正直这些有重量的东西一律无处立足，而且正直的人们越是搏斗，就陷得越快、越深。

建立在政治泥沼和哲学荒漠上的大帝国，历史虽然古老，但治国手段却最不文明；重臣们表面上虽然饱读诗书，和蔼迂腐，心地却绝不善良。文官集团之间的党派纠缠、裙带关系异常复杂。在这团乱麻里，不小心牵动任何一个线头，都可能引来一场毫无理性的政治迫害。阳明先生这次去广西平叛，只是为了拯救一方百姓，既不要官，也不要钱，更不打算人什么阁，可哪里想得到，他这一出手，竟是狠狠撞进了朝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所有权臣的利益都被他触动了。

虽然阳明先生来广西平叛，并不是为了给张璁捞取战功，可毕竟他这次复出是张璁引荐的，
478现在他又一口回绝了桂萼的请求，在桂萼这个小

人看来，王阳明不肯征安南，就是不肯和他站在一条船上，因为他信奉的原则是：但凡不是朋友的，就一定是敌人。于是桂萼把阳明先生视为死敌，尽力陷害。

内阁首辅杨一清此时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嘉靖皇帝专宠小人，张璁、桂萼正在得势，这两个人的目的都是取杨一清而代之，夺首辅之位，所以杨一清既讨厌张璁，又厌恶桂萼。现在王阳明这位大功臣忽然复出，却是张璁引荐，桂萼又在拼命拉拢，加上方献夫、黄绾这几个阳明的弟子在后面鼓吹，把声势造得很大，使得杨一清误以为王阳明复出，也是要来找他的麻烦，于是杨一清在心里也悄悄提防起阳明先生来了。

无形中，王阳明既得罪了吏部尚书桂萼，又得罪了内阁首辅杨一清。而首先对王阳明发难的竟是杨一清。

杨一清是个正直的好人，也是能臣，可杨一清也有自己的私利。他当上首辅的时候不肯和张璁结盟，也不与桂萼勾结，但不与小人为伍，就成了小人的敌人了。张璁、桂萼联手杀来，杨一清是吃不消的。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小人还没有完全得势，先分化这两个家伙，让他们自己撕咬起来，杨一清才能坐山观虎斗，得一个安宁。

现在张璁要拉王阳明入阁，杨一清意识到：如果王阳明入了阁，张璁势力大涨，而桂萼终究是要入阁的，那时候自己拉来的伙伴谢迁就站不住了，谢迁一走，内阁里三个同事都是自己的对头，杨一清也就站不住了。反之，如果此时能用一个计谋，既拦住王阳明入阁，又激得张璁、桂萼互相争斗起来，那就两全其美，再好不过了。

杨一清这位老臣手腕高明，并不亲自出马打击王阳明，而是静观其变。直到阳明先生平定了

广西之乱，张璁上奏替阳明先生请功，嘉靖皇帝也准备重用阳明先生，来征求杨一清这个内阁首辅的意见时，杨一清才上了一个揭帖，说王阳明“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新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但可用为兵部尚书”。这个揭帖从表面听来似乎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话说得模棱两可：虽不入阁，兵部尚书还是可以做的……暗中却是在给桂萼递话。

内阁的椅子就那么几张，杨一清是首辅不必说，被他拉进内阁的谢迁也坐了一把，张璁在“议大礼”的时候出力比桂萼大些，要入阁必是张璁先人，所以他“预订”了一把，剩下一把椅子如果王阳明坐了，桂萼就没得坐。现在杨一清说王阳明“不宜入阁”，就是在向桂萼暗示：与其支持王阳明而让张璁得势，我宁可支持你。

他已担任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手底下颇有一班亲信，上面又有杨一清托着，桂萼立刻布局，开始打击王阳明。于是顺理成章地，朝廷里就有一个叫聂能迁的锦衣卫千户跳了出来，在前面鼓噪，满嘴风言风语，给嘉靖皇帝上奏章，说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复出征讨两广，是因为他暗中拿出“百万金银”贿赂了张璁，明打阳明先生，暗中给张璁下刀子。

这个聂能迁只是桂萼手里的一个卒子。按照朝廷里给人栽赃的程序，一般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让下级小官出来“闹鬼”，胡扯出一个不太可靠的罪名来造一个声势，在皇帝不提防的状态下先告诉朝廷里的同党战斗已经开始；第二步，由同党里比较有能耐的官员出来上奏，这一次就要罗列重罪，少则七八条，多则几十款，热热闹闹端

到皇帝面前，同时又有三五个言官在旁边助威，渐渐造起声势，这叫“预热”；第三步，这一党系的头号大佬自己跳出来，带头上奏，其他重要角色也一起出动，里应外合，造成巨大的舆论声势，争取几天之内把政敌打倒……

眼下桂萼玩的就是这一套把戏，先让一个锦衣卫千户出来放风造势。可他真没想到，他的对手张璁也深明此道，看见第一步就猜出了后面的花活。朝廷中又有方献夫、黄绾两个人也都是“议大礼”得势的角色，而这二位都是拜在王阳明门下的学生。眼看桂萼要用毒计迫害王阳明，阳明先生一倒，他门下的人都要倒，举荐他的张璁也要倒，于是张璁和方献夫、黄绾瞬间就抱成一团，商议之后，由三人中官位最低的詹事府少詹事黄绾出来上奏，严厉驳斥聂能迁，⁴⁸³张璁、方献夫等人也趁机一起在皇帝面前使劲，竟把聂能迁下了

锦衣卫狱，活活打死。

这一场恶斗，张璁一派打败了桂萼，桂萼哪肯罢休！立刻转而和杨一清联手，而杨一清正要看着张、桂交恶，自己从中渔利，就悄悄帮了桂萼一把，合二人之力，把黄绾从詹事府少詹事的位子上赶了下来，扔到南京去坐礼部右侍郎的冷板凳了。

官场，是一潭真正的污泥浊水，任谁踏进一只脚去，整个人都会给弄脏搞臭。王阳明根本没想踏入官场，但却在这几个能臣、佞臣、奸臣布下的连环套里越缠越乱，越陷越深，莫名其妙地栽了进去，也真是够冤枉的。

前一轮恶斗，张、桂两派弄了个两败俱伤，桂萼不肯罢休，很快又亲自跳出来向阳明先生发难，硬说他在广西自作主张，朝廷命他去征讨思田之乱，⁴⁸⁴他偏要招抚；没让他进剿断藤峡，他偏

要用兵；又说断藤峡一带积年惯匪，朝廷征讨了多少次都不能建功，王阳明一抬手就把这些盗匪全都平了，如此战功，岂不可疑？

说到战功可疑，桂萼这里自然就又提起当年阳明先生消灭宁王之时传出来的一些“旧话”：王阳明和宁王是不是暗中勾结？宁王财宝是不是都被王阳明贪了？征讨宁王的战功是不是有可疑之处？

由此桂萼又产生了一个“联想”：王阳明长年累月在家乡讲学，讲的都是什么学？连首辅杨一清都说他的学说有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吏部尚书桂萼和首辅杨一清在北京拆台，王阳明平定广西的功劳顷刻间化为乌有。尤其是这些人的陷害让嘉靖皇帝对阳明心学的内容起了疑心，这就为阳明心学的被禁埋下了伏笔。

朝廷这些阴森的变局，正在广西的王阳明毫不知情。此时他已经平定了断藤峡、八寨的匪帮，处理好了广西的政事，自己的身体也撑不住了，咳嗽胸闷，炎毒人体，浑身赤肿，脚上也生了一个恶疮，感觉病势日重，就上奏请求辞职养病。却哪里想到，奏章被桂萼悄悄扣了下来。

桂萼是暗算的老手，眼看王阳明得了重病，立刻又想出一个主意，让王阳明担任两广巡抚，在广西多待几年，希望能把他的身体拖垮，如果拖死了，那是最好。

桂萼的最后一条毒计，竟然实现了。

这时候王阳明的身体已经垮了，再也顶不住了，连番上奏请求致仕回家养病，可是所有奏章都没有回音。无奈之下，⁴⁸⁶阳明先生干脆把军政事务交给广西当地官员，也不等朝廷下旨，就自作

主张上了船一路返回浙江。此时阳明先生病势沉重，再也支撑不住，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江西南安府上庾县的青龙浦码头，临终之时留下一句遗言：“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先生的遗言是很有意思的。临终之时说出“我心光明”，显然是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自正德元年上奏获罪，到嘉定七年平定广西，这些年官场浮沉，时时依良知，事事循天理，从未有亏职守，从未有负人民。

至于君主，王阳明已经把这一层看透了，也看淡了。在庐陵县他替百姓抗税，在江西他为百姓阻击皇帝，现在平定思田的时候他不肯杀人，这是又违了皇帝的旨。在阳明眼里，在天理良知面前，“圣旨”这路东西已经不值什么了。

对大明朝，阳明先生无话可说，说了也无用。
对后人，阳明先生也不必说什么，阳明心学在这里，

“良知永不泯灭”在这里，“知行合一”在这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这里，“四句教”在这里，后人自己去看吧。

阳明先生去世后，桂萼上奏称王阳明擅离职守，嘉靖皇帝“大怒”，命大臣议王阳明的罪。桂萼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上奏指责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建议嘉靖皇帝“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桂萼这番话正合了嘉靖皇帝的心思，立刻下令革去阳明先生的新建伯爵位，禁止心学。

教出那么多弟子，到后来星落云散。阳明心学虽然一度流传甚广，但其真谛却被后学弟子们歪曲了，导致阳明心学越传越滥，越讲越偏，日益衰败，到明朝灭亡时，这个学说也基本消失了。

难道良知就这么失败了吗？

是的，在大明朝，良知失败了。

阳明先生去世之后，阳明心学被禁止了，几十年后又开禁，但已经变了味道。王阳明最厌恶、最痛恨的“训诂辞章、考据记诵”竟然占据了心学的主导，心学弟子们不再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精英，而变成了另一类腐儒。为了能够“腐”得彻底，“儒”到酸臭，这些王学弟子们一个个急着考据、辩论，把阳明心学弄得论述浩繁、考证精细、辨析日详、流派纷杂，仅一个“良知”，就搞出了“现成良知”、“知解良知”、“本体良知”、
“发用良知”、“本然良知”……到这时候，良

知不再是“指引人性”的工具，倒成了书呆子拿来显摆学问的道具。

至于门派，这个中国人最劣根的毛病，王阳明的弟子们也把它发扬得淋漓尽致。其中王阳明的山阴同乡、高足弟子王畿建立了“浙中王门”，大讲“四无”；阳明在江西讲学时收的弟子们则搞了个“江右王门”，这一派多是做官的人，其内部又分化出以聂豹、罗洪先为首的“归寂派”和以欧阳德、邹守益、陈九川为首的“功夫派”。

在王阳明的后学弟子们分出的这些门派中，最有活力的要算“泰州学派”，这一派起自阳明先生的另一位高足弟子泰州人王艮。王艮三十八岁到江西追随王阳明，阳明先生去世后，王艮返回泰州开门授徒，因为他本是社会底层出身，身上的书呆气少，勇气倒多，所讲论的“良知天性，490古往今来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

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阳明先生的功夫。

后来又出了一个李贽，干脆对孔孟大加批驳，认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这些话在当时听来真是不可思议，立刻就被斥为“异端”，但仔细听来，李贽这里所说的却正是王阳明提出的“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难怪大儒黄宗羲说泰州学派这些学子们能“赤手搏龙蛇”，搏斗而死，也算是不虚此生了。

后来心学没落了，消失了。

有趣的是，随着心学的没落，庞大的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大明朝廷在挥起屠刀砍杀“良知”的时候，其实也用这同一把J1，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五 理解“四句教”

阳明先生虽然去世了，可阳明心学毕竟已经成为一个体系，传于后世，而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王阳明在出征广西之前留给弟子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按王阳明的话说，“四句教”是个“彻上彻下的功夫”。自从“四句教”被提出的那一刻，人们就看出来，这四句话其实可分成两部分：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一个单独的部分，而后三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则是另一部分，这两部分有一种有趣的联系，也就是说：没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可以单独运作；而没有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却不能单独存在。

为此，王阳明专门警告弟子：“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就是告诉弟子们：宁可只琢磨后三句而忽视第一句，也不能只琢磨第一句而忽视了后三句。

既然知道“四句教”分成两部分，又知道第二部分可以单独运作，那就先说这第二部分。其实这三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第二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人在社会上会遇到各种事情，做出无数判断，这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喜欢此人，讨

厌被人”，“支持这个观点，反对那个观点”的意识，这种“善恶是非观”是必然会产生。

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当我们对一件事进行善恶、是非的评价时，以什么来引领自己的心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呢？良知。“良知”告诉我们这件事是正确的，那件事是错误的；这个人的行为是对的，那个人的行为是错的。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不能因为利益、胆怯、分赃以及种种私心，就昧了自己的良知，硬把不对的事认为“正确”。

在这方面我们常犯很多错误，比如明知道某事不对，却认为“没办法，事情已经这样了”，或者“现实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不妥协怎么办”，甚至可能会说“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但跟着别人做坏事，对我也有好处啊，我觉得也不错”……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当我们用“良知”对一个事件做出了评价之后，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勇敢地支持它；认定它是错误的，就要勇敢地反对它，既不贪图利益而同流合污，也不因为恐惧而妥协，坚持到底，毫不动摇，这种“支持善，斥责恶”的勇气和行为，就是“致良知”。

现在我们知道了，“四句教”的后三句是说：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应该怎样去寻找良知，怎样去正直地、勇敢地生活。

弄明白了“四句教”的后三句，回过头来再看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一句话比较难懂，讲得非常隐晦，但王阳明已经说了：“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关键是，这“未发之中”是什么意思？

“未发之中”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看起来不易懂，其实意思简单。“未发之中”的这个“中”是不偏不倚，公平的意思，按阳明心学的理念，则是由良知引导出来的一种公正的心态，或者更简单地说：“中”即是“良知”。而“未发”，就是说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念头，却还没有把这个念头转化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产生念头和制订计划之间的这个小小的“意识空隙”，叫做“将发，而又未发”。

当人心里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谈不上好或坏，也就是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举例来说：比如有人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想买一套房子”，这个念头谈不上是好是坏。但当人们把这个念头扩展为一个完整的计划时，牵涉的内容就多了，比如要买多大的房子？要花多少钱？
496
他手里有没有这些钱？没有这些钱，怎么去“弄”

到这些钱……

这么一来，原本谈不上是好是坏的简单“念头”，变成了一个牵涉极广、至关重要的庞大计划，而其中就涉及善、恶的问题。

以正确的心态制订计划的人，事情会进展得很顺利；而以“私欲”的错误心态去制订计划，则可能因为贪欲、权欲、虚荣心等种种不良心态，使计划出现重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把人引上邪路。

这么看来，“将发而未发”——也就是产生念头、却尚未制订计划的这个瞬间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瞬间，必须用“中”——也就是良知来指引人性，以“良知”为准则去制订计划，才能保证这个计划顺利进行，而不至于把人心引入邪恶。

由此推断，“四句教”的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产生念头却还没

有制订计划的瞬间，是最重要的节点，这时候一定要守住良知，用良知去制订计划，才能保证自己的人生不出现偏差和失误。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表面意思。但从这句话还可以引申出一个更深刻的含意。要弄明白这深层含意，就必须回到十年前了。

十年以前，也就是正德十三年，阳明先生剿匪工作刚结束，在赣州的濂溪书院讲学，门下有一位高足名叫薛侃——这位薛先生在这一年的八月刻印了《传习录》。

在《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天薛侃正在花园里清除杂草，阳明先生也过来帮忙，结果师生之间发生了一段关于“天地间为什么善难以培养，而恶难以除尽”的著名对话，在这里王阳明说了一段重要的话：“须是廓然大公，方见心之本体。⁴⁹⁸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在这里，阳明先生提到了“心之本体”和“未发之中”，只是他用了一个更大的概念来形容“心之本体”，那就是：廓然大公。

“廓然大公”这四个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外四个字：天下为公。而“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其实这四个字引自《礼记·礼运》中孔子说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四句教”第一句的深层意思。

一 阳明心学与禅

禅，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即“禅宗”。据说禅宗之祖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南北朝时，这位高僧来到中国，创立此宗。而禅宗兴起在唐朝，这时禅宗出了两位“六祖”：北派神秀，南派惠能，各以一首偈语闻名天下。

神秀之偈是：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惠能之偈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两位高僧之偈孰高孰低？其实都极为高明，根本分不出高下。所以神秀、惠能一成北宗，主张渐修；一成南宗，主张顿悟，各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齐名于世。只是后来战祸兴起，北宗衰落，而南宗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后世多推崇南宗……这里面的公案就扯不清了。

禅，一个有趣的字眼儿，凡中国人一听“禅”字就显得又热衷又喜悦，似乎这是神秘又可喜的一件好事，但“禅”和阳明心学一挂钩就变了味儿。自明代以来，一直有人拼了命地把阳明学说往“禅”字上扯，而且越扯越近，越扯越乱。

前文已说过，王阳明虽是心学宗师，却并非得自师承，而是无师自通的。他在三十五岁以后经历了心灵磨难，被逼入⁵⁰¹心学之门。在三十五岁之前，王阳明是个倍沾雨露的官僚公子哥儿，仕

途顺利，人生顺利，要官得官，要才有才，于是涉猎极广，博而不精，也没长性，有“五溺”之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这“五溺”是阳明先生年轻时的业余爱好，其中就有“溺于佛氏”一说。于是有一个故事，说王阳明在京城任主事的时候，曾经回乡养病，病好后游杭州虎跑寺，遇见一位闭关的高僧，已经三年不和外人说话。阳明一见他的面就斥道：“这和尚眼睁睁看什么，口巴巴说什么！”一句话喝得高僧起身相迎，可见王阳明于佛家思想极为精通。

确实，阳明精通佛经，在他与弟子、友人的谈话中常会提及《六祖坛经》以及《灯录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涅槃经》、《圆觉经》……诸多经文中的内容字句，在《答陆元静》

文中，他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这里引用的“不思善不思恶”是《六祖坛经》的句子，直接把佛教术语和“良知”概念拉在一起，甚而认为是一回事。而“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一句，其中“无所住而生其心”又是引用《金刚经》的观点。

这样的语句在阳明先生的讲义、信件中有很多，王阳明自己也不隐晦对于佛教观点的诸多认同，于是就有人称王阳明为“阳儒阴禅”，认为他的心学驳杂不纯，不是“正统”，并加以贬斥。

那么王阳明为什么喜欢用佛教思想来印证他的学说，甚至把儒家、佛家内容互相印证呢？这

里的原因倒有几个。

一方面，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哲学和宗教是一对双胞胎，它们是一起出生的，相貌也有几分相似，并且总是互相浸透、互相引导，难以彻底分清。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在他生活的时代，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大明帝国却因为政治的腐朽、哲学的贫乏、民众的庸碌狭隘以及统治者的愚蠢短视，而正在错失良机。我们总喜欢引用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醒来，吼声会震动天地”，却不肯去想：中国为何这么多年还没“睡醒”？其实“王阳明时代”的欧洲才真是一头正在醒来的雄狮，吼声早已震天动地。

王阳明成亲的这一年，迪亚士越过了好望角；王阳明第一次到京城考进士这年，哥伦布的船队向传说中的“印度”驶去；王阳明考中进士这一年，
504

达·伽马的船队已经到达了印度；王阳明与宁王在江西激战的时候，麦哲伦的船队又扬帆出海；嘉靖元年，王阳明受封伯爵，回余姚老家坐冷板凳时，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大洋之外的风起云涌，却与中国无关。

当欧洲人靠科学和哲学的引领逐渐摆脱宗教黑暗的时候，在封闭落后的大明帝国，宗教在人民中间传播得火热异常，人人皆信，不稍存疑，就算是王阳明本人，于此怕也不能例外。若说王阳明不信神佛，不信地狱，不信西方极乐……大概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作为正统学说的儒学早已经被统治者涂改得面目全非，从某种角度来看，儒学本身也是一种“儒教”。在这么一种宗教、哲学不分彼此的情况下，不仅王阳明，就连理学宗师周敦颐、程灏、程颐、朱熹的学说，也一样充斥着

“禅”的影子。王阳明半生都在大讲心学，大讲良知，讲来讲去，难免讲出几句与禅有关的话来，这是古人的思想和语境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但宗教和哲学虽是双胞胎，却又有自己的“个性”：佛教思想讲超脱，讲置身事外；儒家思想是积极人世，救民水火，以天下为己任。说到最后，一个要“出世”，一个要“入世”，在这方面，佛教和儒学截然不同。

王阳明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是个最积极的人世者，他虽偶尔谈起佛教的一些思想，却并不同意佛教的根本思路。王阳明的学说是人世的，是要治病救人的，其最终目的是要重拾孔孟儒学精要，监督统治者，他提出的“满街都是圣人”也不是满街都是超然的“佛”，而是满街都是勇敢的“人”，这些思想与佛教格格不入，纯是孔

孟儒学的勇敢精神。

王阳明早年曾经提倡静坐，这静坐的功夫说佛也像“佛”，说道也像“道”，但从时间段上来看，阳明好静坐，却是分了几段：十七岁那年新婚之夜跑到南昌城里的道观跟道士学打坐，那时大半是好奇，年纪轻，性子躁，坐不住；后来生了病，休养时又练打坐，是为了养生，似有小成，却又以“簸弄精神，非道也”一句话废弃了；再后来龙场深山“石棺材”里枯坐，实在是身体心灵都无处可去，不坐不行，只好坐坐，却于冥思中悟出道理来。

因在静坐中得了道理，王阳明一度很喜欢打坐，甚至教学生们也学打坐，补“小学功夫”。于是对人言道：“我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然而王阳明很快就发现，枯坐毕竟不是办法，“一时窥见光景，507

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人枯槁之病”。也就是说，静坐久了，心里虽然静了，杂念消了些，却把“济世救民”的人世之心淡化了，“喜静厌动”了，阳明先生觉得这样不妥。

从此王阳明不教人静坐了，甚而批评佛教：“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为什么说佛教“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呢？这是相对于儒学“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的人世精神而论的。

这时候，就有了下面这个小故事。

阳明的弟子萧惠好仙、释，阳明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⁵⁰⁸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

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鸺窃腐鼠耳！”

惠请问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惠慚谢，请问圣人之学。先生曰：“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阳明先生对喜欢佛道之学的弟子萧惠坦承自己年轻时喜欢“佛道”，但苦受磨砺之后，才明白儒学扩充良知、为民请命的“简易广大”，到这时候回头再看，早年喜欢过的“佛道”内容就显得空洞了。萧惠还不明白王阳明话里的意思，继续问“佛道”的妙处，结果被王阳明斥责了一句：“汝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我悟到的“良知”你不说，你光问我“后悔耽误时间”的那些东西做什么！）

但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与佛教的思想却是分道扬镳的。一个人世，一个出世，迥然不同。至于后来学者们指责阳明心学是“阳儒阴禅”，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有些儒生心胸比较狭隘，“门派”观念很强，紧紧抱住儒学的“正统”二字不放，对佛教、道教歧视，甚至仇视。而王阳明偏是个“狂者胸次”，有禅就是有禅，借用就是借用，并不讳言，结果触动了正统儒生的敏感神经，引发了他们的“集体愤怒”。二是另一部分人指斥阳明心学是“禅”，实际上是在替统治者说话。因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对阳明心学产生了警惕，于是御用文人们被放出来抹黑心学，想以一个“禅”字否定心学的“儒学正宗”地位，既而将心学边缘化，弱化心学思想，淡化其社会影响，最终把“致良知”、“满街都是圣人”这些令统治者不快的观点尽可能地抹杀干净。

自从阳明心学诞生以来，恨它的人就没断过。随着阳明心学内容越来越丰富，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其中所含的“正能量”越来越强，憎恨心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些人无法否定“良知”，无法否定“致良知”，甚至无法否定“满街都是圣人”，就出邪招，硬说心学是“禅”，这个伎俩未必高明，但很有用，至少它能搅混水。

王阳明在确立和宣讲阳明心学的过程中，借鉴了佛教的一些内容、一些思想、一些名词，这个不必否认。但若说“心学就是禅”，是“阳儒阴禅”，这就是谣言了。

谣言止于智者，我们不去理它，它就无处滋生。

二 心学一闪光

良知之学在大明朝失败了，但阳明先生说得好，“良知永不泯灭”。所以阳明心学也不会泯灭，能薪火相承，总有后人。

就在崇祯皇帝驾崩，大明王朝灭亡的第二年，中华帝国正为抛弃哲学、蒙昧良知而付出代价，中原大地正遭逢乱世血流漂杵的时候，阳明心学渡过大海传到日本去了。日本儒生“近江圣人”中江藤树接触到《阳明全书》之后立刻为其所折服，抛弃奉行半生的“朱子理学”，改宗心学，创立了日本阳明学派。

但中江藤树还没有完全揭开心学的奥秘，直到1823年，武士出身的学者大盐平八郎终于渐渐体会到阳明心学中的良知、诚意、知行合一之说，

开设了“洗心洞”学塾，开始讲授“大盐心学”，而大盐平八郎这套理论简单得很，就是两个字：务实。

日本人借鉴阳明心学，鉴的是一个“诚意”，是反思、改错、进取。日本是个善于用“诚”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未必有多聪明，但他们做起事来真的很有诚意。那些发起“明治维新”的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阴、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无不以诚意、求仁、无我为信念，整个民族都在认错与反思，继而就是进取和改革。

在之后的二三十年，明治维新，殖产兴业，脱亚入欧，一个个惊人的口号被提了出来，而每一个口号的提出，都是对日本帝国千年历史的审判和反省，随之而来的是勃勃生机，一个接一个日本人连想也不敢想的巨大成就，就这么活脱脱

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明治维新，真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人羡慕“明治维新”也有一百年了。可是别忘了，明治维新还有一个“下半场”呢。

看着这巨大的成就，日本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岛国偏居海外，自古就贫穷落后，战乱不断，日本老百姓祖祖辈辈人比乞丐还穷，命比草还贱，从没享受过富足和繁荣，也看不到有什么“成功”的希望。现在突然富足到这样的地步，繁荣到这样的地步，成功到这样的地步！日本人竟有些忘乎所以了。他们的眼睛只看到“成功”，却似乎忘了，这成功是怎么来的？

不知不觉间，日本人陶醉在幸福之中了，他们把“心学”抛弃了，把审判和反省放下了，因为大审判和大反思需要大智大勇，而大智大勇有时候太累人了，一个正在享福、正在自豪、正在

骄傲的国家，懒得再做这样的事了。

于是整个日本悄悄偷起懒来了。

大反思停止了，脱亚入欧的大改革思路渐渐被抛弃了，民族主义升温了，天皇又开始被神化了，而诸侯混战的日本一千年 来始终奉行的“军国主义”思想也被捡拾起来，成了主流。刚刚享受到进步和繁荣成果的日本帝国一夜之间被绑上了战车，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败北，整整五十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一路往深渊里滑行，自己也控制不住，最后，两颗原子弹终结了这个疯狂的军国。

二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样：人。一些面有菜色的人们，穿着破烂的黄皮鞋和撕去了徽章的旧军服瘫坐在废墟里，面对已经化为齑粉的国家，已经几乎崩溃的民族，不得不再次拿出诚意与无我，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过去、未来做一次全面的大审判、大反省、大

改错。结果日本人找到了他们失败的根源，并以大智大勇下定决心，彻底变革，重新再来。

日本人不再打仗了，他们在《宪法》中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天皇只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日本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人再一次改革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把曾经将整个民族拖进深渊的穷兵黩武的民族劣根性一举扫除，一切从头开始。

于是奇迹又发生了。这个奇迹甚至比“明治维新”更令世界震惊。这次巨大的经济奇迹前后持续了足有三十多年，之后，日本人再一次犯了老毛病，他们懈怠了。

富足，从未见过的震惊世界的富足，使日本人又一次懈怠了、骄横了、懒惰了。他们不再审判自己，不再进行反思了。经济上、政治上、军

事上，变化一点点发生，自大一寸寸抬头，浮躁一层层堆砌，终于，整个日本又走上了一条疯狂之路，只是这一次他们不是发动战争，而是疯狂地去炒作房地产，以至于“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后来他们引以为荣的经济奇迹忽然崩溃了。二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日本经济还没恢复元气，而困境中的日本，所走的道路越来越偏执，越来越不可理喻。

心学理念一闪光，整个日本就闪闪发光；心学理念一埋没，这个岛国就陷入一片昏暗。我们这个一衣带水的聪明邻居下一次“心学闪光”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也管不着，这是人家的事。但在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最近的一百年间，日本却是中国的老师，发生在老师身上的荣辱兴亡，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一定

要认真借鉴。

当日本人分析儒学思想，透视心学理念，以之作为“富国理论”加以施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做什么呢？

我们也在做事，没有闲着。比如我们从日本抄袭回来一个很可爱的词汇，叫做“达人”，今天这个词汇风行网络，到处有人用它，“时尚达人”、“潮流达人”……闪亮登场，此起彼落，各种“达人秀”层出不穷，魅力十足。可“达人”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在日本，“达人”两个字是专指“成功人士”，而它的出处是孔子的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文说过，这段话正是孔夫子为后人总结的一条“成圣”之路，是儒学精髓“仁”字的核心意思。

日本人把儒学吃得很透，从中受益良多。而在人家提炼儒学精髓为己所用的时候，我们却只捡拾了人家的唾余，拿来在网络上“炒作”。日本学者高瀨武次郎曾经写了一本《日本之阳明学》，在书中他说了一句听起来非常幸灾乐祸的话：“大凡阳明学含有二元素，一曰事业的，一曰枯禅的。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这位日本学者说得太对了！

什么是事业的元素？就是仁义、良知、知行合一，诚字当头，大智大勇，奋勇而进，改革不辍，自强不息。

什么是枯禅的元素？就是训诂空谈，咬文嚼字，自己给自己下绊子，书房门关起来还要从里头插上再加一把锁，闷头在书堆里拼命抠字眼儿，想尽一切办法告诉别人：“经过我的研究，证明

他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

阳明心学讲究“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可是到今天，我们对阳明心学的认识仍然局限在考证和训诂方面，却忘了“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的教训。

损失够大了，教训够深了，这种“枯禅”的糊涂事不可以再做下去了。

但愿下一个发出“心学闪光”的，是中国。



更多文件请添加微信：jakenian